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les, e b...
o, por nome Louren
s Alcantaras, e hum
co, e b...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 Day
nte feito
entrão
em nob
molber

猫

Os Gatos

菲阿略·德·阿尔梅达 / 著

刘正康 / 译

傅爱蕾 / 评介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三环出版社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Portuguese or Spanish,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circular portrait of a man.



葡语作家丛书



Fialho de Almeida

Os Gatos

(SÉRIE LITERATURA)

这是一本批评 19 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社会的杂文集。作者给书取名为《猫》，是希望自己的文章好似猫一样，拥有诱人的叫喊和灵活机敏的反应，还有时刻迎接挑战的利爪，成为针砭社会的有力武器，以实现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社会的理想。

ISBN 7-80645-306-7



9 787806 453063 >

ISBN 7-80645-306-7/I · 35 定价: 19.00 元

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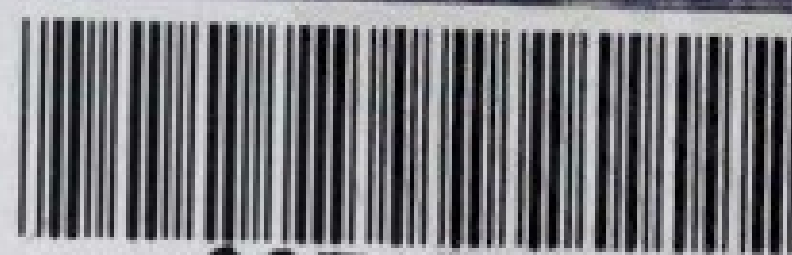
Os Gatos

菲阿略·德·阿尔梅达 / 著

刘正康 / 译

傅爱蕾 / 评介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00717744

Título: Os Gatos

书名: 猫

Autor: Fialho de Almeida

作者: 菲阿略·德·阿尔梅达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Editora de Hainan

出版: 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Colecção: Colecção Cravo—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21

类别: 康乃馨译丛—葡语作家丛书文学系列之二十一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Yao Jingming

统筹: 林宝娜 姚京明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Liu Zhengkang

中文翻译: 刘正康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Helena Caryalhão Buescu

评介: 傅爱蕾

Capa: Kang Xiaoyu & Vitor Marreiros, Qiu Xiaoqiang

封面设计: 康笑宇、马伟达、邱小强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Hai Nan, Impressor Bocheng & Beijing

植字、排版及印刷: 海南出版社, 北京博诚印刷工厂

Tiragem: 10000 exemplares

印数: 一万册

1.ª Edição: Macau, Haikou (Hainan, China) 1999

第一版: 澳门、海口(中国, 海南), 1999

Esta edição conta com o patrocínio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Livro e da Biblioteca

此书的出版得到葡萄牙图书馆及图书学会的赞助

ISBN: IPOR 972-8013-36-1

ICM 972-35-0275-5

评介： 作家与作品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
专注世界的观察者

1. 生平与作品

若泽·瓦伦丁·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 1857 年 5 月 7 日生于下阿连特茹省^①，1911 年在家乡去世。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出身寒微，终生叛逆，自认壮志未酬，抱怨不为文学界所理解。他以勤奋、勇敢、针砭时弊著称而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医科毕业后（诸多作品都显示他的医学知识），他以真名发表短篇小说和专栏评论，也不断变换笔

① 葡萄牙南部省份，以田园风光的大平原著称。乡村在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的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

名为当时的报刊撰文。

由于他在所处时代良好的教育（医学），独特的风格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如今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仍被公认为葡萄牙 19 世纪到 20 世纪过渡时期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菲亚里奥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察觉当时十分走俏的富有哲理的题材，如继承权、环境对社会颓废心理的影响，种族特征，教育的作用等等。为了充分表现这类题材，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在短篇小说和专栏评论中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和出人意料的强烈形象，这正是作者的独特风格。但同时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并不相信（葡萄牙）社会和（葡萄牙）人民能获得新生。他认为，要在道德、心理、伦理和信仰方面发生积极变化实在太遥远了。因此，他内心变得更为痛苦和悲观，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心态，往往还掺杂着猛烈抨击。实事求是说，这种抨击并非一贯公正。在发表的多部短篇小说集中（如 1881 年的《短篇小说集成》1893 年的《葡萄之国》），他经常关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忧心忡忡地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斗争和痛苦。与此同时，由于对辛酸苦难的小人物表现出浓厚兴趣，对他们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十

分精心。一方面，他继承了埃萨·德·盖罗斯^①或拉马略·奥尔蒂冈^②那种咄咄逼人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他也像拉乌尔·布兰登^③那样在20世纪初的文学中占有的突出位置。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短篇小说和专栏评论（从未见“洋洋万言的长篇小说”问世，大家认为他有此文才，本人也对此梦寐以求）。他撰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得心应手——对某一件事或某一形势分析评论能抓住“瞬间”入木三分地阐明主要问题是菲亚里奥专栏评论的艺术精华所在。

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葡萄牙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观察及评论（如对戏剧的评论等）并揭露其颓废和蜕变。他认为颓废和蜕变将不可避免地损害

-
- ① 埃萨·德·盖罗斯(1845—1900)，19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分析并痛斥了葡萄牙社会的阴暗面。已译成中文的作品：《马亚一家》、《遗物》、《首都》、《巴济里奥表兄》和《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 ② 拉马略·奥尔蒂冈(1836—1915)，埃萨·德·盖罗斯的挚友，两人合作发表了《投桦》。作品用讽刺手法分析并鞭挞当时社会的教育、经济、政治、艺术、新闻、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弊端。
- ③ 拉乌尔·布兰登(1867—1930)是感情丰富、充满活力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作品形式多样，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故事、戏剧、回忆录和游记等，题材十分广泛，涉及人类的种种忧虑：死亡、痛楚和生活中的种种怪诞不经。

葡萄牙社会。他的文章尤其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表现出他对这个社会往往是辛辣的鞭挞。也许我们可以称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为“多疑的观察者”：一位关注、观察、判断和揭示疮疤的作家，但同时他深信自己分析的事物不会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悲观心态。

2. 简读《猫》

《猫》是1889年至1894年每月出版一次的文集，后来汇编成六册。专栏评论是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它的典型作品《猫》内容极为丰富，每篇文章之间没有（也无须有）符合逻辑的联系或连贯性，题材十分广泛，均以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和批评为基点。

我们先谈谈菲亚里奥创作的这部文集的文献价值：作品问世的5年（1889—1894）犹如从不同视角拍摄的照片生动地展现在我们读者眼前。《猫》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内容丰富无所不包，从各种信息到菲亚里奥对剖析种种问题所持的态度（如对当代青年在学校的日常生活的详尽描写，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学习方法，医药卫生和民以食为天等），阅读文集往往也

能了解某些社会和文化事件的来龙去脉。(如 1890 年英国向葡萄牙提出最后通牒引起国民如此强烈抗议，狠狠打击了葡萄牙君主制度。)^①

另一方面，菲亚里奥的作品言简意赅，题材多样，笔锋犀利，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切中要害（正如大家所说，往往是尖酸刻薄），反映现代生活中典型的互不连贯，自成一体的风格。

这就解释了菲亚里奥对文集的取名理由：对葡萄牙生活调查汇编而成的月刊《猫》。事实上，菲亚里奥继承了埃萨·德·盖罗斯和拉马略·奥尔蒂冈撰写的《投枪》^②的风格，力图对社会生活进行“科学调查”，以唤醒民众的良知，如可能的话，推动改革（他内心对此并不抱希望）。另一方面，《猫》的含意在文集的开篇文章中即得到说明（“诸位先生们，猫儿们就在这里！”）：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像猫一样，显示出“波浪起伏的优雅风度和气喘吁吁的气息、呼啸声和爪子、带刺的舌头和惹人爱怜的媚态”。菲亚里奥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柔媚”地斥责，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复杂性。他在《猫》中表现的心态正如文

① “最后通牒”是 1890 年英国向葡萄牙提交的外交文件，英国提出占领尼亚萨河和赞比西河之间的大片领土要求。

② 汇集成 15 册的《投枪》于 1871 年至 1882 年出版。

集描写的那样，“发出叫声不多，但总是在抓着，而且总是毫无畏惧。”这是恰如其分的描写：菲亚里奥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猫，对赞扬声并不感到舒坦或心安理得。他选择各种题材频频发起攻击，有时因言之过急而有失公正。

这本专栏评论文集的主调似乎是以各种形式对社会通病穷追不舍地加以斥责，尤其当这种通病涂上一层华丽而严肃的外表，因而变得虚伪荒诞。19世纪和20世纪典型社会被无情地描写得不堪入目。

在我们对文集中这种趋势的某些事件稍加剖析之前，不妨先谈谈另一个补充性的特征：对贫困的怜悯，对无力摆脱命运安排而经受心理和物质磨难的不幸者和白发苍苍老人的同情，他们无法从社会得到物质或道义上的援助。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中窥察到菲亚里奥的如此尖刻、充满苦汁的炯炯目光，这是富有同情心理的反叛者特有的。

如上所述，菲亚里奥花费5年时间撰写的《猫》的种种特色在这本文集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把文章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由具有重要批评意义的文章所组成。这些文章反映了菲亚里奥对各国社会尤其是葡萄牙社会特有的兴趣和关注。除对形势“诊断”外，我们在文

章中还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如教育和戏剧。在阅读以葡萄牙知识界和艺术界为题材的专栏评论时（如“如何筹办一所装饰美术博物馆并给艺术教育充实内容而又不增加国库的支出”，“剧坛危机及其原因”，“当代文学的特性”），我们也会遇到其它题材并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教育、教学以及学校的体育和卫生（“对中学考试的采访：中等教育的倒退以及葡萄牙青年的病态”，“人民教育”），或者还可以拜读其它文章，深刻分析 19 世纪末葡萄牙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政治局势，特别是英国最后通牒引起的非洲问题而导致的危机（“葡萄牙在非洲的被掠夺”）。这一系列文章向我们说明，菲亚里奥关心当代现实，善于对葡萄牙社会生活各领域作出透彻的分析，并果断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的批评针锋相对，单刀直入。当然这种批评从来不是四平八稳的，因为有时会引起永无休止的争论。但是，一百年之后，不难发现历史对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作出了完全公正的评价，即使有时他的批评似乎过于激烈。

第二类文章详细叙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分析形势的来龙去脉，充分体现了菲亚里奥的专栏评论的不同风格。他运用简炼的笔触勾画各种人物，故事和形势，表现出某种印象主义。菲亚里奥的专栏评论与他的其

它文学创作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往往又不能划定明确的界限。这种特点不单是菲亚里奥的作品所特有的，在19世纪下半叶其他作者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菲亚里奥所崇敬的大师、著名作家埃萨·德·盖罗斯的多部作品中随处可见（“大提琴手塞尔吉奥到莫拉里亚区的一家咖啡馆拉琴去了”，“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的悲剧”），集中描写如何细致观察单刀直入的凶狠攻击，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①感情丰富而又痛苦的形象（“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与特塞依拉·德·瓦斯孔塞洛斯的移灵安葬”），对城市贫困表现出深切的同情，（“里斯本日甚一日的贫困”，“人民教育”），对饱受城市贫困之苦的典型人物的细致入微的勾勒，令人想起狄更斯和葡萄牙文学大师塞萨里奥·韦尔德^②。但是作品中也不乏对农村景象和优美风光的写真，（“特茹河的清晨”）——使我们想起埃萨晚期作品中对农村乌托邦的再现。

在第三类文章中，菲亚里奥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对葡萄牙社会的某些方面频频发起猛烈而又尖刻的抨

① 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1840—1882），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作品深刻揭露社会的贫困现象。

② 塞萨里奥·韦尔德（1855—1886），多产诗人，作品热情反映日常生活。他以造型艺术家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对劳动者的同情，并深刻揭露他们所处的恶劣生活条件。

击，把穷汉装阔佬的滑稽可笑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穷阔气”），19世纪形成的傲慢无礼的新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葡萄牙社会批判”），或者葡萄牙外交界的平庸之辈和任命国家代表的标准（“三国同盟”），或者还如我国斗牛表演的现状^①一样，葡萄牙社会也面临着“退化”（“小场的斗牛：我国斗牛表演的现状”）。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矛头直指泛滥的腐败现象（在他看来，行贿受贿是确定无疑的），对民众缺乏普遍的真正而又健康的教育，里斯本乃至整个葡萄牙社会无处不在的假仁假义、畏强欺弱等问题。同时也痛斥社会各阶层（从马车夫到君主和大臣们）、国王的葬礼（“路易斯国王的葬礼”）和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葡萄牙新闻业矛盾百出。培养人材显然无力，崇洋媚外，生搬硬套，丝毫不考虑葡萄牙现实也在他的批评之列。

我们认为，阅读本文集时应抓住两个主要特点：多样性和变化性。多样性和变化性表现在菲亚里奥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之中。作者的风格咄咄逼人，尖酸辛辣

① 斗牛是葡萄牙很有特色的娱乐活动，可以说是国粹。斗牛是斗士骑马或徒步与猛兽搏斗。如今古罗马的斗牛实际上仅盛行于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和充满苦汁，而对绚丽多采的世界，特别是自然景色则赞叹不已，一片深情。至于题材，正如前面所述，艺术、社会、风土人情、局势、人物、葡萄牙人民的特征或对医疗卫生、教育、市政建设……包罗万象。

总而言之，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撰写的文集《猫》描述了19世纪末叶葡萄牙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些问题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有些问题我们依然能在当代生活中轻易找出相似之处。总之，文集剖析了司空见惯的人与事——这样剖析并非总是深思熟虑，并非一贯公正，但却都是锲而不舍，从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我们可以把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称之为专注世界的观察者。

傅爱蕾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檄文》(Pasquinadas), 1890

《讽刺生活》(Vida Irónica), 1892

《短篇小说集》(Contos), 1881

《罪孽之城》(A Cidade do Vicio), 1882

《迷人的里斯本》(Lisboa Galante), 1890

《葡萄之国》(O país das Uvas), 1893

猫



引 言

1. 作者生平

菲亚西奥·德·阿尔梅达是这样的一个美学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寻找完美上面，而在他的晚年又一直因为自己没有能够或者说是没有懂得如何创造出自己的一部传世杰作而苦恼伤心。他一生的显著标志就是飘浮不定，他总是感到不满足，总是在心情不宁与恼怒中不能自拔。这种不宁与恼怒他就用猛烈的挖苦、讥讽来加以发泄。然而，菲亚里奥还有他

“另外的一面”，即带有和蔼与体贴的一面（而大多数人对他的这一面通常是忽视的，对他总是保留着捣乱闹事者的印象）。因此，拉岛尔·布兰当就说过：“如果把他反转过来，可以看到他是个温存备至的人。”

对于圣特——贝夫^①文学批评家，他主张对任何文学性质的作品进行分析，是不可能脱离对创造该作品的个人的。因此，他就有了一句归纳性的名言：“什么树结什么果”的方法。我们并不绝对一成不变地苟同，但是，我们还是要勾勒出作者做为一个个人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生经历，更何况作者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的痕迹，本身就构成了最可靠不过的一部传记。

若泽·瓦伦丁·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 1857年5月7日出生于弗拉德斯镇，这是阿连特茹省的一块偏僻地区，属贝雅区的维迪盖拉市。这块地方在这一大片沙漠式的荒野贫瘠的地区（“这是一片谁都不知道、谁都不重视，地方志地图上从来一字不提的土地”）当中，也算得上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阿连特茹的平原一片荒凉孤寂，烈日暴晒，但这片土地的景色，

① （19世纪的圣特——贝夫，1894—1867），法国作家，开始时是热烈的浪漫主义者，后转而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是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大师。

却又总是多么的富有深邃而哀伤的“人性”，它给菲亚里奥的多愁烦闷的童年留下了非常特别的烙印。正因为这样，这位艺术家在日后怀旧的作品中总是回想到这片土地！这些作品充满了忧郁和奇特的美，有时也采用了生动的写景语言（这种语言全都掺杂着方言和俚语），充满了明确的乡土形象。

他虽然以自己的平民出身而自豪，但是他一直未能克服因出身寒微而产生的反叛情感。他父亲生于贝拉省，曾任店员，后来改任小学教员，终于在平原地区安家落户。菲亚里奥的外祖父母家和舅舅家世代是拿锄头挖地的，原籍阿连特茹，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对于他所谓“鲜足的”或“有舌苔的”贵族，亦即所谓二等的蓝血贵族，总是感到厌恶，（这些人是“贵族乡绅的女儿同货摊主的儿子结合”所生），他的这种厌恶，就发泄在他的一些猫爪抓人似的、挖苦的文章中。的确，他对另一种贵族是钦佩的，那就是“真正的”贵族，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跻身于这种贵族之列，因为他凭着自己那种几乎是英雄般的意志力，奋发图强，得到了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他对于那些富有资产者的痛恨，当中有很大的妒忌与怨恨的成分，他把这些人同他假设为“贫苦”的那家人的生活相对比。不过，正如普拉多·库埃利奥教授所指出的，菲亚里

奥这样大谈特谈自己家庭的贫困，其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这位作家的父母虽然没有大笔家财，地位也寒微，但仍是拥有产业的业主，甚至曾拥有 16 处乡间地产和 4 幢住房，此外还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酒窖。

若泽·瓦伦丁 9 岁的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念完了小学之后，被送进里斯本巴朗伯爵广场阿尔马达斯宫的欧洲书院住校学习。他这个少年人本来就是十分敏感的人，同本乡本土和家中亲人难舍难分，而且又极为多愁善感，因此，在他长达 5 年之久的寄宿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一段十分痛苦的经历。后来，这位艺术家曾在一段多少带有他所特有的悲观主义与夸张笔法的文章中概括描述他在书院中的日常生活：“我在宿舍里的床上躺着，宿舍里六七名同学都在熟睡着，我却在自己的胸口感到一种倒塌的压迫感。我喘不过气来，周围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那种天天是汤、牛肉、米饭加两个青梨子的幽闭生活是多么的可怜！还有就是 10 小时的功课、难受的清早起床、挨骂、受压和种种讨厌的事！……”

心灵的这种叫喊，加上《在街角》一文中其他一些地方的叙述，归根到底反映出了当时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虽然有福气进那所号称首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的学校就读，但是，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怎么

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是怎么样的师生（应读作刽子手与受刑人）关系。

但是菲亚里奥的痛苦似乎没个尽头，他这种“天之骄子”（将来有资格可以在社会上谋一席高级职位）的身份，让位给了他一生当中也许同样倒霉的另一段经历。1871年的时候，由父亲指定修药剂师课程的非亚里奥进了一家药房当实习员，这家药房靠近圣安娜田园的米特洛广场。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他那时候是个娇嫩文弱、初出茅庐的少年，目光中流露出忧郁与委屈的神情，因为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同他的文艺理想的宏略雄图太不相称了。他就这样忍声吞气过了7年多，在这7年多当中，菲亚里奥在那种对他的自我实现极为不利的气氛下一直忍受着一种充满庸俗小气之风的生活重压。但话又说回来，除了幻灭和对抗之外，他本人也承认，他这种作为低级雇员的地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他站在柜台后面就有机会观察与解剖众生相，同他一贯热爱的下层民众、同他们的语言、同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同他们日常生活的种种霎时的情景相沟通：“药房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我同老百姓直接面对面地接触，让我看见了贫民窟的生活……”

菲亚里奥把他这一生中如此艰苦的一段时期称为

“膏药与丸散”的时期。在这段被迫学习时期，这位酷爱文学的青年人阅读了各种各样的读物，同时还把他的一些零星散文作品分别发表在一些外省报纸上，因而小有名气。1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给莱里亚的报纸《莱里亚通讯》撰写有关里斯本社会情况的报道和有关文学艺术的种种见闻评论，此外还有一些专栏评论，他同这份报纸保持关系近3年之久。看来他似乎偏爱同戏剧和马戏有关的题目，这一点从他的报道中比较频繁谈及戏剧和马戏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此外他感兴趣的还有同下层老百姓有关的题目，这些题目一直是他所特别关心的。发表菲亚里奥的文稿的还有维塞乌的《卡瓦都河黎明报》和《自由报》。在文坛上的成功促使他念完了中学课程，进入了理工学校，当时他决心要从事医学事业。但是，他父亲于1876年底去世，这就迫使他离开了药房并且再度中断学业，回到了家乡。他在家乡停留了约一年，企图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当时他的家在经济上已经相当拮据了。

然后……他又回到了里斯本，又恢复了原先的学业。他一直靠母亲每月从家乡给他寄来的少量生活费来维持（他母亲一定是为此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她的财产已经很少了）。最后，在1879年10月进了医学专科学校。他除了继续给报纸写稿之外，还教一些课，

搞一些翻译，以便能在首都谋生。当时他的一些同学相当怀念地回忆那个时候的学校生活。当时菲亚里奥住在圣塔儒斯塔街的一座客寓里，他是个生活无规律的学生，对学习方法毫不掌握。他们全都把他描写成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青年人，有些日子高高兴兴，精力充沛（此时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一些精辟的语句），但另一些日子里则与此相反，沉默忧郁。他此时的幽默感就猛然下降，显得十分消沉衰颓。在这样萎靡不振的时候，他那忧郁症患者的悲观情绪就显露出来了，这是符合他那种多愁善感的性格，这种悲观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比一天更加加重。到了要考试的时候，他就惊慌不已，手足无措，觉也不睡了，饭也不吃了。这时候看见他的样子就有点滑稽可笑，脑袋上围着几条湿毛巾，拼命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好几个月一直荒废了的功课学到手。此外，他阅读很多东西（主要是流行的法国小说），但看起书来也是杂乱无章，这也是他为人特点。他常到咖啡馆，尤其是到马尔汀纽咖啡馆，他在那里有一批朋友和同他气味相投的人，他们总是愿意在那里听他发表议论，认为他是当时最出色的聊天专家之一。他也到圣卡洛斯剧院去听音乐会，或是去施多阿内马戏场，也观看其他一些剧院的演出。他们这一批咖啡馆的伙伴们，大多是一些失意者或是

反叛者，把时间用来发表尖刻的讽刺，以发泄自己的愠怒和不满，或是咒骂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他们组成了一个咀咒、骂人的集团，他们这种破坏性的榜样，肯定使我们这位下笔尖刻的杂文作者的心灵受到影响，他本来就爱作无情的挖苦、讽刺，到后来就更有欠公允。

1880年，一位后来成为医生的姓戈尔让的同学主持的文学刊物《纪物》创刊问世。该刊后来发表了菲亚里奥的作品，署的笔名是瓦伦丁魔鬼。关于这个笔名，他的又一位同学梅洛·维亚纳在“学校生活回忆”一文中追述了菲亚里奥刚进医科学校一年级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这位“初来的新生”正在雅依梅·维克托尔的《新闻报》上发表连载杂文，名为“颓废者们”，文章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一个闲懒无用的社会渣滓的全部面目，“没头脑的文学家，摆出一副学者架子而又可笑无知的装腔作势者。喝白兰地酒和苦艾酒过多把肝喝坏了的革命诗人们。名片上印有头盔，靠别人的血汗不劳而获的生意人，不顾廉耻的拉皮条客和给大批顾客前来堕胎的江湖郎中”，等等。而与此相对照，是作者伤心地想到“穷人家里的痛苦生活：孩子没鞋穿，晚餐只有豆子，没香烟抽，连内衣也没得穿”。这种对葡萄牙家庭的诽谤“丑闻”，首先在一份

外省报纸上爆炸开来，马上传到了与菲亚里奥常来往的人们当中。结果是：医科学校的同学当中最讲道学的那一批人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有的人主张把这个竟胆敢污辱那处女一般纯洁的葡萄牙社会荣誉的别西卜（译注：《圣经》中的鬼王。）狠狠揍一顿。另一些人则主张把他“拖死”抛到水里去，这样做，也许其值得称赞的动机是把这个“罪孽者”邪恶的心灵中仍然藏着的不纯洁的思想全都洗涤干净……这些同学中最激动的一个后来成了里斯本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那一天，当“瓦伦丁魔鬼”在学院门口出现的时候，这位同学就决定揍这个顽童一顿。揍过之后，另外一些同他作对的人又不顾另一些较为温和的人们的劝阻，把这个倒霉的人连拉带拖拽到了校舍旁边的植物园的水池子里。多亏有一位叫做皮塔的人干预，菲亚里奥才从危急处境中侥幸脱险。皮塔这个人仗义救助朋友，用拳头打出了连拳击手也自叹不如的几下，救出了菲亚里奥，但菲亚里奥一直没有宽恕那个把他头发弄得乱成一团的袭击者。这样的态度归根到底还是证明了这位作者睚眦必报的性格，他对任何人给他的侮辱是永远耿耿于怀的。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菲亚里奥对于任何人最微小的一点点关怀也是铭刻在心的。

他的母亲由于女儿玛莉娅·德·热祖斯在 1880 年去世而同若阿金（另一个小儿子，但可惜是个弱智者）一起居住，她不断地要求菲亚里奥回去陪她。于是菲亚里奥就每年都回到弗拉德斯镇去过一个季节，他这样做也许部分是为了补偿他长期的离乡背井，但主要是由于有必要照料家中的财产，这些财产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已由他来掌管。但是，在这期间，首都的许多迷人之处，例如可以度过多个不眠之夜，在首都城区的那些最偏僻的小巷漫游，或是在经常有许多乐手、妓女和形形色色的夜游神们光顾的咖啡店（摩尔区的“狼犬咖啡馆”、火炉街的阿莫林商店和索科罗大街那家有曾任圣卡洛斯剧院大提琴手塞尔吉奥演奏的咖啡馆）那里通宵达旦。这些迷人之处，对这位名士派的文人都产生了他无法摆脱的吸引力，因此，他就经常匆匆忙忙赶紧回到这个既使他欢乐同时也使他苦恼的去处。就在那里，在夜幕的掩护下，诗人们的冥思遐想可以无拘无束，但同时，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也很吸引人，总有不断翻新的景象在等待着他，或是人们的疾病，或是人们的贫困，或是人们染上的恶习。总之，凡是大城市的大阴沟里的种种弊端，都应有尽有。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就在这里夜游，而且疾走如飞，

像发了烧一样如痴如狂。他背后揣着从不离身的手杖，边走着边收集素材来写他的印象派性质的文学作品。这种种人间的不幸，的确使他心中极为痛苦，这种痛苦也许只有某些像他这样少有的敏感人才能感受到。然而，看来也有理由假定，首都作为文艺活动的优越空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于这个原先在自己的乡间角落的静寂环境中萎靡不振、不能自拔的神经衰弱症患者，首都像是一支兴奋剂起了作用，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他振作起来。我们从1879年9月的《新闻报》上摘引下来的某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菲亚里奥有时候对于乡间的生活是多么的厌烦：“乡村，如果我们是在一位名画家的画布上看见它，或是从远处瞧它，它会使我们心旷神怡！”

……“但是，只要我们进到里面去，那么，原先我们盎然的诗意幻觉，我们本来要发出的赞叹之声，我们原先的一番想入非非的理想，就全都死掉了，全都跑掉了，代替这一切的是一个呵欠。”本来，菲亚里奥比任何人都更善于体验乡间生活的特色，他对乡间的山楂描写刻画得出神入化，只有一个热爱乡村的人才能做得到，但是，在上面那一番用文雅的语言表达苦恼的话中，我们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那位菲亚里奥了。我

们现在看到的，倒不如说是波德莱尔^①的许多继承人之一，着重偏爱的是都市题材。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的作家生涯，是经1881年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而确立的。这本书是献给他的偶像卡米洛·卡斯特罗·布兰科^②的。卡米洛很快就看出了这位文坛新秀很有后劲，对他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一篇《红发女郎》表现出来的才华很佩服。作者那种乐于在泥泞中打滚的病态心理，使得《红发女郎》成了一个典型事例，集中了种种不幸、恶习和忧郁的言词。这本书后来又再版发行，但换了个书名，叫做《病态者们》。次年又出了另一本短篇小说集《罪孽之城》。

医科的学习（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在医院中实习，包括了种种惊心动魄的经历和伤心事），菲亚里奥终于在1885年毕了业，当时他已经是个出了名的作家，而医科的学习又有助于使他的观察能力更为细致，对现实人物和想象中人物的诊断更为入微。除此之外，医科的学习还使他得以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词汇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歌颂死亡，描写病态心理，作品有《恶之花》、《散文诗集》等。

② 卡米洛·卡斯特罗·布兰科（1826—1890），葡萄牙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中采用了一些生理学的用语，而这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菲亚里奥从来都没有正经八百地致力于医学，他虽然曾在阿连特茹的一个市里行医很短一段时间，又曾在上贝拉铁路公司担任过职务，当了短短两个月的卫生医师，但这些都不能表明他对医师职业有多大的依恋。他真正的志愿看来是在文学上，正因为这样，他很快就放弃了医师职业，以便能够全副精力从事文学事业。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尽管菲亚里奥在词汇中放进了一些医学用语，并且受到了以埃米尔·左拉为大师的当时十分流行的自然主义的影响，他对于“赤裸裸与生吞活剥”的文学一直是反感的；换言之，他不喜欢那种百分之百客观的、采取冷冰冰的科学观的、不添加一点点梦想的文学。他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少不了要有这一点点梦想。我们不妨看看他在《猫》当中某处的一番话，当时他对法国的自然主义进行抨击，起码是抨击其题材与架构过程：“确实，从来没有一个文学运动比这个法国自然主义将更多的无关宏旨的细节加以宣扬，它有15年的期间把收税官的种种丑闻拿出来大肆渲染，使他们大惊失色，它只想谈论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将家具一一清点，将人们的行为一一描写而不涉及其心理动机，处处都把心灵排除在外，对梦想加以嘲笑。殊不知，少了梦想文艺作品

就比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好不了多少。”

菲亚里奥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肯定是自 1889 年至 1894 年。他一方面继续给好些报纸撰稿，同时每年都出一本书；他当时同拉法埃尔·波尔达洛·平叶依罗合作，用依尔干这个笔名，写着《一五一十》；同时又着手写《猫》，这是一份月刊，它以如实的笔法揭露我国当时的种种社会时弊。

菲亚里奥在 36 岁时同出生于古巴的 32 岁的富有孤女埃米莉亚·奥古斯塔·加尔西亚·佩戈结婚。据说当时这门亲事，社会上称之为一次利害婚姻。的确，这位作家尽管他的书很畅销，但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滑坡，乃至于到了无法在首都继续住下去的地步。在那个时候，也正如现在一样，在葡萄牙当个作家是一个报酬很低的职业，而且会引起种种倾轧与不快。我们差不多可以再加一句，这门职业也只适合于拥有大笔家财的幸运儿。路易斯·德·奥利韦拉·吉马朗埃斯在《里斯本与埃萨·德·盖罗斯》中，曾向我们谈到《马亚一家》作者对里斯本刻骨铭心的爱并且还补上一句话，这种长达 34 年之久的爱，并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如果再读一下路易斯·德·奥利韦拉·吉马朗埃斯有关首都对于作家们抱有怎么样的感情的一段话，也许会很有意思。他说：“埃萨本人有一天曾写道，里斯

本对于文人的感情，就如同一个资产者对于自己豪华的厅堂里漂亮的缎子家具的感情一样：喜欢这些家具，但很少使用它们，尤其是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这些家具。这就是说，无论如何埃萨·德·盖罗斯对于里斯本所表现出的对作家的兴趣，并不抱多大的幻想。”至于菲亚里奥，他总是同埃萨一样热爱这座城市，但他这个“猫”式作家不但因为这城市对作家们的显然漠不关心而感到快快不乐，而且还感到自己受到迫害。迫害他的那些敌人，很多人曾经装出一副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的架势以掩盖自己的庸碌与无能，但菲亚里奥狠毒的“猫”爪把他们的这副架势抓得体无完肤，他们对此当然怀恨在心，耿耿于怀。无论情况是怎么样，事实就是菲亚里奥向自己的单身汉生活，向自己的朋友，也向自己所爱的里斯本告别了。那是由一些好友在大陆饭店设的一场晚宴。这些好友之一多明戈斯·吉马朗埃斯用自己的话最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菲亚里奥本人私下向他透露躲到古巴去的真正原因：“有一伙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的虚荣心受到了痛击，他们的狼狈相受到了狠狠地戳穿，他们的仇恨被他所挑起，于是他们紧缩着对他的包围圈，准备在这个时刻来个决定性的总攻。抗争是不可能的，延长战斗就等于陷入饥饿的长期折磨之中，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的

文学生涯，放弃充满战斗气息的文艺生活，隐居到乡下去，在那里，总是有另一种生活在等待着他。”

婚礼是 1893 年 11 月 23 日在菲亚里奥的家乡举行的，新婚夫妇婚后就到了古巴定居。此时，这位作家似乎终于找到了一处安身度日之处，可以在平静的家室里，在几乎是父权制的生活中安享太平。但是，才过了 10 个月，埃米莉亚就因肺结核病而去世。孤寂的生活又延长了，菲亚里奥此时由于继承了妻子的遗产，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的农场主，于是他设法填满他生活中的真空。他在古巴和里斯本两地之间来回走动，他常常旅行，他成了热心喜爱西班牙及其许多作家的人，这些作家当中包括了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塞万提斯、乌纳穆诺、拉蒙·德尔·巴叶·英克朗、哈辛托·贝纳文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加利西亚是对这位艺术家最有吸引力的地区，因为他认为加利西亚人种“是全世界从美学观点来看最美丽的人种之一”。同时，他又在写作，总是在继续写作。而且，同往常一样，他总是把时间分散到种种即兴的小作品当中，一直没有能够摆脱自己那种零敲碎打的习惯。他为报纸写了一些纪事和若干文章，这些报纸有的是葡萄牙的，有的是巴西的。但是，大家都在盼望的而且他本人也在徒劳地要求自己写出的那本长篇小说却一直未能问

世。最后这也成了他的一个遗憾：他日常的文学工作，总是停留在新闻报纸方面，而他本来可以也应该越过这条界线，去搞真正的文学，但是，二者之间一直未能妥善处理。

要绝对准确地重新整理出一个人的一生经历，力求公正客观地整理出他的传记，总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有一句话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一点却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如果再把有关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生平的各种著作翻开看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乎有多少位传记作者，就有多少个菲亚里奥，而我们如此渴望能把握住的那个“完整的”菲亚里奥却终于溜掉了，留下来的只有若干相互拼凑不到一起的片段。

这位作家是54岁时去世的，有关他去世情况的种种推测，只不过是使他本来已经够复杂的人格更增添了一些侧面。有一些人，如阿尔比诺·福尔雅斯·德·桑派约，认为这位作家是纯粹由于心情忧郁而死去的。原先独裁者若奥·弗朗科，在政府危机发生之前，曾经对菲亚里奥十分器重，对他优渥有加，使他受宠若惊。但是，独裁者的垮台使他感到震惊。各方人士，包括他的一些多年老友，纷纷对他表示鄙视、冷落与嘲弄，甚至报纸也常常挖苦他，这一切都使他受不了。

他们不能原谅他曾投到保皇派那边去的这一“丑行”。所以，他就流亡到古巴，但是，在古巴那里的孤寂处境使他原先的忧郁悲观心情更是变本加厉。最后，他疲惫不堪一身是病，在生活中也没有一个女伴来靠近他，他的性格面对着走投无路的前景而终于垮掉了。

但菲亚里奥的另一些同时代人则根据他死得突然而且在去世前夕立下遗嘱这一事实做出了一个推论，认为他是自杀的。在《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文集》的序言中，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向我们叙说了他访问菲亚里奥的出生地即弗拉德斯镇那个古老的慈悲广场的经过，这个广场今天已冠了《猫》的作者名字。曾经有一次，现时的女主人，同菲亚里奥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她十分自然地像是讲一件尽人皆知的事一样谈到这位作家的“服毒”自杀。她一口咬定这位厌世者选择了这种自杀方式。这种说法似乎使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觉得有点踌躇不定，但是早在1917年，达拉—莫乌拉子爵就曾亲自进行过类似的采访以收集有关这位艺术家的生涯与死亡的举证材料。他当时在题为《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的一书中这样记下：“他临终时在中国照料过他的卡拉佩托家族的某人说他肯定是服了毒”。

在1911年3月4日的那一天，菲亚里奥从位于弗

拉德斯的葡萄园返回时，当时已近黄昏，他曾向车夫叫喊，要他用一辆农用车把他送到古巴去：“快马加鞭，要不然你就别想我能活着回家。”医生们当时证实菲亚里奥死于心力衰竭。但是，究竟是因心绞痛而自然死亡呢，或是像多明戈斯·吉马朗埃斯所提出的那样是“在文学上或者在政治上中了毒”而慢性自杀呢，或是像现在多数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下子自杀的呢，这将永远是个千古不解之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过的是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充满了孤寂与哀痛，其中只插进少有的短时间的宁静与甜蜜。

2. 时代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在文坛上出现的时候，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左拉力图用克洛德·贝尔纳尔^①的实验方法应用于对人类与社会的描写，赋与这种描写以一种科学上的严格性。以左拉为标志，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埃萨·德·盖罗斯之手传入了葡萄牙。1876年出版的《阿马罗神父的罪恶》及两

① 克洛德·贝尔纳尔（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发现肝脏的产糖功能和血管运动神经，指出外环境不断地变化，内环境（主要是血液）却保持恒定是生命的特征。这个概念启发了后来生理学的许多研究。

年后问世的《巴济里奥表兄》，不但标志了一种革新的技巧的开端，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宇宙观的基础。另一方面，特奥菲洛·布拉加 1877 年发表了《实证主义哲学概论》。不久之后，又在他主持下创刊了《实证主义》杂志。在新闻事业方面，拉马略·奥尔蒂冈继续从事他那个对社会风气加以针砭的使命，在《投枪》杂志上留下一页又一页嘻笑怒骂的文章。至于葡萄牙的诗坛，则引进了波德莱尔之风，此风在格拉·戎克罗和戈梅斯·列阿尔身上带上了一些阴暗的色调，怪诞与崇高齐飞，美丽与畸形一色。不过，仍然可以感到现实主义流派同浪漫主义美学之间的明争暗斗，这种明争暗斗，也成了菲亚里奥性格中有其杂乱无章的一面的原因之一。

到了 19 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一股对浪漫主义思想的种种神话作出深刻批判的反动潮流，扭曲的现实观开始受到了抨击。这一批判潮流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就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摆脱了种种成见和种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美化。同样，在政治与社会领域，欧洲也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法国由于拿破仑三世受到反抗而产生的危机，终于诱发了巴黎公社；意大利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西班牙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英国工人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切对当

时酣睡在懒洋洋的自由派荫影下的立宪制葡萄牙不可能不起影响，而当时葡萄牙的自由派正是社会、经济与技术落后的祸首。不过，在这个时期科学领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削弱了18世纪的机械论观念。对于所有这些运动，科英布拉的青年学子们都予以热情的注视。这些青年学子一直不断地同那所守旧的、死抱过时价值观的大学发生冲突。铁路的筑成，带来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作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新风格与新思想，在这些青年学子渴望新鲜事物的心灵中注入了一种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有迫切的必要对在“复兴”的“死水一潭的安定和平”中泡得麻木不仁的葡萄牙社会来一番改造。普鲁东的那种带有道德说教与改良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物种进化的理论，都在他们的心灵中埋下了日后将要发芽的种子。

果然，这些事件终于在葡萄牙引起了反响。旨在解决“复兴”所引起的问题而于1867年成立的改革党，号召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参加，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导致了一月运动^①。1866年1月在里斯本、波尔图

① 指1868年因人民群众反对增设消费税而在里斯本和波尔图等地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导致了内阁的垮台，新税亦被迫废除。

和布拉加发生的政治性示威，标志了人们对若阿金·安东尼奥·德·阿基亚尔所主持的政府税收政策的强烈抗议，使政府垮了台，同时这个事件也潜藏着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

然而，民族复兴派对社会加以指导时所采取的四平八稳的方针，又使得这个社会带上了一种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在文学上则表现为卡斯蒂略^①派的学院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个学派是以这位诗人为中心的一个“相互吹捧”的集团。这位诗人的追随者们顽固地坚持对于革命性的问题采取一种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老是采用矫揉造作、同现实格格不入的题材。同他们唱反调的是科英布拉 1865 年新的一代，其头面人物就是安特罗·德·肯塔尔和特奥菲洛·布拉加，他们早已受到了自欧洲传入的新思潮的影响。

1864 年，安特罗·德·肯塔尔出版了他的《现代颂歌》，在书中表现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并且表现了追求一种只能通过正义才能达到的人道主义理想。同年，特奥菲洛·布拉加也出版了他的《时代观》。由此，

① 卡斯蒂略（1800—1875）——葡萄牙诗人，自小几乎全盲，但诗才横溢。并曾译味吉尔、奥维德、莫里哀、歌德的作品。

开始了葡萄牙最有名的一场文学论战。这论战采取了发表文章与小册子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科英布拉质疑”。这次论战中一篇重要的作品就是安特罗·德·肯塔尔的文章，名为“清醒的理智与高雅的品味”。这位作家在文中反驳了卡斯蒂略的抨击，并且指责他的诗歌在整个欧洲都在对思想上的激进革命为之动容之时却是那么落后于时代与抱残守缺。特奥菲洛·布拉加也给《文学神权》撰稿，开门见山地批评那个围着头头而形成的文坛小圈子。后来许多作家也都参加了这次论战，其中平叶依罗·沙加斯、卡米洛·德·卡斯特罗·布兰科和拉马略·奥尔蒂冈则为卡斯蒂略辩护。

这次论战其实并不是区区的个人对垒，它有意识地揭露了那种同当代重大问题脱节的文人雅士式与乡土式的浪漫主义。同时，这次论战也标志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一方面既不排斥加雷特和埃尔库拉诺的遗产，同时又致力于文学的革新并使文学成为新时代的表现。这个用埃萨·德·盖罗斯的话来说称为“70年代的一代”或“科学与分析的一代”，日后就规划出了一个在思想上与文学上实行改革的详尽纲领。这些抱着革命理想志同道合的人，努力使葡萄牙溶入欧洲文化之中。他们为此而对“多个世纪以来的

昏睡”及“现代社会的冷漠心理”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顺便再说一句，在埃萨·德·盖罗斯的人物结构之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彷徨不定与消极颓废的环境。这些人举办的“俱乐部报告会”，亦即“民主报告会”，其目的就是要“研究对葡萄牙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宗教上进行改革的条件”，推动这些报告会的人，除了安特罗·德·肯塔尔和埃萨·德·盖罗斯之外，还有阿多尔福·库埃略、特奥菲洛·布拉加、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以及奥利韦拉·马尔丁斯等人。“作为艺术新表现的现实主义”，就是埃萨·德·盖罗斯报告会的题目，它表达了他对“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一种批评。

巴黎公社的挫折，1874年西班牙共和团的覆亡以及欧洲政局普遍出现的保守趋势，使得这批人分化瓦解，其中一些人站到了共和党一边，另一些人则顺应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于1887年组成了“生活失败者”集团。

不过，从1890年起，葡萄牙的不安定状态才加剧，不满情绪才加深。1891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对我国也有了反映，带来了诸如失业、连锁破产、货币大幅度贬值以及公共债务激增等痛苦的后果。不过，还是1890年1月11日英国“最后通牒”引起了反对英国的

强烈的集体公愤浪潮，而共和党人则对这浪潮巧妙地加以利用，对布拉干萨王族的执政方针加以破口大骂：“喂，无耻的英格兰，喂，不要脸的醉鬼，你给黑人和奴隶带去了什么？”格拉·戎克罗在《祖国之终结》中用这样呼叫声来以牙还牙地回答英国的欺负，然后又马上责备国王应对治国无方而使国家蒙羞受辱负责，并且以挖苦的方式讥讽国王对狩猎的爱好：“祖国已经死了！自由已经死了！/漫漫长夜，没有星星，没有灯光！/可恨的外国人在我们门口狞笑，/耻辱在管着英雄们的墓穴！/鸚鵡鸟，告诉我，走过的是谁？/是西蒙国王去打猎呢。”刚刚加入共和派思想行列的戎克罗终于向葡萄牙青年提出了挑战，要他们投身于这一崇高的事业。

英国当时是要强迫葡萄牙军队撤出非洲中部位于安哥拉与莫桑比克之间的地区（即今天的赞比亚和罗得西亚），而葡萄牙政府竟乖乖地遵从了英国这一屈辱性的要求，这件事在葡萄牙引起的轩然大波，的确是无法形容的。原先葡萄牙有一个按照“玫瑰色地图”的黄金幻想建立一个由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广大殖民帝国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追溯到16世纪，而且经过柏林会议又得以扩充。然而英国的最后通牒使这个大展鸿图的美梦归于破灭，因此，使得那些掌权的人们问心

有愧，而且引起了猛烈情绪的爆发，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种危机文学应运而生。巴济利奥·铁勒斯在其“由最后通牒到1月31日”一文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次国耻事件在所有人的心灵中引起的后果：

“无论今后留给葡萄牙祖国的是何种命运，1890年1月11日这一天对我国来说将永远值得纪念的。这一天顶得上好几个世纪：这一天，正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一些日子一样，以极为压缩的方式归纳了过去整个令人痛心的历史，而且朦朦胧胧地勾勒出今后多事之秋的秘密。这一天肯定是个结尾，但在将来也肯定是个开端。”

从长年累月的沉睡中被猛然惊醒的公众，此时他们的心灵就被鼓动去拥护共和制。可以说，共和主义的精神早已存在，虽然是以隐蔽的方式，但已存在于1820年总议会中的左翼之中，存在于九月党的思想体系之中，也存在于1846年的民众暴动之中。但是共和主义精神其扎根之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1891年1月31日，波尔图的驻军发生了哗变，这次哗变虽然被迅速平息，但却使得共和派更得人心，终于演成了1910年10月的革命。1891年1月31日事件是一次本质上有人民性的起义（发动者是一些军曹与上士，得到街上无名百姓的支

持)，但它缺少一个政治性的行动纲领。然而它仍是对君主体制痛恨的一个爆发，标志着一个以前不能想象的革命过程的开端。这次起义得到了菲亚里奥热烈而正确的称道，他是唯一不惧怕后果而敢于站出来向胜利者权威挑战的人。他这种勇敢的态度当时使他得到无数青年人五体投地的钦佩，他们对这位“反叛者”的胆量和影响都为之着迷。

杜阿尔特·雷特在上任主持波尔图《祖国报》的时候，在1909年10月1日该报的创刊号上说出了他对当时国内政局的看法：

“葡萄牙的政治问题是我国生活一切有关问题所密切依赖的，必须刻不容缓加以解决。至于解决办法，我们毫不犹豫地肯定，必须是革命的办法不可。这样一个国家，被半个世纪弄虚作假的政府当局弄得愚昧无知和穷困潦倒，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所知，只习惯于知道自己的义务。在这里，由于以往一直为所欲为而变得强有力的政治寡头，满有信心地下最大胆的政治手笔。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想象能够平平稳稳进化，引导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教育与重整运动，并对公共行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更改，那就是幼稚的狂想。民族复兴的任务必须依靠革命性的努力，无论出现多大的危险，多么没有把握，而唯一能够开展这项任务并

将它进行到底的政治力量，就在共和党身上。……葡萄牙共和党的纲领带有一种乌托邦性质，我们的意思是说，它的全面实现，可以认为是十分遥远的事。显然最好代之以一个最低纲领，在里面规划出一些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我们也相信它一定能很快就达到，那么，宣传工作的阶段，实际上到时就结束了。”

1890年至1900年10年期间，毫无疑问是思想界与体制上一个尖锐危机的时期，所以危机文学就应运而生。人们对于国家不可避免的衰落变得非常敏感，而这种衰落，是70年代的一代早已指出了的。葡萄牙知识分子一些激烈的抗议，陆续登载在《革出教门》这份刊物上。它刊登的文章，包括有卡米洛·卡斯特罗·布兰科、安特罗·德·肯塔尔、若奥·德·德乌斯、布良·帕托、特奥菲洛·布拉加和雅依姆·德·马加良埃斯·利马的作品。此外还加上其他拉丁语系国家的作家，如隆布罗索、康普阿摩尔、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以及马里奥·拉皮扎尔迪的。对国家命中注定要衰落的看法，现在成了人们经常放不下的一个话题。格拉·戎克罗的《祖国的终结》和《仇恨之歌》揭露了本国的弊端，展示了贫困已经达到何种地步。另一方面，菲亚里奥的文艺批评作品，在英国最后通牒

事件未发生之前，本来只限于美学性的题材或是葡萄牙官方生活的装点门面的那个侧面，但事件发生之后，他的作品马上就转变为公开反对君主制，他原先那些吞吞吐吐甚至暧昧不清的共和制信念就更加明确了。在《一五一十》杂志 1891 年 2 月的第 5 期上菲亚里奥声称：

“我们已经到了学说主义成熟的关头，过去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了，在将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旧政权自己烂透，千方百计加重这个发酵过程，这就是革命纲领的第一点，马上集中力量加强共和党的队伍，使它能同一切民主势力达成谅解并使一切不满的势力对它产生信心，这就是窍门。”

这次同英国的冲突给菲亚里奥提供了一个题材，让他写出激烈而大胆的谴责，吸引大批人群到这愤怒的潮流当中：“啊！报仇雪恨啊！……当然还很遥远！……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扭转这个潮流，这虽是个暗流，但却是葡萄牙在政治上同姐妹国西班牙合流的潮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将来阻止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大联合，而这将为一个黄金时代打下基础。”这些收进了《猫》里的话，毫不隐晦他希望一种共和制倾向的伊比利亚主义，作为拯救这个受英国肆意欺凌的本国的一个办法。

“土地是黑暗的，夜是黑暗的，月光是黑暗的”，作为葡萄牙人所受奇耻大辱的代言人格拉·戎克罗在叹息。他的悲观主义也在戈梅斯·列阿尔那里得到呼应，列阿尔描述了这个世纪末的腐败。埃萨·德·盖罗斯则劝人们冷静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他得到安特罗·德·肯塔尔的支持，肯塔尔提醒人们说，必须“使国家机构清廉化和民族化”，从而恢复“全国的道义团结”。

这个时代以失衡为其标志，因而向各种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些理论的特点就是进行病态的内省，神经过敏，并且有一种想象中的或表现为言词的梦呓。无政府主义理论传入我国时，正值颓废主义与象征主义都在我国显示端倪，这些运动革新了世界末的文学，排斥了日常生活与社会题材，从而恢复了那些文士派传统。各种杂志纷纷创刊（《不屈从者》、《新名士》于1899年创刊，《间奏》与《梦想家》于1889—91年间创刊），传播了某些法国杂志如著名的《白色杂志》的象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理。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个人主义的衰落，代表了对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抛弃。无政府主义在文学上是由颓废主义为其代表的，它归根到底是弱者的武器，正如拉乌尔

· 布兰当告诉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是弱者、不幸者与那些想要出人头地并取得成功但又无法在神经上经得起紧张的人们的理想。它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私主义，同资产阶级的自私主义是一样的，只不过采取另一个面貌。”

但是现在呢，90年代的那一代又反对70年代那一代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坚决抨击现实主义。对进步的正面理解被摒弃了，代之以一种基于伦理宗教原则的理想主义观念。“神经官能症”与“灵魂”等词语成了这种新感受的关键用语。悲观主义在蔓延，死亡成了使人们着魔的念头，虚无主义在文学中占着统治地位，它由于叔本华^①和哈特曼^②的哲学而得到了促进。作为“世纪末之病”的颓废主义，将所有这些病合成为神经官能症、秘传学说与撒旦主义变本加厉的悲观主义都包罗进去。在唯心主义哲学家拉斯金^③和瓦格纳^④的影响下，“梦想家”们（当时国内的颓废派就自名为“腾云驾雾者”）力图引进有关艺术的神秘主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他的作品《作为意志与作为表象》表现了以意志与表象相对立为基础的悲观主义。

② 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与学者，著有《无意识之哲学》。

③ 拉斯金（1819—1900），英国文艺批评家与作家。

④ 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作家。他有些作品反映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义原则，使人的灵魂恢复其一切潜力并使之具有真正的宗教崇拜性质。种种秘传学说得到了畅通无阻的传播。

这种带有颓废主义性质的神经质现象，得到了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明智的解释，他在他那些动人的文章中留下了一些贫困现象的图景，当中又插进一些天使般的幻象，但这些幻象总是被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所玷污。

日益严重的动荡局势，终于使卡洛斯国王不得不于1906年将执政大权交托给若奥·弗朗科，并同时解散国会。这位新的执政者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暴虐政策，建立了独裁制度，危险地背离了先前对共和派采取的宽容政策。事实上，弗朗科逮捕了很多，对新闻出版自由施加了横暴的限制，并使国王签署了一份敕令，将一切不同意政府政策的人处以流放非洲的刑罚。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引起了群情激愤，使得局势急转直下，造成了1908年2月1日的谋弑国王事件。若奥·弗朗科被视为应对卡洛斯国王及路易斯·菲利浦王储之死负责的真正祸首，不得不弃国出走，而共和党则队伍壮大，力量加强。1910年10月5日，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君主制垮台，成立了葡萄牙共和国。随着马努埃尔二世的流亡国外，共和国在人

们欢喜若狂中宣布成立。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在《猫》中给我们的印象是个坚定的革命派，同时他又是“一般研究”集团的保守共和派，但他在失望与恼怒之下，不久却投靠到保皇右派一边，同若奥·弗朗科站到了一起，支持他的反议会政策。不出所料这种态度使他受到了昔日的志同道合者的猛烈批评。不过，在为贝尔纳尔多·沙扎尔教士的《弑君与毁国》一书写的序言中，菲亚里奥对他们却反唇相讥，用尖刻的言词来报复他们对他的蔑视。他是个好争辩的、左右开弓的人，在共和国宣布成立时已经是个杂文作家，此时他深感失望，就脱离了共和主义思想。安东尼奥·萨尔丁雅的《悼念》中曾经十分中肯地用下面短短的话来归纳菲亚里奥的信念，也许还有他的性格：

“这不是行动的共和主义，倒是反动的共和主义。”

3. 文学作品

埃萨·德·盖罗斯的作品其特色是四平八稳、富于思索。在他的作品中，对周围的世界是加以客观的观察与刻画，既不添加忧郁的情绪，也不添加狂热的心境。而菲亚里奥则与之相反，他整个人充满了本能与热情，他像个画家似的看着画着。他主要是受到事

物和人物的外表形态所触动，他首先就是一个风景画家。他的作品同他那种东抓抓、西抓抓的性格一样是零七八碎的，主要针对的是人们的感官，而且他对壮观惊人的场景、对色彩以及动作的偏爱，又使他成为一个印象派画家。他极端酷爱强烈的对比，这表现为色彩与感情上的冲突、大量的装饰成分以及形式上的刻意加工，又使他成为一个巴罗克派。的确，高雅与怪诞，或是纯洁与邪恶，都天衣无缝地在一个阴暗的环境中结合在一起，加上悲怆的成分，从而带上了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在幽默方面，菲亚里奥也不具备埃萨·德·盖罗斯的那种纤细的、入木三分的、一针见血的、然而又带有某种天真善意、温文尔雅的讽刺笔法。在他身上幽默就等于是天打五雷轰的讥讽，挖苦则是大刀阔斧，使尽了手中的狠毒揶揄手段，直冲向对方，深深地刺进去，猛烈地刺进去，狂怒地刺进去，甚至是咬牙切齿地刺进去。不过，如果仔细用心读他著作的某些段落，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菲亚里奥的笑声（这从来不是坦率的、毫不介意的哈哈大笑）中，仍然掺杂有被自己所使用的武器打中了的不幸者的呻吟。他那种讽刺的气质，被他用来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种种愚蠢可笑的现象。可惜的是，他那种漫画式的讽刺，他那种无礼

不敬的笔法，他那种里面塞满了刻毒苦汁的取笑，当他加以使用或加以滥用的时候，并不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这两位作家作品的区别还有一个根本之点。《马亚一家》的作者对资产阶级的讥讽之中，从来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也得其门而入。而菲亚里奥则相反，他挑选的人物总是在路边排水沟里、在医院里、在田野里碰到的最为不幸的人们。这是哀求施舍而不可得的穷人，是那些在床上苟延残喘的身心俱病的病人，是那些在田野上劳动的被剥削到最后一息的粗工。一讲到菲亚里奥，马上多多少少使人想起一大群满身疮疤、缺肢短腿的或是落入穷困不堪境地的乞丐。总而言之，一提到菲亚里奥就不禁重新看到了一群群贫苦的人，他们的屈辱和痛苦油然浮现在纸上，这一页页纸都冒出一阵阵人生的辛酸味。

菲亚里奥的散文独具他的个人特色，其不同于他人之处，就是它的独立性，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的散文同卡米洛·德·卡斯特罗·布兰科一样雄壮有力，但是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处处可以遇到大量使用生僻的词句。古旧用语同新词新语齐飞一色，使人不禁吃惊；地方土语和平民用语（我们不要忘记，在菲亚里奥身上艺术家的高雅

纤细同平民的粗野是并存的)同技术或科学用语一起,比比皆是;或者有时冒出一些过分大胆的语气强悍的字眼,使用的目的似乎是幼稚地认为这一来就可以让更为正统的人看了大哗。这位艺术家所采用的奇词怪句,对于本国语言纯正性毫不客气地加以袭击。菲亚里奥的散文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词语,一个主张语言纯正的人看了不一定感到那么舒服。在他的散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怪诞不经的做法,就是掺进了一些粗言俗语和一些品味很低的矫揉做作词语。这一大堆兼收并蓄的大杂烩就产生出了一种十分独特而且十分多样化的风格,而对于这种多样化,菲亚里奥本人也很有理由引以为自豪。他在《在街角》的序言中说:“我是葡萄牙少有的几个以题材决定作品风格而要笔杆子的人之一。”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菲亚里奥所特有的那种对独特风格的追求(他本人骨子里是一个浪漫主义性格的人),是“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位作者在他一生的某一阶段是持这样思想的。悲观主义、万事万物均属荒谬,均属无常的人生观,以及艺术上的完全自由放任,这些都是颓废主义的若干思想依据。在菲亚里奥看来,语言应该走最艰苦的道路,不断地、痛苦地追求前人之所未言。总之,他探索一

种“对心灵的一切姿态和印象的一切微观”都能适应的语言。

菲亚里奥的一些同时代人，当面指责他的散文（这些散文往往采用一些他们认为过分激烈，使温文尔雅的女性受不了的言词）会损害淑女们的羞耻感。但是，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这种文风，因为他认为“一个文人的第一个职业本领，就是要懂得如何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风格来装扮自己的思想”，而对于人家对他风格的抨击，《猫》则以自己尖酸辛辣、单刀直入的方式予以反驳：

“人们后来又捧出淑女们的羞耻感受到冲击这一个理由来同我争论，因此，我不得不说，我国的淑女风范是一种虚假的、愚蠢的假想。公主们在文学中是不可能有什么脏话的，有的是脏事，是下流事，是实实在在见不得人的丑事，不是作家们捏造出来的，而是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事来说，见诸文字只是给它们一个必不可缺的文字符号而已。因此，如果要防止杂文作者写出一些带有平民习气的文章以保护妇女的羞耻感，就需要设法使社会不那么粗野，使他们的丈夫和兄弟不那么流氓气。”

民间脉络也是菲亚里奥广泛利用的一个因素，他总是承认，他从最好的朋友即老百姓嘴里得到的教益

是十分宝贵的：

“听老百姓说话，看到他们嘴里流出一串串富有想象力的词句和充满风趣的表达方式，就使人对我们大多数作家的那种摆起架子故作姿态的做法感到失望，这些作家脱离了祖国生活的丰富泉源，使语言降低为一种可怜的方言。”

菲亚里奥也是从与老百姓相处当中得到了充满风趣与活力的启发力量。

“我要说，星期六在一家低级咖啡馆里能收集到的笑料和滑稽题材，比半个月在里斯本所有文学中心收集到的还多。有人听我这样说也许会发笑，但是，过后他们会承认我的偏爱是有道理的。我偏爱那些无拘无束的、哈哈大笑的平民百姓的会面，他们信手拈来的即兴之作，比起前一天看到的法国报纸上的故事毫不逊色。”（《猫》）

我们这个引言篇幅有限，必然只能是简短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就民间语言对菲亚里奥的语言的影响作出哪怕是简明扼要的分析，但是学者如果有志于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参阅一下克劳迪奥·巴斯托的题为《菲亚里奥的语言》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可以找到充分的材料，领略到这位作家给我国语言带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纯粹来自民间的诗意。《猫》的作

者在满腔热情地研究我国人民的为人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时候，又同样显示了自己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

但是菲亚里奥表现最突出的还是在短篇小说方面：《短篇小说集》（1881年）、《罪孽之城》（1882年）、《迷人的里斯本》（1890年）、《葡萄之国》（1893年）。菲亚里奥在短篇小说这个领域找到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他善于利用这个空间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总是熔抒情、奇想、社会性与乡土性为一炉，这些因素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构思。乡土风情成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的背景，这些小说总是以田园生活的简朴为主题。《磨坊的晚餐》和关于动物行为的杰作《小牛犊》，是两个许多清新的、不含任何神秘与奇景的散文典范。

然而，同这些明朗耀目的图景一起，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涂上浓浓的贫困、弊端与疾病油彩的画面。菲亚里奥在医科学生时期就十分熟悉医院环境，给他提供了启发，也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来创作出《红发女郎》、《三具尸体》及《偷窃》中的那些自然主义学派的场面。

黑夜是最为便于追忆、便于产生超自然效果的时段，它迷住了菲亚里奥，使他同自己达成和解。正是在黑夜里，菲亚里奥摆脱了他的那些鬼魂，藏身于暗影之中浮想联翩。又是在黑夜里，他觉得里斯本更为

美丽，更为随和。在这样的时刻，-梦想以及种种幻觉的景象，达到了胡言乱语的地步。充满了狂想的乡间黑夜，向他启示了“一种叙事歌谣的场景”（《葡萄之国》），而夜幕下的里斯本，则使他想起了“伦勃朗^①和古代的蚀刻画”（《迷人的里斯本》）。

菲亚里奥这位“抒情作家”喜欢把痛苦、死亡和大自然这些题材带进他的作品中来。在《庞巴尔的被抛弃》这篇以一种神秘与不祥之兆的气氛展开的文章中，笼罩着一种死亡的情感，表现为飞鸟的奇特行为。大体上说来，菲亚里奥的短篇小说对读者的感觉是变化无常。有时结局是意想不到、总是使人苦恼的，《癌症》即其一例；有时则是一次肮脏卑鄙与野蛮粗鲁的拥抱，例如《穷人》；或者是病理学领域的一些病例，例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红发女郎》。

短篇小说《收割工》成了有名之作，凡是想熟悉菲亚里奥著作的人，这部小说都是必读的。的确，这部小说不但表现了阿连特茹的收割工人挣扎求生，表现了他们如何成了这片平原的奴隶，如何不得不在非人的条件下卖命干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人们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在肖像画和人物构图中善于以概括的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以及运用笔法表现出质感。

感情的探索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这里，印象派大师的言词加上画家的梦呓般的色彩，简直将莫名其妙的读者赶到了地狱般的大炉子里。在这里，炽热的太阳在煎熬着大地和人们的肌肉，已经在沉重的劳动中筋疲力尽的身躯还要应付烈日难以忍受的煎熬。艺术家原先计划完成一系列以我国农村的人们胼手胝足艰苦劳动、心境辛酸、生活贫困、一辈子受剥削为题材的画面，然而他原先的设想并未能实现。

菲亚里奥的某些短篇小说是在一种鬼影幢幢、心慌意乱、恐怖可怕的气氛中展开的。这种气氛很像我们在英国的哥特式小说、盎格罗—日耳曼的叙事歌谣以及我国浪漫主义的诗歌中所遇到的。这些短篇小说也使我们想起了德国的霍夫曼^① 和美国的爱伦·坡^② 的那种恐怖力量，后者是靠波德莱尔的译文而在我国流传。事实上，菲亚里奥某些散文之所以偏重于恐怖，或者偏重于日常生活中忽然发生的无法解释的现象，

① 霍夫曼 (1776—1822)，德国小说家，作品宣扬神秘主义，描写“不可思议的黑暗势力”，以艺术同现实相对立，其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对欧洲颓废派文学影响很大。除文学活动外，还从事作曲和音乐评论等工作。

② 爱伦·坡 (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作品色彩阴暗，充满恐怖气氛，对西欧特别是法国的颓废派和象征主义影响很大。

是由于受了这些作家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奥菲洛·布拉加的《奇幻短篇小说集》以及阿尔瓦罗·杜·卡尔瓦利雅尔的《短篇小说集》对菲亚里奥作品中的奇幻成分的影响。

作为他的短篇小说中奇幻成分的一个例子，可以举带有民间色彩的《侏儒》为例。他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身躯细小到难以置信的主要人物：“卡拉斯金约已年过25岁，他身躯短小，小极了，小到了有一次晒太阳的时候站到一棵卷心菜里，不料来了一头母牛，连人带菜一起吞到了胃里。人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牛胃里弄出来，全村的姑娘们都自告奋勇，愿意把他这段历险记带来的一身污秽洗涤干净。一年复一年，他长大成人，长了胡子，嗓子发出的声音也变粗了——但人却越变越小，这个卡拉斯金约！”

“一天下午，主人正在大厅接待维拉尔瓦的一些大亨，卡拉斯金约进来了。多么不凑巧，他走到了放在椅子上的一顶毛呢帽子跟前，低下头去瞧一瞧这顶帽子，不料哗啦一声，他头朝下掉进了帽子的深处，现在你看有谁能把他从里面拉出来吧！”

读者一路读下去，文章写得有声有色，趣味盎然，读者脸带笑容，这个笑容一直保持下去，直到小说快

要结束，这场闹剧忽然变成了悲剧。卡拉斯金约成了一个误会的牺牲品，被一个粗野的人杀死了，死得很惨。这个奇幻的人物，同时又充满了现实主义，叙述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玉米粒”。读者原先对这个人物已经熟悉了，接受了，但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多么深陷其中并参与了这种“假戏真做”的游戏。因为读者原先已经接受了卡拉斯金约这个怪人的存在，而且同他每日遇到的问题休戚与共。所以，到结局如此凶残时，读者也为之伤心，同时，读者对这部短篇小说的最后几行散发出的诗意和现实主义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明朗的早晨，一道阳光像箭一样射穿天空的珍珠贝，一直晒到蒙多乌多的白墙皮。卡拉斯金约的身体猛然被推下去，碰到了教堂庭院那些古旧的基地砖石而缩成一团。”

卡拉斯金约最后使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的无数卡拉斯金约。他们是些毫无防御手段的人，受到各种各样不公正的对待，困守在卑微寒酸的地位，在人世间几乎是无人知晓地走过这一趟，生时是在人间邪恶、愚昧、冷漠和无知当中生，死时也是同样在人间的邪恶、愚昧、冷漠和无知中死去。

菲亚里奥的调色板上有多多种多样的色彩，他按照主题加以巧妙的调配，从而产生出生机与美跃然纸上的篇章。这位艺术家以令人钦佩的眼力捕捉景物，以激情与幻想的梦呓来加以刻画，声与光完全和谐地溶为一体，但是这种艺术上的光芒是以牺牲情节为代价的，情节也就这样被贬到了次要地位。他在细节与装饰的描写、刻画上是无与伦比的，只要大笔一挥就能刻画尽致。但是（正如他学生时代就已经表明了），他缺乏条理性，不会将事情摆平去构成一个整体。他的作品全是枝枝节节的、不连贯的、不配套的。也正是这种零敲碎打的作风，说明了他如何没有能力去创作一部大部头的、统一而首尾一贯的著作。实际上，菲亚里奥把精力分散在新闻纪事上、讽刺杂文上以及一些并不总是写得十分成功的短篇小说上，而种种题材却零零星星地飘来飘去，依一时的需要或一时的情绪而表现出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时而自称为保皇派，又时而自称为民主卫士，时而自称为唯物论者，又时而自称为精神论者，甚至是异教徒或神秘主义者。

菲亚里奥还有一点为人所诟病，那就是他未能给自己的人物赋予一种高级的心理生机。他的人物通常都是受动物本能所支配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恶习、贫

困与重担所压服，或是沦为人间的破棉烂絮，成为命运或他人所设下圈套的牺牲品。他对这些人物只给予外表上的观察，而没有对他们人性的最深处即心灵进行必要的解剖。这是一些不健全的人物，因为他们缺乏内心的生活，有时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被构思出来是为了给美学家一个借口，可以对自己的风格得以发挥而沾沾自喜，可以展示自己那种天生的印象派艺术家的描写才能。其实，要了解菲亚里奥我们就必须明白，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去破解人类心灵最深处奥秘的心理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对一切都仔细地加以观察，然后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技术风格，一气呵成地再现与传达自己在一瞬间捕捉到的形象。

实际上，在菲亚里奥身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并不总是能相互调和的天性：又是艺术家，又是批评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留给了我们一些极美的篇章，其中我们要着重提出的有《墓地上的圣母像》。这篇作品展示出了一种想象力，它能够穿破物质性的界限，冲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是傲睨万物、咄咄逼人的。他抓，他搔扰，他破坏。社会往往是他喜欢拿来加以尖刻无情的批评对象，《俾众周知》中的

一些段落就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指责葡萄牙是“……一个墨守成规、性格不确定的……、懒散的、妒忌心重的、厌恶劳动与贫困的……国家”。菲亚里奥作为一个杂文作家，他为自己有关新闻事业的主张辩护，认为新闻事业是唯一能指出错误并提出可能解决办法的权力（继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之后）：“目前，唯一能一针见血的新闻事业公式应该是对我们周围的自私自利的、患梅毒的社会卑鄙虚伪加以鞭挞的公式。”

但是他的批评当中往往也隐含一点微笑。实际上，菲亚里奥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纪事作者，作出了大量的评论，其中有许多是充满独立精神与特色的。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奥利韦拉·马尔丁斯报上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据当时目击者说，这些文章写得十分轻松迅速，令人难以相信，作者甚至不作任何修改。作为艺术与风格批评家，菲亚里奥给我们留下了《挖苦集》（1890年）、《讽刺的生活》（1892年），尤其主要的是《猫》（1889—1894年）。《猫》是一大批杂文，有效地将讥刺和挖苦结合到一起。

4. 阅读《猫》

“……也正是因为如此，看官，
你就在这里看见，我们发出的咪咪
声并不多，但我们总是在伸爪子抓
着，而且总是毫无畏惧。”

菲亚里奥在《猫》（自1889年至1894年每月编一次的文集，后来合编成6册）中，像猫一样将自己锋利的爪子抓住当代社会，被他抓过后，在他利刃似的嘲笑和横扫一切的无礼“大话”之下，这个社会从他的爪子下脱身时，已经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了。

组成这些文集的那些文章，以日常发生的事为题材，像大瀑布的流水一样哗啦哗啦地一篇接着一篇写出来，不遵从任何特别的公式或体例。《猫》连篇累牍地记录出对各种各样题材的观感，逼真地勾画出一个没落中的社会。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甚至是堂堂国王，都逃不脱他那毒蛇般的、向一切人喷洒出毒汁的舌头。他的批评是破坏性的，有时甚至是不公正的，但其中也隐约显现出其建设性的一面。确实，教育的现代化、对文学艺术的保护、戏剧的改革以及体育的发展，这些都是菲亚里奥热烈主张的事情。不

过，这些题材在他这一大套作品中贯穿着的、堆积如山的批评责备当中，就显得有点被淹没了。

菲亚里奥为了作出对平庸（或至少他认为是平庸的东西）予以公正对待的榜样，有时甚至不惜让那种出口伤人的倾向把自己带到危险的境地，而采用了严酷的针砭之法，方式又十分粗暴无礼，甚至达到了过分刻薄的程度。应该坦率遗憾地说，他在作家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去世之后撰写的那篇有关死者的文章就是如此。这篇文章，当时与菲亚里奥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格调极为恶劣的。它冷嘲热讽，简直是恶言毒语。本来菲亚里奥的某些友人与同时代人在他身上还看到有一种与人为善的性格，我们现在这些普通的读者，从他全部作品的整体中，也可以证实他的确有这样的与人为善的性格，但这样的性格，在这篇文章中却丝毫不见踪迹了。当我们大家看到这位作家谈到贫苦无告者和老人们通常表现出的深切柔情，都为之感动（当然，由于敏感性高低不同，我们有些人感动得深些，有些人则浅些）。《猫》最后一册中引录出的一段是用诗的语言写成散文，充满了节奏感和同情心，专门针对首都贫民触目惊心的艰苦生活情景。这一段也许可以证明这位作家的性格中确有与人为善的一面：“那些受难者的大合唱当中，有一组人的声音特

别压倒其他人，使我听了为之心碎，那就是一批老妇人。她们在寒风凛凛的一月份的黑夜里，穿着暗色衣服，羞容满脸、面无血色地在高楼大厦的暗影中熙熙攘攘的幸运者身旁轻声乞讨。这些乞讨声也许只是些零七八碎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天主，天晓得是不是还加上对天主保佑已经不敢抱希望的走投无路的哀叹。”他人的痛苦对他总是一种折磨，这一点有一个证明（当时他的同学就证实了这一点），就是当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对病房中病人的痛苦是无法漠然视之的。

然而，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忘记，菲亚里奥曾贸然对相当一大批艺术家，其中包括艺术大师科隆巴诺^①进行过揪住不放的（而且是相当不讲理的）批评，至于他针对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发动的往往是盲目的、任性的而且总是暴烈的攻击，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无论如何，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认为，读者如果事先阅读过菲亚里奥其他一些文章，那么，在看到 he 这篇关于《新灵魂》作者^②的冷酷无情的文章时，虽然对其严酷感到震惊，但也不至于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我们看这篇文章时，先是感到一阵不舒服，但看到最后，除

① 科隆巴诺（1857—1929），葡萄牙著名画家，画作甚丰，有《圣安东尼》及诗人安特罗·德·肯塔尔、埃萨·德·盖罗斯。

② 《新灵魂》是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1846—1882）的作品。

了恐惧、憎恶与惊愕交集之外，什么都剩不下来了。如果再回忆一下《投枪》中一章的赞扬之词（拉马略·奥尔蒂冈在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 1882 年 4 月去世之时追忆了这位诗人的才华），我们就会对这一段话同菲亚里奥的意见如此完全相反大感惊讶。不妨从那一章中摘引一段作为例子：

“再也没有哪一个葡萄牙作家有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这种缩细化微的才华，这种得天独厚的以极细小的寥寥几笔速写勾勒出范围极广阔的题材的能力，这种将明明要占 4 栏篇幅的文字压缩成 4 行、压缩成一句、压缩成一个小标题、有时甚至压缩成一个词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善于驾驭字句，完全制服住字句，并使字句听从他那支最有想象力、文思最丰富的铅笔下信笔写来的种种表现方式。

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生前曾给《安东尼奥·马利亚》、《消息报》、《晨报》撰写了许多风趣的、有理智的、天真善良的、诙谐的杰作，他的去世使这几份报刊遭到了无可补偿的损失。”

再往下，有一段像是结论：

“他一去不复返了。施亚都广场再也不会看见他在下午 4 点钟时走过了。葡萄牙新闻界再也不会会有他那风格纤细的讽刺笑嘻嘻地展翅翱翔了。假期期间，那

位在圣塔伦之谷写了《新灵魂》的美丽诗句的人再也不会芳香的三叶草和野花丛中漫步越过田野了。”

现在再比较一下菲亚里奥对吉利尔梅·德·阿泽维多抒情诗才的严酷评价：“如果打开他这个时期的两本著作，即《幻觉》和《夜间的辐射》，去寻找一下诗中所不可或缺的情感，那么，能找到的只有节奏而已，而且这些节奏也是很缺乏独特之处的。看不到任何活生生的、闪闪发光的创造，也看不到任何人生隐蔽在深处的本能和任何代表永恒的火花，也没有任何心灵的冲突在广阔而炽热的辩才火光中使痛苦幽灵化。官式的诗、那些用头脑而不是用心灵写的无名诗、生硬的诗，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隐蔽奥秘，是所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们写的诗。他们爱着、信仰着、否定着或是呼唤着，完全按照语法造句课上教的那一套格式依样画葫芦。这对我来说，就等于完全否定了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价值。这样一个受人鄙视的人，怎么不会抱怨呢？卡西摩多^① 假如有爪子可以弹奏七弦琴，那么，他被鞭笞时弹奏出的就不会是哀曲，而是雷鸣。吉利尔梅的诗太文绉绉了，所以无法是真诚的，由于是弄虚作假的，而使他丢人现眼。所以，我宁可相信，他

① 卡西摩多是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丑陋但心地善良。

并不会由于缺乏伟大的诗才而爆发出人生的伤感，他的哀歌只不过是靠耐心和从济贫院的哑吧们那里学来的一些雕虫小技。”

菲亚里奥对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的散文，也一样严厉地加以批评：

“这是他厚厚的作品中的一部，阅读这些篇章时，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气喘吁吁的、了不起的、彬彬有礼的长矛修理工；文笔是清楚的，没有什么旋律上的抑扬顿挫，词句流淌下来，不痛不痒，只显出对题材的认识；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定见，《西方纪事》的那3年，关于里斯本的生活只展示了四则轶事题材。看它一篇纪事也就对所有纪事都知道了：要么就是有关热或有关冷的文学交响乐的开端，要么就是有关施亚都广场和哈瓦那之家咖啡馆的叙述，接着就是本周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闲扯，总是那一套……又是贝顿船长呀，又是圣卡洛斯剧院呀，又是谁去世了呀，又是三一教堂如何呀，猫在哪里呀，等等。至于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很少能够知道。他有耗子的本领，能逃避表态，闪身躲到一边，像小丑一样滑稽地一闪而躲开，造成幽默气氛，摆弄一些圣塔伦情歌歌手时代的那些软绵绵的形象——在风格上刮鳞，只接触一下文学皮肤上的毛病，不痛不痒。”读到这里，我

们就有点不愉快地看到，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对于我们再也不是拉马略所称赞的那个讽刺纪事作家，或是那个将城市环境的现实加以变形从而为塞萨里奥·韦尔德^①开了先河的诗人了。有了菲亚里奥的这一番话，还有别的一些话，使这位诗人的形象蒙上了无可补救的污点，而且我们越是读下去就越是发觉，他最后硬塞给我们的形象几乎是一个坏蛋的形象，仿佛这是他的精神病院中的奇人怪物之中的一个。当然，我们心中一直对《猫》的作者采取的这种态度保持着厌恶感，他抓住对方瘸腿这一点不放（取笑他极力向一切人隐瞒自己的身体畸形），以令人反感的方式贬低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的生平与作品。但是，这种恶语伤人的种子撒出去并没有白撒，因为读者心中也油然而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厌恶心情，因为文章中揭示了他病情的某些内幕细节，他在巴黎迪布阿医院去世的经过，他在圣汪坟场下葬的经过。读者不知不觉也就会对这位圣塔伦诗人的某些言行产生出鄙视的心情。

在这种对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身体缺陷的残忍批评中，还隐含着对健美及体型匀称的颂扬。的确，

① 塞萨里奥·韦尔德（1855—1886），葡萄牙诗人。

对美和健康的关怀一直是菲亚里奥放在心上的。在《一年的评判》中他热情地提醒我们：“别忘记，健康、精神上的愉快以及青春肉体的鲜美是真正的高雅风度仅有的条件。”但是，就是这个人又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他所选择的人物通常都是一些凭本能行事的人、一些病魔缠身的人、一些命运多蹇的人、一些典型的有身体缺陷、残疾或种种不平衡的标本人物。

菲亚里奥是个不执业的医生，他将医学的某些概念搬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传播了一门当时正开始有眉目的科学，即优生学。优生学研究的对象是如何改进人类的体质与精神，它所处理的问题是遗传及健康。因此种族、血缘及对婚姻的监督，是菲亚里奥直言不讳地大胆论述题目中的一部分。他的老师与朋友索乌萨·马尔丁斯曾启发过他对遗传决定论的兴趣，以及他那种认为天才只不过是变异的最高形式的信念，正符合泰纳、马克斯·诺尔道与隆布罗索的原理。

菲亚里奥酷爱一般的美、没有性的美，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却是身体孱弱体格瘦小的。不过，他还是对我们说：“……看不见文学对这种造型美的崇拜起了什么影响。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必须具备三条，一条是聪明，一条是强壮，一条是美”（“旧里斯本与新

里斯本”载于《迷人的里斯本》，1890年）。对这位优生论者来说，健康和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美的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但说也奇怪，这种美却又同病态联系在一起。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红发女郎》中的女主人公卡罗林娜，“很美，脸上肌肤细嫩而神经质，全身都显示出贫血。”

菲亚里奥性情变化不定，老是脾气暴躁，神经衰弱很厉害，而且他也深知自己的劣生血统对他的整个事业都可能起制约作用（关于这一点，安东尼奥·萨尔丹雅后来曾写道：“菲亚里奥就是一些骚乱不安感情的不断复活，这些感情与其说是他本人的，不如说是他那些已故先人的”）。他第一次在《开场交响乐》中触及血缘问题时说：“……有时候人种之所以交配得不好，是由于血缘婚姻命中注定的，这样的婚姻，是由于镇与镇之间的距离造成的，而且也是因为每个村落和乡镇总以一个或两个家族为核心而生下来的后代，由于膳食不佳，经过若干代都退化成一个划一的类型。”

这个问题在《猫》中也同样提及：“用脑过度使得人们的繁殖受到毒害，往往子女要偿还父母在生理上欠下的债务。”在另一段文章中，他本人也承认，他的脑子“从遗传上本来就容易产生高度神经官能症的那

些半假半真的可怕错觉。”血缘婚姻的失败以及年老多病的父母产下的劣种后代，是这位作家喜爱探讨的题材：

“……出身门庭的标志并不能造就领袖，后代子孙反复的血缘关系，使得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的整体都是由歇斯底里和梅毒所编织而成。这样的血缘关系，也造就不了英雄”（“小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载于《刮脸、梳头》）。在《挖苦集》的“城市三态”一文中，菲亚里奥甚至声称，“生育者一旦成白浊病者也就不再成其为生育者了。”人们这样就逐步接触到菲亚里奥以似乎坦然的口吻谈论最微妙的优生学问题之一，即对婚姻的监督：“对于这一系列对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最后还要补充上一个问题，而且是超出其余一切问题之上的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卫生警察对婚姻的干预。这个问题眼下还只是理论上的，但它却是一个办法，可以防止病态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使后代劣化，以至于达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极端程度。”（《刮脸、梳头》）。

那么，爱情呢，这位短篇小说家对爱情又是怎么样看的呢？在菲亚里奥看来，爱情是一种微妙的感情，是高尚的、健康的，它导致婚姻与生育，因此，他谴责凭本能的爱情、凭性欲的爱情。他在《禁书》的

“一年无判断力”一文中，指责“一切只凭自己半盲目的性欲本能去爱的人，这些人像狗、驴子和鹿一样，至多只承认叔本华所发明的物种性格是他们爱情的心理动机。”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也以艺术批评家的姿态在我们面前出现。他一任自己的创作想象力驰骋奔腾，在1906年《葡萄牙启蒙》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套有关里斯本建筑样式应该如何的原则，他希望看到里斯本这座城市能现代化，能同欧洲各国首都比美。这篇文章是在美术学校与全国美术协会所主办的一些展览举行过后发表的，后来收进了《刮脸、梳头》一册中。那种曾经昙花一现地使人对一种新风格产生希望的“新艺术”，似乎引起过这位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由于这种艺术在装饰方面采取了巴罗克主义。菲亚里奥作为艺术家，虽然对华丽排场和宏大气魄很欣赏，但却在《猫》的几期中担当起了批评家的角色，对自由大路工程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修建自由大路将要代替公共通道，修建工程早已在1879年动工，主事者是当时的市政厅主席罗莎·阿拉乌儒。在这篇文章中，菲亚里奥写道：“令人真正感到伤心惨目的是看一眼复兴者广场，一眼望到隔离监狱，那里歪歪扭扭地竖立着一排郊区房屋。沿着路摆着扁扁的，但又高高的，屋顶

暗不透光，通气窗像是粮仓，阳台又小又窄，分成单元出租的房间发出的气味使人体体会到房东的吝啬。”

同时，这位批评家也猛烈地揭露贫民窟中比比皆是的贫困现象，创作出了一些形象。这些形象使我们瞠目结舌地看到眼前显现出的丑恶情景，那就是一些“狭窄的、布局乱七八糟的、破破烂烂的房子，曲里拐弯的街道，空气又不流通，阳光又缺乏，自来水管本来就不够，又在房间底下没完没了地堵塞着，还有种种污秽的东西和生活遗弃的垃圾……”（《猫》）

创办空气流通的、清洁的、明亮的民用住宅，的确是他在为葡萄牙社会设计一个身心卫生方案当中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吸引住了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注意力。教育问题在他看来是受生物决定论所支配的，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在葡萄牙真是万废待兴。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全都是一些空洞虚浮庸才的制造所，有什么创造精神都受到压抑。”（《突出的形象》）。的确，教育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也就是说，教育之普及于最贫苦的阶级，在他看来是解决我国各项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同马西亚斯·皮卡维阿的看法相反。是菲亚里奥的藏书中有皮卡维阿的著作，他在1899年的一篇短短的论文“国家问题”中，主张以独裁作为一

个可能的解决办法。菲亚里奥虽然有时偶尔也对葡萄牙人民不信任，用一些很激烈的形容词来加以鞭挞，但他还是主张使葡萄牙人民获得振兴：“我认为，如果有谁使大众能够自己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将教育当作现代生活的最大最首要的问题，以便通过教育取得自由阳光下繁荣昌盛的、文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那么，他就是做对了。”

菲亚里奥对他那时代的葡萄牙社会作了许多批评，其中之一就是葡萄牙人根深蒂固地表现摆阔气的习气：“一家人躲在家里吃的只不过是竹筴鱼，穿的袜子是破的，小孩子害瘰疬，在污秽中打滚。但他们几乎全都有自己的大厅，穿得衣冠楚楚，全副行头，用这种方式在公众场合掩盖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处境。”

而菲亚里奥这段散文文字又使我们追忆到文艺复兴时代，追忆到尼古劳·克列纳尔多的一些有趣的观感。他是一位佛兰德的人文主义者，曾在我国居住5年，对在我国看到的某些习俗感到大惑不解。这位大师写的信（这些信对于分析16世纪的葡萄牙社会极有价值）中有一段话，虽然有点戏谑，但仍可以引起人们对葡萄牙人性格的某些方面进行严肃的反思。从克列纳尔多给他的朋友拉托莫写这封信，到菲亚里奥写出前面提到的那几行，当中相隔三个世纪之久。然而，

无论是那位外国人的观感，或是我们这位同胞的观感，都能使我们看出葡萄牙人古往今来的一贯形象，就是习惯于大手大脚，生活花费高于自己的财产。上述那封信有一段值得转抄一下，它清楚地记录了这种摆阔气讲排场的迷狂和总是千方百计力求表面光的心态：“……这使我回想起某一个人，从这个人的例子，你也就可以推论出其他人如何了。下面我给你描写一下这个人的相貌。他同一个外国人闹别扭，我想大概是个法国人，他是在曼努埃尔国王时期作为王后列奥诺尔家族的一个成员前来葡萄牙的。这个葡萄牙人在外表上的豪华比那个法国人高出一筹，但那法国人却吃得更好。这个法国人不知怎么知道了当地的习惯，而且出于好奇心，就用巧妙的办法弄到了对方记录每日花费的帐本。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有一处十分好笑的地方，但这正是具有葡萄牙特色的。他发现了下面一段日支出帐：

水费……4 个塞伊蒂

面包……4 个半雷阿尔

小萝卜……两个雷阿尔

他看到这个人整个星期的支出帐都是花这些钱，他本来设想，星期天，起码星期天他会打一顿大牙祭吧。但是，到了星期天（他看见了什么？）他只看到写下这样

的帐：

‘本日没吃，因为市面上没有小萝卜。’”

克列纳尔多接着又带讽刺口气地说，葡萄牙有“一批豪华的吃小萝卜为生者”……。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补充的是，好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企图拿来掩盖其穷困潦倒境地的假排场，本来也许是十分有趣的事，但可惜这种做法毋宁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标志。它说明了我国人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多么不作长期打算，这是一个“由具有富人意识的穷人组成的民族”，这句话是埃杜阿尔多·洛伦索在《怀念的迷宫》中提醒我们注意的。

葡萄牙戏剧所处的残缺凋零的状态，也是菲亚里奥批评的一个对象。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我国文坛的一些著名人物就已经提出怀疑，究竟我们本国的作者有没有戏剧创作的爱好的，葡萄牙戏剧究竟存在不存在。1838年在《吉尔·维森特叙事剧》的序言中，阿尔梅达·加雷特提到了葡萄牙民族“对戏剧的贫乏天赋”和“抗拒”，而1871年埃萨·德·盖罗斯又在《投枪》中认为葡萄牙民族没有“戏剧天才”。至于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他在1906年发表的一篇谈话中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葡萄牙人的文学素质几乎完全缺少了”戏剧所必需的那些条件，例如

“神经上的简练压缩、行动的紧凑紧张以及综合分析的能力”。

然而，尽管我们民族显著的个人主义气质使我们偏向于抒情诗，而不那么注重戏剧诗。但是，我们本国的戏剧是一直存在的，它同葡萄牙社会本身的结构是息息相关的。从前有人认为，葡萄牙戏剧是在16世纪初叶从吉尔·维森特才开始诞生的，但是，这个论点今天已被抛弃。其实，当时已经有了许多零星分散的戏剧现象，吉尔·维森特这位大师只是加以再创造使之获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吉尔·维森特的戏剧是以民俗传统及宗教表演为依据，忠实地刻划了宫廷社会的伟大辉煌和贫困败落。吉尔·维森特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也是近代最早一位剧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民间的、宫廷的与教会的各个侧面凝聚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活力，直到今天其显著的现实性仍然使我们看见了为之感到惊讶。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吧。菲亚里奥是剧院的常客，他坐遍了剧院的座位，不断地寻找他一直未找到的完美性。当时流行的是自然主义戏剧，它注重揭露衰败中的社会种种脓疮，对这些脓疮加以无情的解剖分析。自然主义主张社会

与生物决定论，我们所看到它最具特色的代表就是特赛拉·德·凯罗斯（《资产阶级喜剧》），尤其是写《社会病理》的阿贝尔·波铁略。这本作品由于引起轩然大波而蒙上了一个光圈，对当时以种种尖锐反差为特点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共和派的原则也影响了如西尔瓦·平托、安东尼奥·厄内斯和库尼亚·贝棱，他们写出的剧本受到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很大。至于热瓦西奥·洛巴托的喜剧，特别是埃杜阿尔多·什瓦尔巴赫和索乌萨·巴斯托斯的“每年活报剧”，则以幽默的笔法勾勒出19世纪末叶里斯本资产阶级的容貌，而同时又对当时政客们的恶行和笑料加以谴责。

菲亚里奥·德·阿尔梅达照自己的习惯行事，对任何人都不放过，都作出挖苦的评论。他在1896年（“剧坛状况—活报剧”载于《演员与作者》）告诉我们，活报剧的作者们是一批“耍弄文字的低级艺人”，他们“嘲弄警察的宽容，把舞台变成一个政治谩骂的臭水沟，有弹奏法多的王后，有拿着撬锁器打开钱柜的大臣。”但是，连加点风韵妙趣而不可缺少的歌女们也逃不了他的讥讽：“幕徐徐升起，布景是一片森林，开始出来了一些穿着泳衣的干沙丁鱼，她们象征着各门科学、艺术与道德……”（“剧坛状况——活报剧”）

法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戏剧在当时是葡萄牙主要采用的模式，有时就流于单纯的依样画葫芦，对创造精神起了妨碍作用。正如菲亚里奥在《猫》中的诉怨所说的：“总的来说，葡萄牙剧坛是靠译本过日子的，而翻译的选择，不是看原著能给观众提供多少美的享受，要追求春宫式的轰动效应，要在钱财上打算盘，而是或者是因为某一剧本中有某个角色能让某个喜剧演员卖弄一番。就是这样一种法国剧目，通常是最能引起译者产生改编为剧本的愿望，简直可以说，凡是巴黎走红的剧本没有不改编为廉价版本搬到里斯本来碰碰运气的。”

但是，我们觉得菲亚里奥的这一番话多少有点偏颇不公之处，因为一些著名的外国剧团到葡萄牙来，不单单使观众们有机会欣赏到一些光辉杰出的著作，而且还对一大批优秀演员的培养起了促进作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埃杜阿尔多·布拉桑、沙比·皮涅罗和罗莎·达马塞诺。

杂文作家菲亚里奥往往被拿来同葡萄牙生活的讽刺采访记者拉马略·奥尔蒂冈相提并论。无论是《猫》还是《投枪》，都企图成为对19世纪社会的一种调查报告，但是两位作者对这个社会的质询方式，却显示出了他们所抱的目的、所采用的风格、所持的格

调、所具备的知识都是截然相反的。拉马略·奥尔蒂冈有志于教育学，他在《投枪》中展示了自己博学多才，知识面广，甚至因此而受到埃萨·德·盖罗斯的批评：“你给我的印象像是穷人忽然继承了巨额家财。每次从兜里掏出手绢都要巧妙地设法让人家瞧见有一把一把的钞票。”但是拉马略对科学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又有十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比较严格的批判态度，所以他仍然不懈地努力要向那个似乎要陷在无知与乡巴佬状态中永世不得翻身的葡萄牙注入知识。他的文风采用十分简朴具体的词汇，表现得平稳有力，而这几乎是《猫》的作者一直缺乏的。他给我们提供一种洗练、秀丽和幽默的散文，而且总是保持在理智范围。这种散文的确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但却是铿锵有力的。不错，拉马略在对当代社会（它有种种矛盾、冲突、匮乏和贫困）进行分析时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和审慎有分寸，一直未能得到像菲亚里奥这样一个性情冲动的人的欢迎，菲亚里奥总是爱好言过其实、胡言乱语和狂谰。安德烈·罗莎曾提醒我们注意菲亚里奥给他的朋友、那位将象征主义引入葡萄牙的埃乌热尼奥·德·卡斯特罗的一封信，在信中记录了他对拉马略的猛烈攻击：“又及：——你知道那位圣多明戈巧克力的人吗？他完蛋了！你该知道，拉马略·奥尔蒂冈如果死

了，我绝不会有比这更不高兴的事。至少那个人的作品是糟糕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摆架子。酗酒胡言而不装模作样的还大有人在呢。”菲亚里奥同平常一样，在这里也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这样的批评也不是明智的、冷静的、公正的，而拉马略的作品理应得到明智的、冷静的、公正的批评。《悄悄话》的作者，即这封包含了对拉马略谩骂信件的收信人，曾给我们留下一段十分生动的描述，名为“圣多明戈的巧克力”。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略见一斑，看到菲亚里奥所提到的“酗酒胡言”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巧克力，实在是人类的天才发明了烹饪艺术以来所烹调出的最令人恶心想呕的食料；但是，在吃巧克力人的口中，它却像是萨尔达纳帕洛御厨中由女巫们烹调的佳肴似的。”由此可见，菲亚里奥作出那样不合适的比较是多么的不公正。

拉马略在抨击当时的社会时，特别注意而且特别猛烈鞭挞的，是上层阶级的无知与腐败和婚姻的不稳定。在猛烈抨击当中，他也掺杂了一点感人的天真幼稚。1882年他给葡萄牙社会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四百万颗互相剥削而又共同烦恼的、自私自利之心的随便凑合。”3年之后，这位新闻工作者又宣称自己十分厌恶“……那种心灵的空虚、那种感情的冷漠、那种自

然随便心态的绝对缺乏、那种发展到性格非人化与低劣化地步的粗俗的自私自利。”1887年年底，拉马略·奥尔蒂冈对当时的文化与政治生活感到破灭，就在里斯本成立了一个“封闭的俱乐部”，类似某种小范围的协会，亦即鼎鼎大名的“人生失败者”。

我们在这里要稍为离一下正题，插进另外一段话，向读者们提醒一下1887年年底开始在里斯本聚会的一批人，他们定期聚餐，先是在塔瓦雷斯饭店，后来又改到布拉甘萨饭店。这个聚会的“会员”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轻松轻松，他们都是本国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其中大多数是作家和政治家，包括有像埃萨·德·盖罗斯、奥利维拉·马尔丁斯和格拉·戎克罗这样的人物。

维安纳·莫格在他的《埃萨·德·盖罗斯及19世纪》一书中为埃萨·德·盖罗斯作传（他风趣地称这位《马亚一家》的作者为自己“床头的幽灵”）时，专门用一章来谈及“人生失败者”。他回忆说，在那个时候，里斯本的人们对这个由奥利韦拉·马尔丁斯在情绪低落时提议并经这个聚会的其余成员赞成采取的悲观主义名称，是丝毫不欢迎的。里斯本的人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政治阴谋倾轧，所以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新的秘密结社，怀疑它多多少少抱有不可

告人的目的。但是天长日久了，公众舆论终于发生了分化。那些对这一批人感到钦佩的，对“人生失败者”们漂亮的反驳连声喝彩叫好，对他们按照典型的本国风味菜肴的种种细节加以欣赏，并且对那些在当时卡洛斯·洛波·德·阿维拉主持的《时报》上刊登的种种逸谈、漫画和肖像感到开心。但另外有一批反对者，《晨邮报》就是他们的喉舌。这批人尖酸刻薄、言过其实地批评“布拉甘萨 11 人”竟敢大胆宣扬一种对本来就容易学坏的青年极为有害的怀疑主义，等等，等等。

这批人还被指责为“假清高”，也许是他们对于其他人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若即若离的讽刺态度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姿态。这种态度也许被他们的反对者当作是高高在上的表现。于是这批人就成了讽刺的对象。有些讽刺是十分尖锐的，其中有阿贝尔·波铁略写的一个三幕剧，名字叫做“人生失败者”，1892 年上演，但很快就停演了。平涅罗·沙加斯也不放过对“失败者”们加以挖苦，这些挖苦集中在一篇刊登于《晨邮报》的文章中。次日，埃萨·德·盖罗斯就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他所特有的讽刺口吻的答复文章。这篇文章申明了这一位朋友在此聚会的专门目的：“在咱们这个可爱的国家，这样聚会可能马上就使人产生

疑心，以为这些人是在组成一个工会呀，一个交响乐团呀，或者甚至一个党呀。凡是以安分守己为荣的人们，受到这样的猜测都会是十分不舒服的；自尊自重的心理就迫使他们在地方新闻中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们在某一天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掀开汤盆的盖子，交谈几句，对科拉雷斯葡萄酒的苦味评论一番。而且，这些定期聚餐会每次引起的交头接耳之声，并不是这些人造成的——而是那个如此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社会造成的。他们在用餐——而惊愕不已的社会却在嘀嘀咕咕。所以，怪并不怪在这一群失败者，而是怪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的组成状况，哪怕只要每周聚合一起用餐的十一个人胡言乱语一番，都会使它内部掀起历史性的轩然大波。”

骤然看来，一切都表明这个“聚餐会”的成员们其实是人生的胜利者而非失败者。但是，关于这一点，也许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埃萨·德·盖罗斯的另一段话，就可以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指出，“在人生中被战胜亦即被击败，并不是看这个人在表面的现实中落到了什么地步，而是要看他原先内心追求的理想是否达到了。”对“失败者”们的社会地位抱妒忌心理（这个地位是他所不能问津的）的非亚里奥·德·阿尔梅达，是最激烈反对他所称的那些“纠合在一起以便

终老的大老鼠们”当中的一个。他对这批人咬牙切齿，到了他所习惯的尖酸刻薄的地步：“——公众舆论总是不高兴地要问，这一批人到底要干些什么，有什么企图，向远处觊觎什么。答案很简单，人生失败者们，当纠合到一起的时候，要干的只是吃一顿；吃了一顿之后，他们的企图就是把吃的东西消化掉；消化完了之后，如果他们有什么要向远处觊觎的话，那或者是某个理想，或者是一个厕所。就让人生失败者们安安稳稳地吃他们的这顿饭吧。如果黑暗能使他们得到安慰，忘掉公共生活中的苦味，那么咱们就只说这一句话收场吧：历史并不总是让那些喝香槟酒的人名传千古的。”

我们在这里插进这一段话，其目的只不过是借回顾那群有名的“失败者”的故事之机来点出菲亚里奥对这批人的态度。但必须进一步指出，布拉甘萨十一名食客虽然表面上欢声笑语、风流倜傥，但其实背后是对整个世界以及对国内的生活都看破红尘、悲观失望。这种情绪当时是我国知识界某些人当中可以感觉到的。“失败者”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怀古恋旧，崇拜昔日高尚的葡萄牙，他们所采取的清净无为的态度，是他们勇敢冲动的整整一代人为之努力争取的社会改革失败后所表现的巨大失落感。他们不声不响、一动不

动，可能也是对于现制度表示抗议的一种新的方式。

弗拉迪克·门德斯（这是安特罗·德·肯塔尔同埃萨·德·盖罗斯二人共同杜撰的化名）是个有超凡智力和文化修养的“大人物”，具备了在人生中取胜的一切条件，这样的一个人身上集中了“失败者”们的一切优点与不幸。他批评了我国的庸俗和无能，从政客到报界，从那种使首都陷入可笑境地的法国化之风，到本国菜肴的变样失真。正如那一批从一个衰败的社会分化出来并且无可救药地患上了过分的文明病的“失败者”一样，弗拉迪克·门德斯也终于承认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每一个人要明哲保身的话，唯一只能攒下一点钱，并且买一把手枪；如果有人来敲他的门，就依情况之不同，或则飧以面包，或则给他一颗子弹。”

但是，这位被捧出来的弗拉迪克是当作最优秀的人类标本之一。被捧出来的弗拉迪克，他的这一番话，不应被解释为是一种对于在疯狂彷徨的世纪末正在逼近的大混乱深感失望的心情而已。有人在弗拉迪克身上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是一个消极无为地旁观事态发展的人。他以自己智慧的批评作出了榜样，他也许会为走投无路的、被 1890 年英国最后通牒的侮辱剥夺掉最后一点残余尊严的葡萄牙人民指出

革新与希望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以算是一位弥赛亚、一位“被盼望者”，一位新的“超人”，一位关心社会问题、反对倒退思想的人。

但反过来，也有人从另一个极端去批评弗拉迪克对老百姓的态度不对头，说他希望民众永远处于粗愚和幼稚状态，让那些饱尝了文明果实但又对一些被进步所遗忘的地区有一种猎奇心情的游客们从中寻个开心。这样，在弗拉迪克（他本人也变成了一个游客）心目中，葡萄牙也就成了一个供他“度假”的理想度假村，可以远远躲开大城市的喧闹，而且还可以品尝本国古色古香的风味美食。弗拉迪克在给他教母德·儒阿尔夫人的一封信中，先是称赞一番米尼奥地区的家长制生活，然后又描写一番在一个朋友的乡间别墅里尝到的珍馐美味，这别墅过去是教士们的财产。他在信中说：“凡是从来没有尝过这种小锅米饭、这种插在杆子上微火烤熟的小羊，这些的确使人心旷神怡并且与王朝同时代的鸡肉杂碎火锅，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享受到当年教士时代叫做‘盛筵美宴’的那种既粗犷又美妙的特殊福气。”但是弗拉迪克这样理想化的家乡，恰恰正是这样一个在时间长河中停滞的、景物与人都寂然不动的、同大自然的进化格格不入的村落。

菲亚里奥也不放过机会向这位十全十美的博学之

士的标本伸出他那付恶毒的爪子。他又一次针对“失败者”们，在《猫》中说弗拉迪克是“在一个帐房先生的角色中集中了‘雅集’人们的那些思想、那些文学价值观、那些年青人特有的书呆子气。这些人年纪越来越老了，当上了官，就奏出了人生失败者的交响乐。弗拉迪克与拉马略·奥尔蒂冈是同一类人，什么书他都看过，什么世界他都见过，什么人他都结识过，然后就胡言乱语，大放厥词，议论他看过的和经历过的东西。这是一箩筐抱有杂七杂八奢望的破布烂棉花；三分之二是白痴病，三分之一是昏迷不省人事，加起来一块儿放在“隐居的乐土”这个地理位置上，由一个喜欢讽刺近乎骷髅的身体来充当载体。”

的确，埃萨·德·盖罗斯所理想化的世纪末的精神“游客”身上有不少乡土习气。可以认为，弗拉迪克虽然是一个光辉的精神人物，给我们提供一些处处显现埃萨·德·盖罗斯手迹的可钦佩的肖像，但当他企图扮演一个高拔超群的人物之时却缺乏信心。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菲亚里奥对自己是多么不讲规矩、没有条理、偏激、主观、以感情压倒理智、撒野荒唐与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举以洋洋自得、一贯尖酸刻薄，这一切都成了他的障碍，使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杰出的创作无法完成。他往往一时冲动就感情用

事，不肯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这样的脾气，在处理有关问题的时候，是无法作出严肃分析的。剩下的就是他在刻画风景时，特别是在刻画阿连特茹和加利西亚的风景时，或是在刻画都市环境的狂人幻觉时那种自成一格的文笔，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中受苦受难的或是饶有风趣的人物，还有他那往往是十分出色的直觉。最后，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他给我们的本国语言注入了强有力的“新鲜血液”，而这正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要记住他的这一个劝告：“所以，请大家打开大门，通过某些被人认为是不想写正确的葡文的劳动者之口，让这一大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尚未得到正式批准使用的技术用语、纪事新闻记者用的不合语法结构的句子，统统进入葡萄牙语里面来吧，因为这个工作是神圣的，尽管那些渴望一种白璧无瑕的葡萄牙语的纯粹派会对此大为不快。”

玛丽亚·安东尼亚·卡尔莫纳·莫乌朗

玛丽亚·费尔南达·佩雷拉·努内斯

目 录

评介：作家与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引言.....	1
猫.....	1

第一卷

1 诸位先生们，猫儿们就在这里	
2 如何筹办一所装饰美术博物馆既给艺术教育充实 内容又不增加国库支出	4
3 大提琴手塞尔吉奥到莫拉里亚区的一家咖啡馆拉 琴去了	14
4 《为了事情办成而给的好处费》	21
5 路易斯国王的葬礼（自 1889 年 11 月至 1890 年 2 月）	24
6 20 天以来全国都只是高呼共和国万岁！	37

第二卷

1 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的悲剧（摘录 1890 年 3 月至 6 月）	41
2 对中学考试的采访：中等教育的倒退以及葡萄牙	

□ 康乃馨译丛

青年的病态 (1890 年 7 月 9 日) 57

3 穷阔气: 葡萄牙人人都想穷汉装阔佬 70

第三卷

1 葡萄牙社会批判 (1890 年 8 月 31 日)
..... 77

2 葡萄牙在非洲的被掠夺 (1890 年 9 月 9 日)
..... 94

3 采访记者是报纸的牲畜 102

4 人民的教育 (1890 年 9 月 24 日) 106

5 里斯本人勇气的滑稽写照 118

6 英葡冲突中的三国同盟马尔丁斯·费朗与马加朗
埃斯·利马之行 (1890 年 10 月 22 日) 119

7 对国家达官贵人们的批判国家的尊严到了谁的
手里任命高职的办法 122

8 剧坛危机及其原因 (1890 年 11 月 2 日)
..... 132

第四卷

1 特茹河的清晨 (1891 年 3 月 30 日) 146

2 有关食欲以及吃得好的必要性的科学历史论证
(1891 年 11 月 10 日) 154

3 崇洋媚外 157

第五卷

1 当代文学的特征 167

2 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与特赛依拉·德·瓦斯

孔塞洛斯的移灵安葬 (1892 年 2 月 20 日)	171
3 一年文学的荒芜与冷清 (1892 年 6 月 30 日)	202

第六卷

1 学界对国王王后的态度 (1892 年 7 月 10 日)	208
2 小场的斗牛：我国斗牛表演的现状 (1892 年 9 月 17 日)	212
3 里斯本日甚一日的贫困 (1893 年 4 月 15 日)	216
4 那位“精英”在哪一点上要把我说成是放荡作家	223

猫



第一卷

诸位先生们，猫儿们就在这里！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又按照猫的形象塑造了批评家。

对于批评家，正如对于猫一样，上帝赋予了他波浪起伏的优雅风度和气喘吁吁的气息、呼哧声和爪子、带刺的舌头和惹人爱怜的媚态。上帝使他既神经紧张而又动作敏捷，多思善虑而又懒惰，上帝使他成了一个细致到极

点的艺术家，一个使人受不了的讽刺家。对于朋友们来说，他是个大好人；对于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们来说，他是个多猜疑的人；而对于那些霸道凌人的人们和对手们来说，他又是十分可怕的。——看到美好的东西，他多少有点贪婪，但对于业已公认确定的东西，他几乎是丝毫不抱怀疑态度；对于各方神明，他几乎全都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泥足巨人而已；对于所有的人，他都觉得他们长着一副蟒蛇般的肚肠，而对于所有的法院，他都觉得它们设有侧门。——如果有人向他抛掷一个纸球，无论是一首诗也好，一篇论文也好，一部法典也好，他都喜欢捧着玩来玩去耍把戏。——他很有耐心，善于温和平静、不声不响地摆出一副神秘的神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耐心等待，等耗子从围栅的一个缝隙里钻出来，然后一拥而上猎物到手。这时候他就要慢慢耍弄一番，将猎物垂死挣扎的痛苦作为自己的消遣，时而把猎物当作一支香烟一样卷成一团，时而装着要把它放开超生的样子，把它抛到半空中，然后等它掉下来用牙咬住，擦它，磨它，直到它变成为一堆肉末或是一团破絮。

自从我们的时代将人分成三类野人，即驴人、犬人与猫人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人被分成干活的牛马、攻击型的猛兽及幽默与幻想的动物以来，我们为什么

不选择最后一类的化身呢？这一类是最符合我们特色的，是最能使我们摆脱驴子所受的奴役和饿狗的利牙啃咬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看官，你就在这里看见，我们发出的咪咪声并不多，但我们总是在伸爪子抓着，而且总是毫无畏惧。

猫



如何筹办一所装饰美术博物馆
既给艺术教育充实内容
又不增加国库支出

我们并没有一所装饰艺术博物馆，甚至连一个这样的萌芽还都谈不上。但是，如果我们多少有点严肃的态度，要想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审美水平都提高一步，这样来重振一下我国那些古老的工业中心的话，那么创立这样的博物馆就是当务之急了。我们并没有一套收藏好的艺术家具，让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工匠们能拿出作参考，而我国其实是拥有全世界第一流的细工工匠和家具修复工匠的。我们没有一个用文艺复兴时期我国作坊作出的作品标本装备起来的金银工艺馆，

而我国其实直到今天仍然以令人惊讶的、尽善尽美的手工艺制作出极为精美的金银雕刻与镂丝制品。我们在全世界是第一批采石场的主人，但除纪念碑塑像之外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以工作间收藏的形式，按照时代的不同、用途的不同、因民用与宗教建筑样式总脉络而产生的装饰方式之不同而加以分门别类，收藏一套各式各样的标本。

我国本来有米尼奥省、外山省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天才女织手，有皮尼希岛和锡图巴尔的网眼针织图案装饰编织女工，有亚速尔群岛和阿连特茹某些农村地区的令人赞叹不已的绣花女工，然而，我国至今仍然没有锦锻、罗纱、刺绣工艺品的公共收藏场所。在埃斯特雷莫兹和外岛地区，我们的那些陶瓷窑，将几百年前的制作工艺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停滞不前，但这反而造就了一个奇迹，就是：在这些粗俗的陶工手中，悉照原样地保持了当年埃特鲁里亚的线条，分毫不爽。在卡尔达斯达赖尼亚古老的采釉陶器窑，200年前曾生产过一种十分特别的玻璃砖，但今天已经失传。在吉马朗埃斯郊区周围的铜铁铺，那些粗俗的乡下人直到今天还不用任何工具，而只用铁钻制造出堪与法

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产品比美的铁器工具。——在葡萄牙工业中所有这些已经衰败的产业，都没有一所博物馆能让艺术家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自己的专业，对这门产品的演变过程及其受外来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进行一番研究——甚至在全国范围也没有设立一所中央级的博物馆来以巡回展出的方式展示这些样品，而英国的肯辛顿博物馆却是在英国各地这样巡回举办的。

所以，设立这样的一所博物馆是当务之急，而且应该由这所博物馆来带动，在各所业已建立的工艺学校那里就地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些博物馆的展品应该定期更换，定期巡回，以扩大效果^①。要这样做，有切

① 现任里斯本教会长老上任后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向司法与宗教大臣提交一份极为有远见的报告，建议设立宗教艺术博物馆，不仅在长老教区所在地设立，而且也在全国所有各主教辖区和大主教辖区设立。这些博物馆应该将属于主教教堂的器物以及所属各教堂及工厂的用品与艺术品予以展出。每一所博物馆都设一个拿少量津贴的保管员。我们相信，各所修道院随着它们一一关闭，它们的器物也将陆续拨归这些博物馆收藏。

至于政府对此是如何答复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没钱！统计局局长西尔维拉·达·莫塔先生是个热心古物的人，他甚至向贝朗先生表示过，他可以负责筹措一笔经费以供兴办宗教博物馆之需，而不必使国家的负担显著加重。然而，他虽是好心，问题终于还是被束之高阁。

实可行的办法，第一条办法就是收购费尔南多的藏品^①；其次是向各修道院、各宫殿以及其他已经空无人居的建筑所存的物品下手。

为了实现第一个做法，我们可以搬出一个理由，使正义站在我们一边，只要我们能证明已故的那位国王陛下做事太不择手段就行了，而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并不困难的。即使在法院打官司打输了，我们也可以专门举办一次兴办艺术教育事业的大规模彩票抽奖活动，用得来的钱大量收购藏品。巴黎的“装饰艺术中央联合会”就有此先例，他们一次就筹措到了500万法郎的巨款。博物馆成立后，可以设法逐步加以充实。用什么办法来充实呢？有一个办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那就是立刻将本来国家所有但目前散落在已不用的公共建筑物之中的一切艺术性物品一概收进绿窗宫^②的各个厅堂之中。

① 这批藏品是私人手中数量最多、品种最齐、最完整的一批。瓷器部分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里面有阿拉伯的盘子和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的彩釉陶瓷。在纹章、家具、青铜器、石板器方面，收藏也极为丰富；古画也是如此，有葡萄牙的和德国的，尤其是哥特时代的。绘印本在这套藏品中占的价值约为13000雷阿尔，共有17000幅，其中有许多是极为罕见的，署名者有丢勒、伦布朗、卡洛、奥斯塔德、马尔科·安东尼奥、莫尔格亨、伏特依尔、埃德尔维斯特、德雷维特、德克—斯图普、卢卡斯·德·雷德、戈尔齐乌斯等人。

② 绿窗宫原为庞巴尔侯爵的宫殿，后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

至于其他的办法，眼下我们想到的还有下面几条：

第一——按照福斯金尼与孔西利埃里两位先生的法案，有些私人藏品的收藏主应给予国家以优先条件，这样，国家就可以分件或整套地对私人藏品加以收购。

第二——同一些私人与一些外国博物馆实行交换，拿一些我国重复的物品去换来一些藏品。

第三——对于外国博物馆所存而其复制与研究对我国公众可能有好处的藏品，取得其复印件或模型（尤其是同葡萄牙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艺术有关的藏品）。

第四——各教友会、医院、慈善机构、教区教民会等等，如果有的艺术品由于年代久远或保存不善已经无法按照原先的用途加以使用，但又是一些有相当价值的藏品，这些藏品如果仍然放在这些团体的仓库里显然会有丧失或损坏的危险。此时，可以向这些团体提出收购^①。

① 例如：慈悲教堂有一些十分精致的银质灯，雕刻的风格既纯朴又典雅。这座教堂还有许多别的彩釉陶瓷。另一个例子是：圣母教堂的一处十分耀眼的角落放着一些画在木板上的哥特式画，整天受到耗子和灰尘的骚扰，唯有当赏识这些画的区区少数人前来要求一见的时候，库恩特罗神父才让他们去观看一番。又一个例子：长老辖区的家当中，就有数量极其巨大的一批画、家具和彩釉陶瓷，等等。

第五——对于一时不能收归国家收藏的藏品要小心注意监督，用尽一切办法防止其散失。办法有：教育公众自己注意保存这些文物，并对收藏者规定其责任，从而保证国家能完全保存与维护住这些艺术品，以备有朝一日使之收入国家博物馆。

在实现这一政策的各种办法当中，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办法——例如可以在一些殿堂的存衣室举办经常性的展览，展出我国各宗教与慈善团体藏有的艺术品，让公众去认识这些东西，去研究这些东西，去欣赏这些东西的价值。又例如可以汇编一份总目录，将国内各团体手中现有的艺术品全列在内，而且都有照相制版，附上每件艺术品的经历，简单介绍它的美学性质，它的流派和作者。总之，要尽可能多收集一些资料，以便对我国的艺术财富迅速进行清点。通过由市政厅或由博物馆事务总署按照一个合情合理的计划来主办并在本专业的作者当中实行择优委办，出版一些类似巴黎美术教育图书馆那样的出版物，以培养公众的审美能力。最后，要对美术教育实行彻底改革，对在圣方济各那里遇到冷落的绘画课程尽可能加以重视，并招聘懂得本行艺术的匠师们来主持课程，即使到国外去

招聘也可以^①

只要美感意识通过文化教育深入人心，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自己就会对艺术品精心加以爱护，而且会发挥感情上的能力，防止许多物品流出王国境外。谓予不信，可以看看巴黎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半月前的事，在德鲁奥宫当时塞克勒当的藏品流失了！这家博物馆的藏画中有米叶^②的《晚钟》，这幅画的情景十

① “历届万国展览会十分尖锐地向公众提出了一个绘图实践教育的问题。欧洲各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将绘图实践教育同文科与理科教育联系起来……。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法，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儿童入门学习绘图的基本技能，并且使他们掌握一件长大后无论干哪一门职业都有宝贵价值的工具。关心如何通过绘图培养双手的灵巧技能和双眼的准确观察力，如果认为只是当代才有的事，那是不正确的。18世纪末叶，各行会都是教自己的工匠们职业绘图的本领。伟大的18世纪，对培养公民有裨益的事总是丝毫不放过的。列昂·德·拉波尔德在他的关于第一届伦敦万国展览会的报告中，就不遗余力地着重坚持这一点，即增加工匠的培训，防止滥竽充数。这同学院派的主张恰恰针锋相对。他在《艺术与工业的结合》一书中还写道：‘再过11个世纪，将会投票通过一部法律，规定今后在法国人人都应懂得绘图。当代的法国，它的孩子们对于这种天然的语言，即将物品照天然模样表现出来的技能是如此的无知，使人见了不禁为之伤心。’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严格将绘图教育同文学教育溶为一体。其实，远东有一个我们以骑士气派称之为蛮邦的国家，即日本，正是这样做的。

在日本，人人都会认字、写字和绘画。那些不久之前到我们这里来访问的使节，正是用画笔将那些引起他们注意的物品形状描画下来。

② 米叶（1814——1875），法国现实主义画家，以描写农民生活为主。《晚钟》为其最重要作品之一。

分动人心弦，用的是一种暗淡而强烈的色调。画家于1867年以1800法郎卖给了费多先生，费多又于1870年以3000法郎转售给皮埃尔·布朗克先生，布朗克又以5000法郎卖给了一位比利时大臣范·普拉埃特先生，普拉埃特又转卖给别人，如此一手转一手，直到1871年《晚钟》出现在约翰·威尔逊的拍卖会上以16万法郎成交，现在以难以置信的55万3千法郎的价格进入了卢浮宫。在塞克勒当拍卖会上，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地从他们的城市赶来要染指这幅画，决心要把它从该画作者的同胞手中夺走。在安托宁·普鲁斯特的倡议下，立刻在该宫成立了一个爱国团体，它的宗旨是不惜任何代价为卢浮宫收回《晚钟》。这个由于醉心艺术而霎时成立的团体，在葡萄牙是不可思议的，它终于从外国人手中把《晚钟》夺了回来，当然，其代价高昂得令人瞠目结舌，但它还是在任何绘画从未受到过的狂热欢呼中被夺回来了。

提高审美能力水平，正如在国外的情况一样，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会有许多人将艺术品捐献给国家。这样的机会我们这里几乎是完全享受不到的，而法国和英国的各个博物馆引以为荣的珍贵藏品中有一部分却正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还要再一次指出该用什么办法来采集各宗教场所的藏品。这一采集工作应该加快进行，不单单对那些已经关闭了的修道院，而且对那些仍然有人的修道场所也应如此。进行这个工作时应该有条不紊、雷厉风行、小心翼翼、明智巧妙，要挑选积极有为的新人来进行，而不要收藏家来办这件事，这一点要定下来。国家应该甩开那些直到如今一直盘据着这些十分机要工作的老人。他们有时是由于无知，有时又是由于玩忽职守，还有时是由于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使我国丧失了大量的宝贵珍品。

我国是一个退休将领如云的国家。许多工作需要能动手实干、头脑清楚、廉洁自律的人。但是，我们往往看到，主持这些工作的却是一些把事情办坏的瘫痪者、一些对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的白痴们、一些为了开脱自己盗掠行为而对下级的坑蒙诈骗大开方便之门的租用者们。由于对一个人的素质是按照他在国家的喂食槽上吃了多少年的皇粮来计算的，因而大批滥竽充数之徒得以高据肥缺要津。他们同驴一样，唯一可以称道之处就是长了一双大耳朵，有时候还加上恋栈自己的职位。

曾经在《投枪》上被拉马略一针见血的讽刺弄得

遍体鳞伤的那位枢密官梅利西奥^①，以他那种小里小气胆小鬼的样子，难道还能拼写得出葡萄牙参加万国博览会总代表的任命书吗？

这个人物究竟越过了哪些高栏障碍才爬到了如此显要的高位？就是靠一条，即他的秃顶。有了这一条，而另外一条，即办事要一丝不苟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是这位害肺病文书的故事，他对同行们说——哥儿们啊！我在这里当上了部门的首长，原因就是我能。

在前面我们曾提及了这样组成博物馆的费用问题，这些费用包括了收购藏品的巨额价款、印刷带有批判性的藏品目录、出版艺术书籍、维持人员的费用，以及将藏品运到国内各地的工艺学校去展出的费用。这样一件美好的事业，办起来费用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但是，难道政府不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彩票，中彩者可以得到奖金或艺术品，彩票售出的收入全部用于图书馆与美术事业？市政厅的艺术委员会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事业承担起来，它如果真的有良好的意愿，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意愿同这一伟大崇高的爱国事业联系在一起呢？

① 梅利西奥（1837——1890）子爵，新闻记者，议员，于1880年创立葡萄牙记者与作家协会。

猫



大提琴手塞尔吉奥到 莫拉里亚区的一家 咖啡馆拉琴去了

圣卡洛斯剧院的第一名大提琴手塞尔吉奥，每天晚上都到费尔南德斯·达·丰塞卡大街亦即从前的索科罗横街一家流浪汉的咖啡馆演奏，这家咖啡馆正对着王太子的金库。

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凤毛麟角了，他们由于有病态的遗传而异乎常人，一辈子都在努力挣断那些束缚他们、使他们受社会生活种种规矩制约的羁绊，而且他们越是放荡形骸、不拘小节，审美能力就越是锐敏，因为种种为人处世的规矩可以说同他们内心世界的幻觉梦想是背道而驰的。塞尔吉奥是个民间人物，高个子，

表情冷漠，因为酒喝多了而脸色发红，像喜歌剧中的一个老军曹，他是那些夜间在街上自言自语豪饮者的典型。这些人或则倚着转角处的墙边，或则靠着台阶的门，对着那些纪念碑和演出海报，在里斯本的夜深人静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印上一个霍夫曼式的人影。

他作为一个罕有的大提琴家，有时受到那些仰慕他弓法的人所崇敬，有时又受到那些只想通过同音乐家与画家交往而取得附庸风雅效果的暴发户们的恭维。他在自己的音乐生涯中，从来没有能够适应四平八稳的人为做作的公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最美妙的奇才都有在沙龙里被人当作仆役的危险，会在女人们的轻视当中，在运动健将们的赛局当中，在科蒂戎舞蹈老标兵的冷淡傲慢当中形如小厮。

海涅曾经说过植物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吃的，一类是不可以吃的。与海涅相仿，塞尔吉奥只知道人分成两等，一等是打领带的，另一等是不打领带的。

他列入前一等的是一些低级的人、迂腐的人、色鬼、骗子、白痴和游手好闲者。而在另外一等人当中，如果好好寻找一下，则还是可以找到能人强将的。

这位艺术家在同那些打领带的人打交道时，得到的只是懊丧、烦恼和苦闷。他原则上是讨厌这些人的，

虽然其中有些人向他伸手的时候他也不拒绝握手，但他一握过了手，就躲到远远的地方去，找一家合适的小酒店，用姜水好好把手洗干净，消消毒。

由于塞尔吉奥在圣卡洛斯剧院管弦乐队中的地位，同上层社会有过多年的交往。经过这些年头之后，现在呢，按照这条将能思想的动物依照其在领子上围不围一条布条而加以分类的动物学定律，他宁可降低身份，到下层的人们当中去。他在那里滔滔议论能打动人心，他的话得到回响，他的那件神妙的乐器每天晚上都在他灵巧的手上表现出高超绝技，从而使他免于醉酒后大出洋相的灭顶之灾。因为那些只穿着衬衣、踏着木屐的仰慕者们，每天晚上到咖啡馆来听他拉琴，纷纷向他敬上一杯掺了热糖浆的烈酒。

就在那家咖啡馆的那条权当大厅又窄又长的走廊里，摆了两排桌子，顾客们围着桌子坐在木凳上，一口口地品尝一种像是用蛋白尿酿制的啤酒，或是品尝着那种莫拉里亚人形象地取名为“屎壳螂”又黑又粘乎的咖啡。在这个走廊里，到了晚上8点，有一个单独的座位总是空着的。最深处有一片两道拱顶的百叶窗，窗前放着盛瓶子的酒柜，从那里透射出粉红色奶油和欧洲酸樱桃似的红宝石颜色、克尔曼酒的翡翠色、肉桂桔子酒的黄玉色。就在那边咖啡馆老板，一个矮

胖子，穿着衬衣，满脸胡子，脸色发白，挺起胸膛，他称顾客们为“老兄们”。侍者趁幕间休息，配制蔗糖浆的时候，他就搔抓一下自己的袜子。在他周围还有一些粗工们在帮忙，从火炉那边走到洗杯盘池旁，又从装汤勺的抽屉那边走到这家低级咖啡馆的最深处，静寂时常常传出大耗子的尖叫声。墙上贴着一些画片，上面有女人坦露着乳房，仿佛让观看她们的人来吸吮——瓷质郁金香花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它下面就是喷着火焰的煤气灯头。一排排木凳中间留出的通道十分狭窄，侍者来来往往十分不方便。就在这窄窄的通道上，时不时有个类似“脏街”野妓那样的女人穿过。她身材干瘦，一身白衣裳，脚拖木屐，头上的棕色头发卷成蛞蝓的模样。

“再见了，老姐！”

“去你的，你这个妖精！”她也反唇相讥。

这个暴露恶习的称号一说出来，全场哈哈大笑，大家对那个被这女人这样的称呼弄得颜面扫地的夜间马车夫，纷纷议论谈笑起来。这个车夫当场发誓，下次在别的地方逮住她干坏事，非一脚把她的屁股踢得稀巴烂不可。

如果穿过咖啡馆狭窄的咽喉处，就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台子，上面有一架租来的钢琴，

还有它那形影不离的驾驭者即钢琴师。这是一个肌肉蓬松、戴着眼镜的人，双颊包在像牲畜口络似的大胡子当中。胡子的颜色像皮革，他整副神情活像一个被辞退了的小学教师。跟在他后面的就是那位大提琴手，他从咖啡馆的那些戴圆顶帽的主人们当中穿过，手指甲上抹上了封泥，眼睛因为杜松子酒喝多了而流露出醉意，坐到一张有铺垫的椅子上面。在演奏会开始之前，大提琴师和钢琴师总是对先演奏哪一首曲子进行低声嘶哑的争论，总是由塞尔吉奥奏出一个曲调旋律，弹钢琴的略作伴奏。

钢琴师刚轻轻弹奏出几个小节，塞尔吉奥就说，“喂，老兄，这不是音乐，这倒像是一头牛跳越了G音的壕沟！求求你，普拉塔斯老兄，跟得紧一点，做做好事，我怎么拉你就怎么弹吧。”

于是他们又重新开始。钢琴师哭丧着脸，牙缝里叼着一支树根做的烟咀子，慢慢喝一口珠鸡酒。他脑袋顶上可以看到那个秃了一圈，像小王冠一样闪出白光，也活像一个没有瓢的西瓜切开了一头似的。

正当钢琴师一心放在艺术上，键盘上弹出浮士德在露天集市狂欢的曲调时，一个声音喊叫出来：“演奏《贴得紧紧》吧，来这个，来这个。”喝掺热糖水烈酒有点醉醺醺的塞尔吉奥，他的那只颤抖的左手上上下下

下神速地移动，指尖跳舞似的按在琴弦的不同部位，但又忽然停住按弦的手指，深沉地拉了一弓，这一弓起到干净利落、画龙点睛的作用，真是大师的手法。这是颤动的一弓，是40年的音乐生涯和听音乐的体会，也是40年的梦想追求和辛勤劳动。这样的弓法，它的悲怆的表情，已经超出了琴弦与琴弦振动的范围，而成了人类悲壮的心灵发出的呼号，天晓得啊！这些呼号、声音直冲宇宙深不可测的奥秘！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场面，像是在牛棚里的吸烟者和喝酒者，乱哄哄地耷拉在木条凳上，像群牛一样鲁钝，他们薰黑了的身体散发出一股狐臭气味，透过劣质酒似的汗水浸透的工作服，弥漫在空气之中。闷热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人们屏住呼吸洗耳恭听。有人喘着气，烟嘴喷出的烟雾把深处的那一群群喝酒者遮盖起来，似乎把他们移到了更加遥远的深处。在百叶窗那边，咖啡馆老板发放一个个托盘，付出找回的零钱，厨房帮手们肮脏的身影，时不时被炉灶的火焰照亮一下。在这大炉灶上摆放着黄铜锅，锅里的饮料沸腾着，水泡在翻滚。这时候，如果有哪一个声音打破静寂的气氛，所有的人都马上会抬起头来，自私地发出愤怒的嘘声。这一来，连最大胆的人也只好噤若寒蝉了。大提琴仍停顿着，让大厅里人们不耐烦的寒

噤先过去再说，大提琴手整个人都沉浸在这种从一个人的心灵涌到另一个人的心灵的兴奋激动浪潮之中。这股浪潮遇到弱者的神经质就更为加强，遇到鲁钝者的淡漠就围着他们打转转，一直到把他们的淡漠征服过来，在他们痉挛的混沌快感下像软蜡一样融化掉。

终于，钢琴停止了伴奏的节拍声，原来是塞尔吉奥又向钢琴师嚎叫，说着些什么责备的话，怪他弹出的和声太粘粘乎乎。塞尔吉奥把这些声音比作鸭子在池塘里嘎嘎叫。忽然之间，大提琴的旋律又响起了最初的几声涡旋，卷进了空中！

猫



《为了事情办成 而给的好处费》

既然在葡萄牙一切都是向钱看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那么，也就不必指出，比一切人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证券投机商，而证券投机商手心里又掌握着写文章的人和演说的人，也就是说，掌握了报界和议会，而通过报界和议会，也就——有哪个见鬼的能否认就出来否认吧——掌握了王朝。

情况顺理成章就是这个样子：报纸也好，市政厅也好，不是属于哪一位伯爵的，就是属于哪一位男爵的，不是赫尔森特，就是巴尔蒂索尔。而这种对公众的欺骗行为，总是可以显得不那么腐败，只要“为了事情办成”而

放到政客们腰包里的支票起码能意味着有大笔的葡萄牙资本投入，去兴办大臣们提交表决的胡闹疯狂的工程项目……，而大臣们这样做，是为了捞取一笔钱来给他们的儿女办嫁妆，是为了给他们的夫人们购置零七八碎的玩意儿。但是，国人连这一点点的安慰也是得不到的！在这股为了兴建对河流起破坏作用的港口和对旅客起破坏作用的铁路而纷纷对官员实行收买的狂潮当中，所使用的钱大部或全部都是外来的。钱是从巴黎的犹太人那里、从德国的银行家那里、从英国的殖民地偷窃者那里送来的。这些钱在投票表决时叮当作响，在报刊的谩骂中叮当作响，在大臣们秘密批让经营权时叮当作响。这些钱在火车站的栏杆上晃动着，在新港口这些庞然大物上晃动着。这些钱拼写成文字，表现在贷款合同签订人的慷慨大度上，也表现在某些记者的惊人挥霍上。这些钱所到之处，毫无忌憚地树立起为了30个钱币就可以出卖一切制度。它的诱惑力无所不在，从堂堂将军起到政客大军的最廉价低等的小卒止，凡是自由所争得的神圣成果，甚至权力这个概念本应围上的声誉光环，全都被这些钱淹没在洪水和泥浆之中。

如果将这方面的事实一一列举，那么除了重复一遍人所共知的丑事之外，只会使我们陷入个人的争执

之中。任何人只要再回头翻阅一下近9年来的报纸，只要回顾一下近14年来的历届议会，只要打听一下某些人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样得来的，某些人过去的底细又是如何，他就可以一清二楚，可以下一个结论：那些冒险家们，由于作战有功而蒙彼得罗四世陛下御赐，将他从嫡长兄手中篡夺来的王国分割成一片片土地分封授予他们，而我们的确是这些人的孙子辈，又是那些因为收买现成的更为廉价，因而为罗德里戈·达·丰塞卡所现成收买的议员们的儿子辈。

话又说回来，如果要求政坛上的风气比私人生活的风气好一些，这是不合情理的。议会制在我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一些民族来说，没有什么公式是能够奏效的。

由此可以推论，葡萄牙的生活在意识和道义方面都溶化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绝大多数民众同那一伙瓜分公共收入的金钱、争权夺利无所不为的虎狼之间，利害关系完全分开了，各顾各的。其次可以看见公众对政治越来越冷漠，看报纸只是为了消遣。人们提到政府施政行为的时候，只是当作某种茶余饭后的猥亵笑料。政治成了一种没有大丈夫气概的行业，一种为所欲为的敲诈勒索，而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排到了小偷和杀人犯之后了。

猫



路易斯国王的葬礼

(自 1889 年 11 月
至 1890 年 2 月)

10 月 26 日星期六，已故国王陛下的遗体迁葬到圣维森特王家墓地奉安。这一天全城放假，街上的人几乎全都戴孝，到处都降了半旗。每隔一刻钟，各炮台和各艘军舰都鸣炮致哀。各报刊登了国王的肖像，附上诗体或散文体的哭哭啼啼的文字，为这一民族的损失哀叹悲号……

早在 4 天之前，这种如丧考妣的哀鸣就已经开始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恼怒心情，一种恶心的感觉，一股名利场的臭味，这种感觉极为不利于任何真诚无私感情的爆发。在所

有这些对王室表示哀悼的一片乱七八糟的场面中，可以看到的是人人都要从这桩事情中找到能最快的捞钱、最快地捞名声，或是最快地捞任何成功机会的办法。这场由二三十名廷臣在卡什凯什的灵寝殿里粉墨登场上演的悼念喜剧逐步扩大化，像演猴戏似地从一地到另一地演来演去，最后沦落成为街头的闹剧。原因是愚民们像猴子那样看见什么就模仿什么，对这些反映出他们的神经已经麻木的行为不好好动动脑筋去思量一下。

谢天谢地，葡萄牙竟然没有一个人不对这位陛下的亡灵加以亵渎。他们或则把这次悼念刻在自己布匹店的招牌上，或者把这次悼念当作插科打诨的故事，或者斗胆把这次悼念刻在香炉上，对当今在世的陛下唱起可恶的《安魂曲》。

公共建筑和彩票商店的招牌挂上了黑纱。各报纷纷拿陛下驾崩前的临终痛苦来做生意，提早6小时就把他杀死，以便自己能抢先卖出哭哭啼啼的副刊。一些上校们拿了钱，在报上发表对王后的吊唁之词，顺便还显示一下自己的团队是多么的严明。时装店里展出了美利坚羊毛织品的丧服，价格牌也加上了有关那位“受到万民哭悼的君主”字样。杂货铺的门面挂上

了黑纱和丧礼布料，仿佛里面的瓷器小人也正在举行国王的葬礼似的。在3天的时间内，贝伦的拉皮条客们每隔一刻钟就厚着脸皮对《时报》和《新闻报》的读者们下一次毒手，用镶边的栏目告诉读者们，阿梅莉亚王妃^①是多么的伤心，因为……她交上了一个大好运！

至于人们个人表示哀悼的方式，若泽·卢西亚诺先生在《政府日报》上明令举行的哀悼却被流氓似的公众挖苦到了小丑表演的地步。原先连父母去世都没有戴过孝的人们，全都为国王服了丧。葬礼的那一天，我看见新卡尔莫大街有一个戴孝的胖子沿街而下，雨帽上一大块黑纱。另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样子像个贵族，哭得像泪人儿似的走进了费朗书店，请一个店员向那位法国店主先生转达他作为一个纯种葡萄牙人的谢意。因为他在这地方看到了法国对我国的一番好意，法兰西通过它的一位代表，在他开的店橱窗上用螺丝钉钉上了半截。

闹得最欢的是浆槽街那边的一家肉店，装饰有用陶瓷和石膏制成的牛头。这家肉店一连3天都用迎风

① 阿梅莉亚是路易斯国王的儿子（继任为国王）卡洛斯的妻子，她随之成为王后。

飘舞的月桂枝和黑纱来装饰它的牛角^①，它就这样利用这个哀悼的机会，把羊腿的价钱抬高了 30 个雷阿尔。

然而，一个城市采用了诸位看官所看到的那种小丑方式来对死者表示敬意。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它对致敬的理解同对讽刺的理解差不了多少。而同时，它又从这件丧事当中得到了极为丰富的生动奇妙的收获。凭这个收获，如果加以巧妙的疏导，经过靠笔杆子和画刷子进行生产的人们的头脑加工，简直可以产生出一门新的艺术。

里斯本真是独具一格！

它已经不限于对爱采取一种颠倒的观念……也不限于采取双重的观念，而且它还使忧伤和快乐都失去

① 悼念死者与牛角之间这种神秘关系，是今天本已消亡的葡萄牙特性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特点之一。有两个例子。里巴特茹的一位牧主死了妻子，他成了鳏夫后第一次提供牛只去参加圣塔伦的斗牛大会的时候，就吩咐一定要在牛角上挂上黑纱。到了第 13 条牛已被刺中了之后，人人都问，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哀悼呢，难道有 14 个丈夫吗？

F 君是一位斗牛扎枪手……备受尊敬。有一次，他父亲去世了，这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不幸事。当然啦，他父亲的去世，使得这位孤儿在圣安娜斗牛场上占了便宜。他在那里出现的时候，穿着十分时髦，但全身衣服都是煤一般的黑色。牛栏的闸门打开了，一头公牛猛冲出来，这位艺术家很有风度地在牛的脖子上扎进了四把扎刀，然后在斗牛场上站直，双手各拿一枝蜡菊，这些蜡菊是在斗牛刺杆里面藏着的！

两极性质而从其正常心理印象的焦点中被排除掉。它让我们看到，例如在狂欢节中有出殡、复活节前有嬉笑、洗礼中有泪水、葬礼中有幽默。通常情况就是如此，没有什么能比一场化装舞会更能使我们感到陌生，没有什么能比一场葬礼更能恢复我们情趣的运转。原因十分简单。在我国，戴假面具的人通常像是一个死人，而死人则几乎总是有一副戴着假面具的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他是一个宝中之宝。在5年期间一直是同我一起娱乐一起学习的同伴，但是，想不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件高雅的蠢事就撒手归西了。我伤心极了，好多个钟头都安定不下来，冷静不下来。有12天的时间，我曾狂热地守护在他的床头。他死去后，在床上冰冷地躺着，也是我给他最后一次化妆的。我3天3夜水米不进，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有时候，有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于是在我们为死者守灵的最后一个晚上，从巴尔特里斯基餐厅给我带来了一小盒三明治。唉呀，血肉之躯是多么的愚钝麻木啊！这一下子，我虽然仍然在哭，但我对死者已经不那么想念了，而对三明治却是想得越来越多了。

美味引发了我饥肠辘辘，而在那位朋友身边，他在那里，就使我只能不吃不喝。我身上的动物性终于占了上风，为了一小块牛肉加芥末，我发现自己竟然

会对青年时代最忠实伙伴的遗体感到厌恶了！而且，他还是个朋友呢，如果是个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的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一生是这样的短促，我们的苦难是这样的深重，我们进行的斗争是这样的激烈，以至于我们的全副心事都放在有一天过一天上。我们抓的只是两件事，一件是把半个世界的黄金捞到手，一件是对另外半个世界大张挞伐或是冷嘲热讽。做坏人成了当代的一个必要。无恶不作成了一个理想……可惜欣赏的人不多。

人同人已经不再是兄弟了，人同人现在是竞争对手，是竞敌。人拥有的财富不再意味着这是可敬的努力得来的奖赏，而只不过是应该属于我的那一份，我就把它咬一口。每死一个人，就少一个诈骗我们的嗷嗷待哺的嘴巴。不但如此，有势力的人们几乎总是不但有强大的竞争力，而且通常总是很有办法来进行盘剥。当他们倒下来的时候，我们哈哈大笑，对他们以牙还牙，在他们死后嘲笑他们，这是合情合理的报复，因为他们是曾经损害过我们的。

每当里斯本看到某个大人物去世的时候，人们就以这一点为理由，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这一个到处是拉皮条的虔婆和曲意逢迎的帮闲，到处是手头拮据

的男人和挥金如土的女人的首都，它雄心勃勃却又懒洋洋，它穷得可怜却从不甘心。每当有出殡的时候，这个首都就马上摇身一变，你看，它就对死者冷嘲热讽起来了，而且这些讽刺一个比一个更加无赖，更加引人发笑！

这个该死的首都，看见办丧事就发笑，虽然它几乎每次都是笑得有点道理。举个例说：这次国王葬礼当中，首都作出的幽默表示，即使爱伦·玻复生也要甘拜下风。那一个离奇古怪的行列，又是穿着制服的猴子，又是衣衫褴褛的女人，又是花车，又是狂欢节的双座四轮马车，又是兜售烟嘴的小贩，又是小学教师，又是阿儒达宫的消防队员，又是被遗弃的孤儿。人人皆大欢喜，彼此相望，有说有笑，停下来买些小点心吃吃，同马车夫拌几下嘴，向亲友们说声再见。这样的—一个行列，到底代表了什么？

谁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行为。只是胡闹起哄寻开心，有些地方还是邪恶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这个样子……例如刚果王后的加冕典礼哪，白痴的比赛大会哪，费尔南德斯的婚礼哪，或是鲜花大战哪……。什么事情都可以！只除了对那个曾任我国国王 28 年之久的人的悼念不算！

卡洛斯国王登基后第一次溜达的时候，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他兴高采烈到了毫无丧父孤子的样子，反而倒像是一个丧妻的鳏夫。在他周围，一个个的王公使节、青年贵族、妓院的青年嫖客和变童，组成了一个类似蜡人馆似的群体，一个比一个更加华而不实。

我国大多数头面人物如此令人难受地登场表演捞名捞利，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当中，没几个人能表现出雍容高贵的身姿、深邃宁静的目光、光辉照人的道德境界，而这境界是一个一贯抱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良知的人在其智慧的一场场奋斗中逐渐达到的。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一些卑小的怪物，乜斜着眼睛，或是目光蒙眬，或是眼珠骨溜骨溜，或是双眼肿胀。他们脸部皮肤蓬松，眼圈是黑的，两边脸部不对称。有些人脸上带着令人焦躁不安的印痕，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症候，说明了有潜在的跛足病，人家看见他们这副模样，就会对他们信誓旦旦要为那个事业效劳是否来意属善要打个问号。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那些大官的举止（起码是外表的举止）当中，那种痴呆的形状占了多大的份量，真使人吃惊！一种肥猪同看门狗的混合体、流氓同傀儡的混合体，显现在这些人的脸容上。他们有官署首长，有民政长官，有中校，有将军，有主教，有

议员，有枢密官和大臣。在上层社会和军界人士制服的领子上、大礼服的高领上、紫红色的衣领上，象征式的链条上，肥得油腻腻的下巴显示出他们营养失调，患有由于睚眦必报所造成的中风。他们整天在愤怒地彼此倾轧，在一天当中危险的时刻溺于酒色，纵情淫乐。他们当中很少人的面容能一辈子保持那些一尘不染地从事绞尽脑汁艰苦劳动的上等人的规规矩矩风度，而如果从事这样的绞脑汁劳动，一个人的心灵就会如同他外表一样，永葆其精神上的青春。应该看看他们作出的笑容，这是对着镜子排演过才装出来的，是为了取得生活中的效果。也应该听听他们那副情场老手或是高贵家长的噪音说出的话语，冠冕堂皇然而从来都是言不由衷的。最后，还应该看看他们的假面具掉下来之时的真面目，原来彬彬有礼廷臣的面孔后面却是一头食肉动物，一只老虎或是鬣狗。它正在走出巢穴，要执行一项凶恶的计划，搞什么政治上的合纵连横或是伏兵突袭，或是出卖自己的笔杆子，出卖自己的言论……。这种假面具与傻瓜的当众大表演，所得到的收获就是民众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挖苦耻笑和模仿效颦。每当有人大声喊叫“唉呀，这个淫棍！”的时候，总是有某个银行经理或是政界名人在宗教游行的行列中经过。披上黑纱的煤气灯，仿佛像是戴着

高帽子的黑白混血儿，被租用来在出殡中弹奏吉他。奇形怪状的人物所经之处受到阴森森的、不断的欢呼。

原籍巴西的年轻贵族某子爵，不但将两角帽上白色的羽饰换成了黑色，而且缝了一块黑布巾，从帽子上垂下来，在他的脖子上围了两圈，看起来活像一个寡妇。

坐在一辆大车上闲荡走过的有马里亚·费尔南德斯，燕尾服上挂着勋章，勋章上铺上黑纱，像是一家啤酒厂的厂徽似的。在雷斯特洛那栋房子正对面，人们在鼓掌嬉闹。新登基的那位陛下探头到车外对人们微笑致意。伯爵府邸的窗全都盖上了从裤子上剪下来的布块，阳台上摆着一些蜡菊花的花圈。真是匠心独具！简直像个家族墓地。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蜡菊花用过后还可以酿制糖浆。在国王乘坐的原若奥五世的马车上，车顶所有的花饰都覆盖着黑绢纱，活像一个防蝇罩。一阵交谈，一阵喧闹！“男爵，再见了！”“那么你不来了吗？”“唉，多么恼人啊！”又是哈哈大笑，又是讲故事，又是从马车的窗口喷出雪茄的烟雾……。成千上万张欢乐的脸当中，一个马车夫的脸引人注目，因为他在揩抹泪水。真可怜，一个马车夫竟然为国王的驾崩而伤心。就让国王去见鬼吧！

“他之所以哭，是因为死了一匹马！”

在王宫广场上，老百姓的人群参加了进来。这是送葬行列中最严肃的一部分。但是，老百姓带进来的肃穆气氛刚刚开始有点眉目，看热闹人的那股热劲就在一旁爆炸开了，终于还是没有办法造成哀哭的场面。

在索德雷码头，一家商号写字楼的窗口上出现一些身穿黑色衣服的太太们，美丽绝色。噢，把一串葡萄一手接一手地传，人人都想像云雀一样在上面啄一口，哈哈大笑，身体翻来转去，争着这串葡萄。有些太太甚至向过路行人的高筒帽上扔葡萄粒儿，碰得咚咚响，以此来取乐解闷。两辆花车使花花公子们不禁缅怀起尼斯的那些狂欢谢肉节。街上的一个妇女天真地问：

“那么，国王是分乘两辆车的吗？”

行列随时都有空断的一段，这时，卖糕点的人就塞了进去，增添了一点露天联欢会的俗气。

零星的叫声：

“现在来的是一群宫女……”

“节约储蓄，从鞋跟到住宅……”

开始出现了军队：有好几营，士兵们带着分属几个团的番号，上校们身上涂的白粉混成了一片，制服上的勋章溅上了石膏。师长大人弯腰驼背反而大受欢迎。有个家伙向他喊叫：“米格尔，你怀孕了！”

另外一个人给他出个主意：倒不如将勋章挂在后背上。卡洛斯国王的欢乐的确是喜气洋洋。多么亲切，多么活跃：甚至看来他眉端的肉也少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喊叫说：

“爱丁堡的那个人没有来！”

来，本来是要来的，不过这一天早上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午饭时只喝了6瓶波尔图葡萄酒。他用饭完毕正要离开餐桌的时候就晕倒了，这种眩晕，是葡萄牙水手们和英国亲王们最容易犯的毛病。

遗体运到了圣维森特教堂，鸣放了礼炮，敲响了丧钟。在街上向天鸣了枪，这是一个庄严肃穆的、独一无二的时刻，驾崩了的国王一劳永逸地脱下了元首的长袍，要变成垃圾和木乃伊——教会也特地挑选了这个时刻来告诉王后说，她丈夫的亡灵此时此刻一定是在同魔鬼撒旦一起进餐。

因此，这位善良君主的下葬，什么羞辱都受到了。亲王们和廷臣们，大人物和小人物，人人都亵渎这位死者，而不向他致敬。连儿子也嘲笑他，从前的大臣们把他称做堕落腐化之徒和软骨头，教长把他比作与人通奸的淫妇。夜幕降临了，这一大群文武官员们驾着飞快的马车离开圣维森特教堂踏上归程，这一大群人的神情，显示出他们这时已经置那个做父亲的不顾，

□ 康乃馨译丛

去赶路程，要连忙投靠到儿子的羽翼之下。

这些人当中也许不包括霍亨索伦，他的典礼马车出了毛病，只好同助手们一起步行直到罗西奥，在那里截住了一辆破马车，直奔卡尔洛塔^①的宫殿而去。

① 卡尔洛塔 (1775—1830)，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之妻。

猫



20天以来全国都
只是高呼共和国万岁！

王朝对于人民的愿望置之不顾，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对人民的欢乐不闻不问，甚至对人民的愁苦加以嘲弄，所以人民对这个王朝已经厌倦了，对它不感兴趣了，把它排除出全国十字军进征之外，开始把它视为一个穿堂入室到自己家里的可疑的外来王朝，视为那个把持着被奴役的欧洲并垄断着与吸吮着各国人民血汗的各国国王共济会派驻我国的代表兼间谍。

我的先生，这个运动并没有停止，人民的怀疑并没有打消。250年的穷困生活使得葡萄牙民族成了一个臭水塘，让头戴王冠的鲤鱼们能在它的脓污中生长并

繁殖。要用疏浚机把这个臭水沼泽疏浚一番，清除它的污泥就必须把这些得意洋洋的鲤鱼钓起来，把它们送到盐水桶里去，天晓得，也许是送到法国或是英国的某家旅馆去。多年以来这个疏浚机在我国一直安装着，它庞然大物的部件已经历历在目了。它的独眼巨人式的绞盘、它的那些像人肤色似的青铜链条，穿过出水口和齿轮，吱吱叫着，在这部机器周围绕了一圈又一圈。

陛下的密探们可以向阿尔科斯的那个狡猾之徒密报有哪几家作坊正在为这部疏浚机敲打这件或那件辅助部件。对于那些工余之暇到诗人们的塑像底座上放置花圈，而在君主们的塑像下放置大蒜以泄愤的粗心大意的工人们，国王的枪手们可以向他们的脸上把60发子弹全都开火打出去。可以把他们破获的这家或那家作坊夷为平地，勒令《祖国报》停刊，查封《恩里凯斯·诺盖拉》、起诉《世纪报》和《辩论报》……。但这对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民主这种热病，同别的热病是一样的。一个细菌就可以繁殖，专制统治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这个人的脑子就会冒出千千万万个细菌传染给仅仅几小时之前还被视为已经免疫的人。

最近的反英热潮使最后一批忠于王室的人也都被推出了王朝的阵营，20天以来全国都只是高呼共和国

万岁！

这个呼声在传播着，使得每个早已哀莫大于心死的人重新振奋起无比旺盛进取的热望。响应这个呼声的在科英布拉，是3000个莘莘学子的颤抖的嘴巴；在波尔图，是商店和学校的8000名青年人；在里斯本，是那些强有力的、积极的、有教养的、有势力阶级的10万个声音。全国各家中学正是听到了这个呼声才走上各自城市的街道去进行募捐，购买军舰。各个市镇议会正是听到了这个呼声，就投票通过拨出大笔款项供国防基金之用。各个商会正是听到了这个呼声，就立誓不再买任何英国货。在课堂上，教师们讲课时暗示了这个呼声。在各军事要地和民政机关，大官们容忍了这个呼声，接受了它，把它当作是通往一个未来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叩门砖。还有别的一些表现呢！

一个月以前，以贵族和僧侣为首的近500名来自各地的各界公民在三一剧院的大厅里聚会，认捐款项以供国家军备之用。这个类似救国大会似的会议吁请一切人都慷慨解囊，唯独国王陛下的名字提都不提。所有各家保皇派报纸，一家也不漏，在40天期间一直在打呵欠，谈论近日这些爱国热潮的前因后果，以及国家政局可能的前途。这些报纸讨论并且指出了所有种

□ 康乃馨译丛

种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指出葡萄牙王位宝座上坐着一位国王的可能性。那么，到了阿拉戈阿斯号船驶抵这个港口的那一天，又有谁能阻止我们在王宫上写上字条呢？

猫



第二卷

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的悲剧

(摘录 1890 年 3 月至 6 月)

马努埃尔可以说是在谁都没有等待着他的时候来到了里斯本(注见 55 页)。他已经经历过由缪尔格^①、古斯塔夫·普朗什^② 和

① 缪尔格(1822—1861)，法国作家，20 岁时被父逐出家门流浪多年。曾任托尔斯泰的秘书。

② 普朗什(1837—1890)，法国文艺批评家。

热拉尔·德·聂尔瓦尔^①所倡导而流行一时的那种文学生涯中最七零八落的阶段。他晚上就睡在楼梯的顶楼里，在半杯掺热糖水的烈酒的杯底里作出高超的乌托邦空想：这是一种外套翻过来穿，被子在当铺里还未赎回，把动物肝脏切成小块炸了吃的苦日子。早在那个时候，马尔汀纽咖啡馆里那一批浩浩荡荡的拜伦式的反叛分子人数正在减少，开始出现了一种恶劣的现象，就是矫揉做作，装模作样，声音像小羊羔，常常翻白眼。原先那些文学家们为了避免同别人的资产阶级模式混淆而故意作出的一些姿态，现在更为变本加厉。我不知道是哪一位作家曾经对冷水大加赞扬，只见文学家们纷纷涌往公共厕所去。他们的文学像新入伍士兵的破靴子一样褪色，连他们的家人看见也认不出来了。马努埃尔，这位神奇的马努埃尔，他晚餐吃4分半钱的鳕鱼。他是个披头散发的流浪汉，身穿琥珀色大外套，长着青年人的胡须，鲜红的嘴像个婴儿。他来到特茹河，正碰上了一个一切都要为了金牛而牺牲的不景气时期，当时，记者们当中已经流行穿白衣服好凉快些的风气。现在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神经质的

① 聂尔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著有《西尔维亚》、《火之女》等。

人物，遇到困难的局面也摆出一副事先对成功十分有把握的姿态，而且神气十足，仿佛他是在王族的摇篮里长大似的，天天都戴着浅色手套，对自己的鞋跟已经歪斜从来不注意。他吃中饭就盼着吃晚饭，吃晚饭就胡思乱想如何吃夜宵，吃夜宵又担心明天的中饭。甚至说不定他就寝之前抽的不是雪茄烟而是对雪茄烟的回忆——这样一个人的忽然出现，在每家咖啡店里使得那些吃过晚饭后正在品尝朗姆酒，叨一支雪茄烟，面对一个熟人，大叹生活乏味的人们冰冷的目光为之愕然。

马努埃尔在里斯本几乎不认得任何能住得起房子和有两件外套的人。他在流浪期间结交的朋友都像他一样穷得叮咣响的马路夜游神，睡就睡到台阶上，进行精神会餐，想着豌豆鸡块是什么滋味。遇到走运的日子就一起吃顿夜宵，佳肴就是在一条烟雾迷漫的小巷隐蔽处偷情作爱时被当场抓获的雄猫烩肉块。

他停下来寻找方向，像是在多此一举地翻寻腰包，一脸在家里受了委屈的样子，现在他想起了6年前一件走运的事。那一天晚上他把手伸到一件从旧货店买来的夹外套当中，竟意想不到地发现里面有5个托斯通。穷人的枕席欢娱总是硕果累累的，每隔9个月就要爆出孩子，像枝茎长出新芽一样。但是陈旧的外套

的假衫里，却不懂得每一次都从那只奸污它的贪婪的手那里受精怀孕，哪怕只是生出一个小额币也好嘛。他曾经在英国的报纸上看见过一个消息……说有个乞丐从富翁那里得到了一个不知是哪国的铜币，看来是从一个曾经有过金镑叮咣响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这个乞丐发现了钱币正中有一处似乎是鼓胀起来的東西——他对自己说，也许是铸造的时候出了点毛病吧。于是他边哼唱着，边朝着最近的一个酒吧走过去。忽然他握紧的手里爆炸了一下……原来是那个铜币，它在富翁的口袋里同金币接触而怀了孕，成功地分娩，产生了新的钱币，而且全是银币！唉呀，真是糟糕！在南欧的这些热得把一切都要溶化掉的国度里，生育能力不但在母亲们的卵巢里中断了，而且也在愚汉蠢夫的肚皮里中断了。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生了一大堆子女的要数国王若奥四世了。

但是，别想得太远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正确的去向。是沿着马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现在是各剧院上演的时刻，狂热的人群正在吱吱喳喳地摩肩接踵。他曾经听人说过，在里斯本，人们煎沙丁鱼的手艺很高明。……于是他翻阅自己的笔记本，想知道格雷米奥在什么地方。笔记本给他指出了这地点的所在，他就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摆出一副更加独来独往的姿态。

他穿过一个又一个大厅，翻阅一份又一份报纸，注意看了绿厅的挂钟，以业余爱好者的姿态欣赏着靡菲斯特^①铜像。由于对油煎沙丁鱼的向往使他心痒难捱，他就在脸上摆出了一副不耐烦的神气，想知道子爵来了没有。

“您说的是哪一位子爵啊？”侍者问。

“就是子爵，你不会认识别的子爵吧。”

“先生，来这里的多着呢。”

“那么就是其中的一个。”

“啊，这一个今天没有到这里来。”

在一个蒙着棉布的书房里，一些老头子在板凳周围议论殖民地问题，但是慢条斯理的，没有急于要加以解决的样子。而在稍远的地方，两个巴西人正在埋头评论墙上挂着的一幅用金色框子框起来的画。

马努埃尔十分客气地向绅士们打招呼，他风度翩翩，围巾代替了衬衣，黄色大衣都扣好了扣子，一只手像拿破仑似的插进了胸前的衣襟之中，慢步向那两个巴西人走过去。这两个耗子似的人当中，一个是脸无表情的，单眼眼镜终于戴在眼眶里。此人害骨髓神经根炎，蒙蒙眈眈的双眼骨溜骨溜转——黄色的虹膜

① 靡菲斯特——德国诗人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的魔鬼。

套在冒血的巩膜上——他的嘴很大很大，哈哈大笑时简直像是被砍了头似的。至于另一个，他个子很小，肤色像未打开的南瓜，头发在头顶处分开，耳朵底下都剪得齐齐的——像是套上帷幔的花边作为发网而到处抛头露面。而马努埃尔呢，他蹒跚着双腿，也停下来分析这幅画，不慌不忙大有内行人的架势。

“是同摩尔人的战争图！”那个矮小的人终于咕哝出一句，打断了他同伴的静思观察。

那个像是被砍了头的也表示同意：“你看见了吗？”马努埃尔更加走近了，他有意忍住一阵哈哈大笑，一阵别人觉察不出来的、高傲的大笑。那个样子像害骨髓神经根炎的已经转过了身来，张开嘴，露出大得离奇的牙齿，像是张开了一面大扇子。

“怎么啦？”

“先生们，这是《掳掠萨平妇女》^①呀！别弄乱了……”这位流浪汉说，“这是一幅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在人体解剖的刻画上十分严谨。”面对这两个目瞪口呆的庸人，马努埃尔显得似乎要滔滔不绝地向他们介绍历史背景。他嗫嗫嚅嚅地讲了罗马的建国、这座城市

① 《掳掠萨平妇女》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1594—1663)于1636年创作的代表作。

的幼年时代、最初的一批口头宣读的法律、缺少女人的情况。讲到母狼给雷穆斯和雷穆卢斯^①哺乳的时候，他腔调十分悲壮，提到了审理官大街……。两个巴西人听得眼睛里直淌泪！

“年青人，且等片刻，”那个肤色像未打开的南瓜的人说，“你同意我给你介绍一下跟我同船来的同乡吗？”

那些围着长凳子聊天的人们，全都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伸出拳头。

“现在给我们解释一下萨平妇女的事吧”巴西人齐声地嘟哝着说。

马努埃尔叫他们分成几排坐下，把手伸到头上抹了几下裹头布，好启发一下才思，然后作出美妙的姿势，伸出了帽子：

“每人两个托斯通。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大厅的门口，忽然响起了一个喊声，“喂，马努埃尔！喂，你这个坏蛋！”原来叫喊的是儒利昂，是新闻记者儒利昂。他是靠写政治文章爬上去的，成了个精明的办公室职员。他把欠帐都还清了，流浪生活结

① 雷穆斯和雷穆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的儿子由母狼哺乳长大，后来雷穆卢斯成了罗马的开国者。

束了，开始梳英国式的头发，涉足上流社会，手戴形状奇特的手套，而且是所有慈善团体的终身干事。

儒利昂在所有挤在酒吧门外望洋兴叹的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靠拼搏冲刺出人头地的理想人物。

他一爬到顶峰之后就变得很随和、很能忍让，一反过去的那种共和主义思想。过去他连衬衣都穿不起，很善于在没有衬里的外套领子上缝个纸领衬，并且在穿得破烂不堪的靴子帮上用擦蜡线缝上补丁。

他们两人拥抱起来。

“我在这里碰到你，真高兴啊！”儒利昂大声喊叫。
“你住在哪里呀！”

对方向他说明自己并没有固定住处。

“怎么的？”这位绅士式的人说，他边说边装作吃惊的样子。“但是你中饭在哪里吃呀？”

“我不吃中饭……”

“好的！我看你哪，你还是早上睡你的懒觉。不过你起码该告诉我，你这个朋友，你到哪里吃晚饭吧？”

“我晚饭也不吃呀！”那个流浪汉哭丧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太糟了，”对方低声地说。“坏就坏在我现在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带。”

这时候马努埃尔已经在轻轻地抚摸儒利昂的那件

大衣的精美面料。

“这件大衣在罗马百货公司起码要卖 8000 个雷阿尔。这是件漂亮极了的废物！少了它，再也找不到能用同样的价钱赔给我的了！”

“咱们去吃夜宵吧！”那个坐办公桌后的人忽然叫喊说。于是他们就出去了。

“你先告诉我，你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吧？”流浪汉把胳膊挽着那个新闻记者的膀子说。

“我正在经营我的小窝，尽力而为吧。”

“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啊，难啊！想当年咱们那些晚上在你家里推心置腹地议论人生、议论书籍、议论人……。谁都没有像咱们这两个鬼混的人那样，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撕破过一个畜生！”

“是呀，真得好好教训了他一顿！”马努埃尔说。

“这些人到底是白痴，还是奇才，这同我有什么相干？我本来应该预料到这些人日后将会成为这个国家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现在呢，他们全都不肯原谅当年我对他们这么放肆，而其实规矩的做法应该是一开头就博取他们的好感。这一来，就可以及时对他们的血缘门第加以利用。我们几乎同所有的人都结下了解不开的冤仇。”儒利昂还举了一些人的名字作为例子。

“你简直无法想象，我费尽了多少心机巧计，才争取到那些我昔日同你一起合伙找过麻烦的人物重新同我言归于好！看起来他们那 36 条蠢驴当中，出了 3600 名有势力的枢密官，他们控制着我所朝思暮想的一切官职，挡住我胆敢抬头张望的一切机会的门槛。”

“但是，凭你这一身本事，把他们压倒就是了嘛！”

“什么把他们压倒！得满脸堆笑，装成对他们素无恶意的样子。我呀，我已经适应了气候。对已经有了名声的人们，就不妨敬他三分，一议论到政府，我总是字斟句酌，比任何人都懂得吹捧大臣们的德政，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懂得掌握政党的秘密，那些对我合适的肥缺，我看得紧紧的，绝不大意。”

他还用怀恨在心的口气加上一句：“有朝一日，老子爬到了上面……”他伸手作出了一个砍刀从上往下砍的手势。

“总而言之，”马努埃尔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将一切廉耻全都一古脑儿扔到大海去。”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店，儒利昂想吃鱼，马努埃尔噘着嘴，先要了一份浇了特尔莫红酒的粥。

“你这次到里斯本来是干吗的呀？是来工作的吗？”

“我对外地已经厌倦了，后来我又在报上看到，要开办一个大提琴教习班……”

“你选择了当音乐家这一行，真了不起！你已经注册入学了吗？”

“我没有，你呢？”

“听着，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我的那家报馆每篇小品文的稿酬是 3000 雷阿尔。每周两篇，一个月 8 篇。总可以贴补贴补罢，去他妈的！”

“噢！我很讨厌替别人写东西。我的艺术理想是无畏无惧的，而我的描绘手段却可怜得很，二者之间有天渊之别，真是使我无可奈何，不愿在同时代的人面前献丑。但是，你相信吗？……尽管有这件小事，我的神经还是渗出十分细致的敏感触觉……。这些触觉细致极了，甚至我只要一想到那个美国人可能把这些触觉压垮，我的腿就要发胀。”

对方听了笑了起来，他又说：

“现在，我要等到我的那位老头子翘辫子我才会养成劳动的习惯了。我要拿他留给我的遗产买一座磨坊和……”

“总之，你永远都会是个流浪汉。”他们又谈起了昔日的郊游玩乐，谈起了在“肚肠果园”的掷环游戏，谈起了玩弹子球输了欠下的债，谈起了在这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发生的瓜瓜葛葛，还谈起了那些溜到他们床

上来的小姐儿。她们来不是为了欢乐，而是为了在狂醉中挨打。

“是那个老气横秋、斜眼的罗德里格斯吗？”马努埃尔问。

“他奉了命令，要在文学上落在我后面6年，所以我写的文章，全都由他署名。于是他受到了人们钦佩，这是我的估计，因为我看见他现在戴上了手套。”

“那个管供圣体的福尔雅斯呢？”

“他有一次参加晚宴，没有能够偷走餐具就自杀了。自杀是他干的第一件好事，可怜的家伙！”

“我听说他是上流家庭出身的。”

“不错，他父亲是偷手绢的。”

“好啦，算了，够意思了。”他们二人一杯又一杯地开怀畅饮。出门的时候，都蹑蹑蹑蹑。马努埃尔用口哨吹着《马赛曲》，同警察们碰碰撞撞。儒利昂感动得哭着，他提议一起到他们旧友们的剧院去逛一趟。

“你自己也变得真厉害啊！”马努埃尔啜嚅地说，他的下巴固定着。“连你现在也用衣领了。”

“老兄，衣着打扮是人类对地球的最高的观念之一。我喜欢的，比方说，一件燕尾服……”

马努埃尔愣了一下，下垂的嘴边显示出一种蔑视

的表情。不过他最后还是妥协了：

“燕尾服就燕尾服吧……要深黑色的才好。”

到了旗帜拱门，他们在拱门的墙根遇到了那个传奇式的学生公寓，但这地方现在已经改成了一家当铺。本来，这里曾经出过一些思想古怪、奇特非凡的才子，也出过一些悲剧式的怪事。

“桑托斯会成什么样子了？”他们其中的一个说。

“他从一个铁匠那里把多洛丽斯抢走了。只有浪漫成性的西班牙女人才会这样宁可不要财富，也要到这样的地方来粗茶淡饭过日子。”

“这个可怜的傻瓜对她简直是崇拜到了极点，连她在吃饭最后吃橄榄的时候吐出的橄榄核也一个一个地收集起来。”

“你清醒清醒吧。没有什么诗歌能比饥饿更美的了。”

“说的是别人的饥饿那倒不错……自己先在塔瓦雷斯饭店饱餐一顿夜宵之后，再写诗来描写别人的饥饿。”

到了莫拉里亚，他们连自己曾经住过3年多的那栋房子也认不出来了。房东老板娘是多明加斯，是个很固执、会弹吉他的太太。有一次，他们想起了她的

一只米格尔派^①的猫，被理工学院的自由派逮住宰了，用来炸土豆，烧了吃。

“政治呀！”马努埃尔带着哲理的口吻说。

“她女儿怎么样啦？”儒利昂问。她是个玲珑圆润、惹人怜爱、像小孩子一样羞羞答答的姑娘……以至于儒利昂也不由自主地背着马努埃尔同她谈情说爱，而马努埃尔在儒利昂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过了几个月，这女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像个圆桶似的呆在房东老板娘家里……”

“找了一个郎中来，带来了一些药丸。简直是令人发笑的故事！”

“她怎样啦，可怜的？”

“听说她同在一个在伯爵大街剧院卖票的人私奔了，这个人听医生的劝告，打了她。”

他们正在莫拉里亚的一条小巷里走着。那里的房屋又高又窄，楼梯盖满了烟垢，灯光惨淡。灰色的泥泞使得脚步不出声响。天窗里传出了嘶哑的人声，还有酒馆里隐隐约约的吉他声，墙角的吵架声，吵架当中时不时爆出一句猥亵的咒骂语。在被罪恶弄得破破

① 米格尔派，指在葡萄牙国王米格尔（在位1802—1866）同其兄弟彼得罗四世（即巴西国王彼得罗一世）的争夺葡萄牙王位的斗争中支持米格尔的人。此处是用作讽刺。

烂烂的半开半掩的门前，一些姑娘就睡在煤油灯下，横跨着门槛，像小狗一样头歪到一边，双手合在一起托住。——她们当中有些乍醒过来，眼圈还发红，机械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们走来，招徕他们，但不是为了情欲，而是出于饥饿。但是招徕不到就无可奈何，只好重新恢复那种待拍卖的女奴姿势，再睡她们的觉。

这整个污秽的贫民居住区散发出一种粘乎乎的伤感气氛。它房屋的正面到处是裂缝，窗户东歪西斜，到处可以听到孩子的哭声。一些料想不到的猫儿翻来复去地摆弄一些沙丁鱼头，但在路上是不会有谁给它们扔沙丁鱼头的。

“全都到此为止了，”马努埃尔叹一口气，他胸中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里斯本已经不是里斯本了。再来一杯烧酒吧，好不好？”

（注）若泽·派斯·德·菲格雷多和安东尼奥·若泽·达·科斯塔·蒙特内格罗这两位海军军官，是我所敬慕的人。在自由自在的学生时代，我同他们是同学，无话不谈。他们二人之死使我不禁想到，时至今日，30岁就算是老年了，我现在已经大有资格去回首往事，从中找出写作的题材，而不必斤斤计较，将文学作品的情节同某些墓志铭式的记载区分得那么一清二楚。

有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道德厌世感，使我对于凡是我未能亲眼目睹其成长过程的人就不那么放心。由于有了这种道德上的厌世心理，我就

无法结交上新的朋友。而对于老朋友呢，我也把他们变成为我这个自我的一种外烁，这样我就打算本着我的兄弟般的敬重之情去塑造他们，把他们塑造成我身上蠢蠢欲动的奇怪畜兽的几种不同模式，从而为我自己制造一个幻觉，仿佛我生活在他们当中，其实只是与自己同在而已。

虽然这看来有自我夸耀之嫌，但我仍然要说清楚，在我的经历当中，也有过不少人是例外的。他们内心清晰明亮，不带任何哗众取宠的人工假饰做作，但并不因此而稍减其天才火花的闪烁。他们在艺术上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使得他们没有能够成批产生传世的惊人之作，那怕是小小的作品，因为过分动感情，对于强烈的作品是不会喜欢的，而这些又是如此的细腻，它们只好停留在感觉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一点上。

但是，在那些用我的话来说已经事先注定了命运的人当中，真正能活下去的并不多。在青年时代告一段落的钟声敲响之时，那些尚未在作着思想与言词的虚幻结合迫害梦当中死去的人们，那些尚未悄悄地溜进到非洲和美洲去的轮船里面的人们，就像我这样，在青少年幻想的篝火余烬中翻来翻去，寻求一点尚未熄灭的余火，一面看着天边临近的秋色带来丝丝寒意，一面又向没有回声太空作出可怕的忏悔——岁月何蹉跎！……

在15年的同伴生涯中，我对于那些亲密者中之亲密者，怪杰中之怪杰们，已经学会了把他们看作不可捉摸的歌手、狂热的诗人、私奔下凡的半神半人。其中突出的有一个怪人，由于家庭亲属的关系之不便，我不得不给他取个化名，叫做马努埃尔。他的专题文章我也有意从一些故事情节和人名中删除，以免某一位因为成了杀害亲生儿子的刽子手而悔恨不已的可怜老人在心灵上更增加悔恨不安，也免得某一个愚钝汉看见了感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他对这位可爱的青年人在心灵上的崇高地位和他的满腹经纶向来都一无所知，终于害了这个青年人。

猫



对中学考试的采访： 中等教育的倒退以及 葡萄牙青年的病态

(1890 年 7 月 9 日)

若干天之前，我曾到里斯本的中学去看他们进行考试。对孩子提和青少年时代的这一番情境，我已经有 10 到 12 年很生疏了，往往情境就是千篇一律地重复这一套：

“何谓比喻？”

“ora cebo 在拉丁语该怎样说？为什么按照正确的逻辑 Illusfração 本应用双 l 书写？”

“为什么河流只由水来组成？”

“你对意识、内心、内在感知等等是如何理解的？”

我到这些满是痰迹、阴森森

的考场简单地察看了半个钟头，就看到了1890年的中等教学大纲及其相应的各个教育课程（这已经经过教育家们的朽木脑瓜子进行了六七次反复思考的改革并经公共教育委员会正式下令批准的了），同我那个时候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并无丝毫的差别。在那个时候，阿马多神父是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最害怕又最讨厌的人物，而阿尔瓦雷斯·佩雷拉^①在家长们的恶梦中出现时，则表现为拉普拉斯^②的鬼魂，披上了刽子手参孙^③大力士的外衣。

经过这次半小时的访问，我很容易就看出，我国的中等教育本来宗旨是要给莘莘学子的头脑充实一系列有关这个世界五花八门的一般知识（如已死的语言和活生生的语言、三次布匿战争^④的历史和拿破仑的多次征战、电气机械与法律、方程式与形状绘图），但却是仍然像过去一样折磨着这些年青人。这些折磨同我当年所受到的刻骨铭心的折磨一模一样，而且也是

① 阿尔瓦雷斯·佩雷拉(1360—1431)，葡萄牙历史上武功最卓著的勇士，少年时代即以勇猛作战见著，二十几岁即立下彪炳战功，受到殊勋与册封，但后来放弃一切荣誉及财产，进了修道院。

②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创造出或然率理论及宇宙体理论。

③ 参孙，《旧约圣经》中力大无比的大力士。

④ 指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发生在罗马和迦太基间的三次战争。

让学生们像我们当年一样劳心费脑。这样的劳心伤神，使得我们升到高等学府的时候已经是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对光辉灿烂的科学，只是通过一个麻絮式的三棱镜来观看，对绚丽多彩的人生百态，只是通过一种格格不入、有时甚至是幻觉式的怀旧心情来观看。在这种心情当中，许多日后无可救药的疾病细菌，正在纷纷出动。

葡萄牙青少年的教育者同 10 年或 12 年前一样，仍然规定中等教育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部百科全书；不是一个准备阶段，而是一个终极目标；不是一种对人们头脑有弹性的活力加以试验的操练运动，而是一场决战——经过这场决战的各次小战斗，许多人都弄得精疲力竭，缺胳膊短腿，就这样去度过其下半生。

这些可怜人同我当学生那时候一样，忘记了在这个向学生提供最初一点点智慧亮光的阶段中，学生对每一门学科只应该略为体会一下它规律的最简单细节，从而能够对这门学科的精神有所理解。中等教育正如拉维斯^①所说的，正如一种操练，首先应该针对每个学生的特长，因为人的头脑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

① 拉维斯 (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1900—1912 年出版)、《法国近代史》(1920—1922 年出版)，并曾与韩波合编《4 世纪至当代通史》(12 卷，1893—1900 年出版)。

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如果千篇一律地把他们全都往一个整齐划一的文化框框里硬套，哪怕这只是一个准备阶段，也是一种违反自然的勉强做法。

不过，我现在不想多谈这个中等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来就话长了，而且已经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们在讨论着。我只想提请大家回过头来注意一下青少年教育的一个大脓疮，而且这个脓疮比前面讲的那个毛病危险得多，因为它有可能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其生命最纯洁的开端之时就遭到毁灭。按照世代相传的惯例，经过若干年后，本应由他们来引领这个破烂不堪、凋零破碎的葡萄牙社会。

这个脓疮就是我昨天在里斯本中学的校廊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学生多半身上显示出那种体质孱弱、麻木不仁、疲劳酸痛、愁眉苦脸、形同幽魂。他们三三两两垂头丧气，脸色惨白，像等待着死刑判决的囚犯一样大势已去。有些比较规矩的近视眼患者，就穿着高领衣服，垂着肩头，手是潮湿的，手腕空空的（显然这是他们班里与学校里最用功而且最规矩的学生），蹑着脚尖走路，怕出声音，说话压低嗓子。还有一个讨厌的现象！就是他们停下来看试卷题的时候，神气之冷淡，恍如法律代理人，态度之卑躬，恍如教堂执事，其枢密官式的抑扬顿挫，恍如阿卡西奥在殉教者教堂

的外层挡风门上宣读陪审员们的名单，而路易莎则以女人对不懂得文明的乡巴佬本能的厌恶态度在躲开他。

在院子台阶上，时不时有一队队两人一排手脚不灵的孩子在一个军曹似的训导员监护下走下台阶。他们是向自己的学校走去，腋窝下夹着油腻腻的课本和上面写了已做的题目和已解的方程式的毛边稿纸。他们僵直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一句高声的话也不说，一丝自由自在的笑容也没有，一点儿独立自由的姿态也没有，能看得到的只有他们忧郁的目光所反映出他们家庭的悲哀。引领他们的带路人和禁锢他们的监狱长们申斥时，他们总是像奴隶一样弯腰俯首。

偶尔有个淘气的孩子，脸色红红的、劲头大大的，穿着短裤子，头戴水手帽，在这个墓穴似的死气沉沉的地方还竟敢耍聪明，逗笑话，追赶某个同学，握着运动员似的拳头。但是职员马上前来责备了，学校训导员马上俨然以长官威风凛凛的姿势，伸出胳膊给他一巴掌。在室内，监考官们戴着眼镜，身穿条纹衬衣，叱责着“嘘！”，于是那些看着考卷的学生们，脸上剃得光光的，一副像神父似的、有疵斑的脸，年纪只有16到18岁，已经未老先衰了，正像《查理在寻开心……》中的希拉里翁老兄那样……。监考官们像开枪

射击似的透过眼镜射出耶稣会员似的怒火，射向那个斗胆的孩子。他竟敢在人人都像没精打彩的暗影似的队伍当中，在这种对我国未来智力人才加以屠杀、类似屠宰场的修道学院中，引爆这个混乱的哈哈大笑炸弹，竟然作出动物性的鲁莽言行。

“一半以上。”我在前面对你们说过。

对于一半的应试者，很容易指出他们受教育经历、他们的健康生活与日常生活经历、他们那种由于要将在家里过于淘气而养成的暴躁脾气加以管束驯化而过着冷冰冰的幽闭生活。组成这一半的，是里斯本各中学的住校生和半住校生，他们在外地的家把他们撵出家园，是因为无法让他们去面对别的方式的考试。如果家是在首都的，父母则把他们打发出来，定期给钱接济是为了免得他们胡闹，使妈妈们未老先衰，使邻居们不得安宁，甚至有时使得女仆们的纯真处女心灵由于犯了小小的越轨行为而被玷污。

如果我的声音有人愿意听的话，我就要向那些在葡萄牙负责监督青年学子教育的诸公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们全体组成一个经常性的监督大会，并聘请专门的学术人才、卫生专家、医生、中学教师，乃至学生自己来充当顾问，以便一劳永逸。真诚而大方地（不是小里小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保护这所学校呀，采

用哪种课本呀) 建立一个从科学的观点来看适合于青年的教育制度。时至今日, 大家对于“劳累过度”(这是中学课程极为沉重的结果)、“疲于奔命”、静坐少动(寄宿制的结果)等现象, 对于精神上的培养如何能跟得上身体的发育(这是神圣的, 不能由于任何别的需要而牺牲掉, 无论这个需要是多么的迫切)会造成多么不良的后果, 都已经人所共知了。总之, 对于那些危及我们种族的前途, 而且现在已经正在使我们的智力水平降低到令人不寒而栗的极低程度的一切缺陷、一切恶习、一切错误, 都要设法加以避免。

我还希望这个由全国一切严肃热心之士组成的大会, 在制订了一个方案之后, 就着手去对各报愚蠢地主张而且风化警察又加以纵容的那些男女同校的学府一一加以检查, 一律加以查封, 一家不漏, 这对全体国人将是善莫大焉。在我国这样的条件下, 这些寄宿学校, 只不过是一个经常性的培养杀人凶手(我知道有人会拿什么论据来反驳, 这些论据真是新鲜!)、制造体质恶化、诱导道德沦丧、导致种种衰败现象的机构。在那里呆了五六年之后, 虽然学了中学预科课程, 但也得了消化不良症; 虽然数学得了个成绩优秀, 但也得了神经衰弱症; 学会了绘图, 但也失去了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即使最健壮的人能顶得住, 但遗传病几

乎总会使他们倒下去。可以肯定，在寄宿学校受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在离校时不带有某种或大或小、经常性或偶尔性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健康上或是性格上，表现在语言上或是判断的理智上，表现在啃掉了指甲根的嫩肉上，或是表现在人所凭藉的万物之灵的傲气上。这种傲气，帮助人认识自己的力量，去反抗利害关系的堕落、流氓行径和寡廉鲜耻，尽管尘世给这些东西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叫做生存竞争。

我当中学生（我虚度了6年之久的那所中学是里斯本最好的、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时期，寄宿住校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们清晨5点钟起床，夏季和冬季都一样，学习到8点钟。这是规定吃早餐的时间（一杯咖啡或茶、面包加牛油。我的筋肉今天之所以孱弱无力，就是吃这些面包加牛油得来的），然后又进课堂，一直呆到下午4点钟。

钟响4点就练一小时半的书法，然后就是晚餐。

晚餐吃的是一份用早餐剩下的面包泡的汤、一块水煮肉、两匙大米干饭、几块大白菜、面包和一种时令水果。这水果通常是未长熟的，或者是在果园地上腐烂了的。每逢星期天，这个食谱加了中间一道茶，它的内容不一定，有时是块动物肝脏，有时是动物的下水加上豌豆，另外还有一高脚杯的廉价劣质酒。我们

在烦闷透顶时用它的酒渣，在作业本子上乱画训导员们的漫画。

这种单调的、不三不四的、不充足的伙食日复一日，毫无变化，我们在住校的岁月中一直如此。晚饭后有两个小时的空闲，如果是冬季，就在密不透风的教室里度过。到了春季和夏季，就在一个种了歪歪扭扭树的 30 平方米的院子里度过（我们住校和半住校的学生一共有 120 到 140 人），没有游戏，没有任何娱乐。

对学生们一举一动、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和操行都进行监视的训导员们，每月可以拿到 12 至 15 雷亚尔的薪金。他们来自里斯本卫戍区的团队，或是从被解雇的写字楼小职员或看门人当中招募。他们是怎么样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可想而知了。每逢星期日，他们带我们到城里的街道去，到公园去或是到尘土飞扬、两边都是处处有裂缝的墙壁的环城马路去逛四五个钟头。在这样的行进过程中，我们总是两人一行排成黑压压的、死气沉沉的一字长蛇阵，沿着路蜿蜒前进，而路旁的顽童们就在耻笑我们，对“土豆营”发出欢呼声。

在我们每天长达 11 小时的被迫学习当中，学生坐在松木板凳上。板凳是用两脚钉钉死在地面上，没有靠背，硬梆梆的，坐在上面同受刑差不多，这些凳子

靠着巨大的有抽屉的课桌排成一行。在中等教育课堂（即大课堂）里，约 80 到 100 名 10 岁到 16 岁的学生一直被束缚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每天 11 小时），规定不准离开座位，不准大声读书或大声交谈。每一段学习时间只准出去两次，否则就要受罚。处罚的方法或则打几下手心，或则罚跪几小时，或则长时间在黑房里禁闭。

一大清早，就由校长来主持我们的学习。小孩子如果身子倚靠课桌，或是目光离开了书本，或是打瞌睡被逮住，那就够他受的！这位校长在年青时是个军曹。他是个麻脸的大力士，特别工于心计能发明出种种折磨下属的可怕办法。在家长面前，他又亲吻孩子。但单独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个十足的恶棍。在隆布罗佐^①的《犯罪者论》图片集中有龙巴迪的一个可怕匪徒的照片，这个人的相貌同校长一模一样。这个家伙曾因为虐待学生吃过几次官司。他有一次几乎把一个学生打死，因为打得太厉害了，学生犯了什么错我不清楚，不过几乎可以肯定是很轻微的错。他引起学生这样大的恐惧感，有好几次我见到一些同我年

① 隆布罗佐（1836—1900），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他认为犯罪出自身心的疾病，而非犯罪者的过错。著有《犯罪者论》。

龄差不多、比较胆小细嫩的孩子，看见他大发雷霆，他们就吓得屎尿同流，晕倒在地。

课堂几乎总是紧紧关闭着，没有通气孔，没有空气容积，没有对流，总是有一股像变酸牛奶的腥臭味、人体皮肤和肺散发出的毒素气味。宿舍是在一幢旧房子的上一层，草草改装来供这样一支大军住宿。在狭窄的走廊上，在天花板低低的小房间里，在杂七杂八的角落里，在煤油灯的灯光下，住校生的床铺连成一线，床与床之间只隔半米的距离。

凳子少得可怜。每星期天上午有半小时的吊环和双杠运动，不是必须参加的，而是依家长的意愿定的。在那些年头，尤其是外地的家长对体操仍然看作是小丑的操练。

其他方面呢，一概不管。对学生也没有隔一定时期进行体格检查，以抵御向孩子侵袭的病原体。在道德教育方面也没有监督。对学生的衣着、对他们的言谈、他们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精神娱乐、技巧训练和美术训练，全都没人管。孩子们对于训导员们的粗鲁举动，对于他们的言词和愚钝，都习以为常了。于是造就成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小子，羞答答的、虚伪的、白痴式的、遇到女人就乱了手脚，吃饭时大声吮吸盘子里的汁液，像个粗工似的。学生凡是有什么消遣的闲

书，全被没收，其实这些书是最适合少年人的智力发育的——校长就抢去了我父亲给我的几本加雷特和埃尔库拉诺的书，原先因为我抱怨学校里闲暇时间与课堂中烦闷得要死，父亲才把这些书给我的。

现在，尽管国内的寄宿学校学生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离人们想象的差得还远），但是只要寄宿学校存在一天，制度的根本弊病就会存在一天。

青少年时代肌体幼嫩，像植物的幼苗一样，本来最需要空气和阳光，但却被禁锢在校舍里。这种禁锢还会继续下去。

那种使青年一代因消化不良与营养不良而毁掉的、不充足的、千篇一律的、不合卫生的膳食，也还会继续下去。

那种军营式鱼龙混杂的生活方式的弊端也还会继续下去。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本来最为彼此相反的性格和脾气，随时都碰撞到一起：坏的传染给好的，女人气的软化了阳刚气的。道德教育的种种脓疮也还会继续下去，体育锻炼的不足也还会继续下去。这些体育锻炼本来可以对用脑过度起制衡作用，可以给学生们带来欢乐的气氛，可以促进他们的青春之美与青春之力量，例如武器的操作、歌咏、游泳、手工、野外树下冒着烈日与风雨的狂跑……。

现在，如果将寄宿住校制造成的种种弊病同本来就可能因遗传而带来的弊病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结论，作出如下的归纳并不是幼稚鲁莽的：中学生生活在葡萄牙无处不表现得骇人听闻。我国知识界在体质上与精神上的恶病，在葡萄牙之所以无处不表现得如此骇人听闻，中学教育是其远因，又是其近因。这种中学生活应该列为造成种种虚脱疾病的首要因素之一。这些疾病包括：肺结核、伤寒、贫血、脑脊椎感染等等。总之，我们的责任是要使这样的生活得不到公众的容忍，把它当作一件可恶的东西打得稀巴烂，让天主把它贬下地狱，千秋万世永远不得翻身……

猫



穷阔气：葡萄牙 人人都想穷汉装阔佬

越是一级一级往上去，家里人心知肚明的规矩同对外交际的规矩之间的悬殊，外表排场阔气同内部生活破落潦倒之间的悬殊，资财与花费之间的悬殊，“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悬殊，就越是显得触目惊心。种庄稼的人对儿子的教育，不是教他去崇拜犁耙，而是将自己乡间生涯的农家乐说得一无是处，于是就把儿子培养成糟糕透顶的工程师、残缺不全的官僚。

至于说到模仿，情况就不一样了，是工人模仿君主，攀比讲究，已经成了通例。

举个例说，在大街上，工人对自己穿工作服觉得很丢人，就

想方设法在举止上和衣着上向老板看齐。

给砖瓦匠当小工的，到了星期天就戴上高帽子招摇过市，挣 240 雷阿尔的文抄公的女儿，舍得穿上锦缎裙子来争奇斗艳，这样的情况全世界也唯独我国才有。区区熨衣女工和小职员的女子，放着廉价的布衣布裙不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俨然像贵妇人似的去逛商店。她们百褶的衣料上染的颜色，其实是太阳一晒就要褪色的，上面的花纹，其实只不过是模仿丝绸和天鹅绒上的珍贵印花罢了。只消瞧一眼里斯本的工人和小职员的住宅区，就真相大白了。房间里又破又脏，衣箱里没有什么衣服，什么积蓄也没有。关起门来一家人躲在家里吃的只不过是竹筴豆，穿的袜子是破的，让小孩子害瘰疬，在污秽中打滚。但他们几乎全都有自己的大厅，穿得衣冠楚楚，全副行头，用这种方式在公众场合掩盖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处境。

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排场讲究到使人不得不倾家荡产。

一条新开的马路上，单单租一栋房子就要花掉任何住户一半的年收入，不管他是个机关首长，是个小工业家还是个小地主。最轻微的家务劳动，也都一分再分，由多个专门人员负责：有奶妈，有保姆，有厨娘，有餐厅侍者，有收拾房间的女仆，有缝衣女仆，有

喂马夫，有马车夫。由此往上去，还有一大堆多余的摆阔气的人员，负责子女的教育，负责侍候不管家务的夫人，还有专门陪伴女人的女伴，甚至还有专教弹竖琴的女教师和教多种语言的外籍女教师。这一切再加上时装店的帐单、剧院的支出、舞会的花费、订座费和慈善集会的捐款，种种由于女人互相攀比、由于要为儿女办婚事、由于要在社交中出出风头而增加的开销，那么，就可以推论得出，由于钱柜里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来绰绰有余地满足这么多的需要，有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事项，就只好割爱牺牲，来成全另一些纯属敲锣打鼓、虚张声势的事项。

对于自己现有的地位和名声，很少有人是心满意足引以为荣的，几乎人人都使劲想尝到更上一层楼的甜头，都拼命当众东施效颦，学自己上司的言谈举止。特依茜拉·德·瓦斯孔塞洛斯是个有才华的人，有眼光，肯思考，他每次奉政府差遣出国的时候，在国外都装成一个世代簪缨之家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叫金银匠在他的公文包上镶上顶端有男爵冕的花押字。安德拉德·科尔沃在任我国驻巴黎公使期间，签名签的是科尔沃·德·卡蒙斯。由于法国人对国外情况不清楚，这种做法曾经使得这个只写过《宫廷一年记》的不三不四的寓言作家一跃而俨然仿佛是《卢济塔尼亚

人之歌》的作者。

卡洛斯王太子大婚之时，宫廷的许多人家不得不将自己的家具和餐具送到当铺去，为的是能体面地参加庆典。有一个可怕的细节，那就是：有五家名门望族连自己厨房的炉灶也拿去典当了。由此可以推论，在这几天穿燕尾服和戴羽饰的喜庆日子里，他们只能靠附近小饭馆的鳕鱼加豆芽过日子。

然而，这种画蛇添足式的排场摆阔，其流毒并不单单限于经济上和道德上而已。

多几个在穷困中干蠢事的笨蛋，多几个坑蒙拐骗的赖债痞子，这从葡萄牙生活的大局来看，只不过是增添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细节。这个细节与其说是可悲，不如说是滑稽有趣。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偏偏在那些穷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国度里，出风头的狂热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处处弄虚作假。可怕就可怕在这里！生产者的弄虚作假我暂且不去管它了，例如他们伪造艺术家具，把佛兰德斯松木加上十六、七世纪乌檀木细工的切纹。又例如他们伪造锦缎，用棉毛和黄麻模仿有坐垫的家具和华丽挂帘的名贵织物的花纹。又例如他们伪造金银工艺制品，用镍银来模仿圣日耳曼的餐具、“王后陛下”的金银匠舍雷和儒贝尔的刀叉勺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让消费者能拿一些奢侈生

活的外表来蒙骗我们。而如果真的要过这样的奢侈生活，他们的钱其实是不够的，而且他们的教养也到不了这个水平。我只想谈一下审美品味上的弄虚作假，是这种讲排场摆阔气而又囊中羞涩的狂热给产业主带来的美学上的共济失调。由于这种共济失调，在庸俗人的住宅中产生了拿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来装点门面的风气，在我国萨塞蒂别墅就是一个典型的特里阿农殿。

在真正的宫殿里，高雅情趣是由严肃的装饰品、风格纯真的家具、真迹的名画构成的。这些东西给人以高贵与美的启迪，同这些东西接触久了，受其熏陶，就产生出见过世面的这一智慧与风雅的作品。直到今天，欧洲还展示出这样的人的一些典范。但是，这种高雅情趣一旦卑微化成为模仿的抄本，一旦将厅堂的支柱、回廊的环境、物件的原料、整体的简朴理智性全都加以缩微，这一下子就会流于儿戏，一切都成了硬纸壳做的假布景，成了一堆乱七八糟上了色的破烂，成了通过走私的美趣把瞳孔的欣赏力加以禁锢的陷井，使得人们的心灵失去了对健康艺术品的兴趣。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巴雷拉所模仿的一张哥特式椅子的那种由一个虚伪的凡夫俗子来鼓吹的及时行乐主义！这件小玩意儿，它的那种孤零零的、琐碎的、做工未完的气势，正是现代人在其道路上碰到的犹豫与无可奈何的一种

写照。它阉割了现代人，使他无法在紧张有力的人生中施展自己雄性的性能力。由于这些阴森森的形式、这些色彩混浊不堪而又精心加工的微型宇宙不断地大举侵入现代的房舍，从厨房直到睡床，室内的生活不再是室外紧张刺激之后提供一点安宁的来源，而是将那些使人们骨髓失调的紧张心情继续延长下来，使男人不断女性化，直到将他的体力与智力正式消灭为止。

这样，家就变成了一处不能放心的地方，类似私藏情妇的香闺，又类似庄严肃穆的耶稣会祈祷室。什么明智的思想、冷靜的推理、雄性的机能、正直的趋向，都是不可能的！卧室里的空气弥漫着脂粉香，处处都是网纱和软绵绵的床垫，床上方的帐顶是一幅春宫画，所有桌椅家具都迫使人作出不合自然的姿势。在这样的卧室里，不可能培育出纯真的爱情，不可能孕育出茁壮的孩子，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嫖娼和淫乐的地方。在书斋里，打碎的茶杯同日本的妖怪人形混放在一起，鹅毛扇子放在学术奖状、女演员像挂在旧剑之上。像胶冻似的彩色玻璃挡住了射进书斋的阳光，书斋到处挂着帘子和挂毯，还有假造的兽皮、假造的佛像、用神甫十字襟和洒圣水道袍的背部铺面的安乐椅。这样的书斋并没有把阅读的问题作结晶学式的理解，并没有使心里所想的灌注到流畅干脆的笔尖上，并

没有充当一个容纳人的心灵禅房来抵御人类愚昧的滚滚洪流。而恰恰相反，它成了一个做噩梦的场所，一个使人想到告密检举的小室，令人想到要在里面懒洋洋地吃暖和的美餐，而且也以自己不断施加的麻木不仁的影响使神圣的三钟经无限期地泯灭。

每6个专业搜集破烂货的人中，只有一个是健康的，其余的不是消化不良，就是脾气暴躁，或是受到了阉割。

奶瓶的狂热，往往是一个种族要灭亡的征兆，是人要发狂的第一个警讯。夏尔戈博士^① 就曾经说过：

“萨尔培特里埃尔医院^② 里挤满了从前的收藏家。”

① 夏尔戈 (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

② 萨尔培特里埃尔医院是巴黎的一所医院，原为路易十三建造的一座炸药厂，后改建。

猫



第三卷

葡萄牙社会批判

(1890年8月31日)

那些因人生变故而自杀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因愚蠢而自杀的名字。在葡萄牙最难办的事，最不幸的事，就是几乎所有不幸者命中注定都是愚蠢者。在昔日，当一个人的心脏仍然由于某个崇高的理想而跳动着时，只能有三四个有力的理由能促使他自愿地离开人世。而这些理由很少有机

会触及可怜虫的幸福，因此，也就很少会出现听到一个失败者砰然一枪打碎自己脑壳而不得不应声转过头来看看的情况。

现在呢，在生活里中间派的地位已经完结了，大胆妄为的人和温和耐心的人之间的中庸之道，在为了衣食而斗争的人们当中已经不占多数地位了。人们分成了两个巨大的善于推理的蚁山，一边是胜利者，他们假装出一副对共同的权利加以尊重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同那些食肉巨兽一样，只是依照暴力的法则过日子；另一边则是失败者，他们是劣等民族，是供前一类人来吞噬宰割的。由于社会的化学规律是不容许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这一群人也就逐渐分化瓦解，经过大城市的大屠杀而日渐稀少，一直到正如美洲的某些印第安人那样消失在死亡世界的隐蔽处，日后会有某个动物园派人去猎取一些最为动人的标本。

吸收律使小国在政治上围着大国打转转，使贫血的民族成为那些生气勃勃、武装精良的民族自私利益的牺牲品。这样的一条吸收律只不过是一些同样残酷特例的扩大化而已，这些特例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富有的老板可以剥削穷工人，议员可以欺骗善良的乡下选民，大官可以叫小文书替他写文章而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神甫可以靠丧礼发财，当将军的可以将全靠

士兵英勇作战而赢得的胜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在这种奖励与命运的不公当中，强者的胜利使他们的胆量加升百倍，而失败者的胆怯又使得他们显得更为卑琐萎靡。有一些证据最能说明这些人最后毁灭的下场，那就是酒类的销售额、疯人和心脏病人的医院统计数字、猝死的案例、卖淫状况以及贫穷生活状况^①一年猛增十倍。——这些现象都是一些灭亡天使造成的。他们将我们轻轻一提，就又把我們扔回到我们所出生的粪堆里去。

由于手头没有材料来以科学的严格性刻画外省各地这一弱者与强者之间、胆怯者与大胆者之间的斗争经过（这一斗争在外省肯定也是同在里斯本一样进行着的，当然其前因后果的强度和性质各有不同），我这篇论文的研究只限于专门谈首都的情况。在首都，由

① 据 1888 年的统计，我国大陆常规警察机构的各市镇拘留所曾拘留酗酒者 382426 人。单单首都一地，由民警扣留同市政警卫队扣留的就有 6340 人。在里斯本，新开设酒吧的营业执照申请在 1889 年就增至 637 件。在里斯本区，自杀案约为 390 件（包括自杀未遂与自杀身亡的），比上一年多出了 216 件。已知的猝死事件，在里斯本和波尔图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就增至 3472 件之多。妓女在册登记的共 6014 个，比 1887 年多出 1118 个。这个数字当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普通老百姓，如女佣、女缝衣工、女烟草工、小职员的女儿，还有 854 人来自奥瓦尔。总之，这些人来自里斯本贫民当中最正当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反之，首都虽然酗酒者这样多，死人这样多，淫棍这样多，妓女这样多，但是工伤事故登记了的却只有 146 起！

于外省每天流入的人口很多，可以说今天已经成了全国生活的一个凝聚点。不必细说，这些外来人口之多是有目共睹的。公路和铁路带到外省去的文明开发热潮，所遇到的老百姓却正处于绝望的贫困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葡萄牙全国各地的农业已处于绝对的衰败状态，但是这一股文化开发热潮又使这些往日一向死抱乡土传统与原始生活理想的天真家庭产生出一些他们的腰包所负担不起、他们的田产所无法提供充足费用的需要。

最富的人家就将田地交给雇来的人管理，自己到里斯本来倾家荡产购置马车，进行金融投机，搞财团，搞政治阴谋。小康的人家在热情已冷却、将产业主子弟束缚在祖辈藉以发迹的庄园上的发财欲系带已断裂之后，也就让他们的继承人另辟蹊径，去从事科学生涯和钻营官职，结果使他们成了愁容满面的学者、成问题的政客、懒散而又低劣的野心家。最后，那些下层的只能靠前两类人为生，他们为饥饿所驱使，看到自己的葡萄园患了根瘤芽虫病，自己的林木枯萎，自己的橄榄树患锈病，当地的工业又销路不畅，当地的村庄破落成废墟，他们于是也就溃散四方。那些胆子小的，就到城市来充当佣人和城市工程中的木匠。那些野心勃勃的，就把祖居彻底清理拔根，弃国出走，前

往巴西和赤道的那些欣欣向荣的共和国去。

所以，10 年以来在首都看到的扩展，与其说是由于财富增长，不如说是由于那些对躲在自己的偏僻小村里苟延残喘感到厌倦、晕头转向而流入城市的人们的位置转移。

里斯本是一个正在以三四十个城市的多余财富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城市，它是一个靠四五千个乡间业主由于疏忽大意而将其地产抵押掉，从而把它装点起来的名利场。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托了巴西的福，直到今天，巴西仍是唯一繁荣昌盛的葡萄牙殖民地。它对我们只有给与，而不索取，每年使我们得益三四万康托。这个昔日（直到 30 年前）有穷苦的葡萄牙移民前去以自己正当的辛勤劳动变成有爵位的百万富豪而归的巴西，也没有把这些起了建设性作用的开拓者们挽留在那里那些灯红酒绿的都市里，也没有把他们的财富吞噬在政府用不公平的特权和利息担保来助长的投机倒把活动之中，而是将这些天真而思乡的人送回自己的原籍。在那里，他们应该对农业给予关怀、爱护和奉献。对于北方和南方的许多田野来说，他们曾经是昔日的修道士们的接班人，是秩序和公共繁荣、进步以及各市政厅、各银行、各教区的维护者！

只要读一下里斯本有待兴建的数百座大建筑的登

记册，就可以看到，一半以上是属于巴西人的。但反过来，没有任何人试图在外省重新振兴葡萄种植业，没有任何人尝试引种新的作物，没有任何企业从事开垦或改造荒地，没有任何一个大的成衣厂或示范农场吸引过这些人把钱拿到那里投资。

我们首都把我前面提到的这一大批涌进来的享乐者和穷困者安置在自己的城区是可以得到很大好处的。这些人，正如我在前面讲过的，大多数都从自己家乡带来了无条件的敬业尽职精神、遵守秩序的风尚、节俭度日的心态、一板一眼的习惯和浓厚的家庭观念，这在外省几乎是人人如此的。而里斯本自己，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所有首都当中最吊儿郎当、最脏乱不堪、最矫揉造作的。这些人从自己的家乡搬到了特茹河畔这块四方杂处的地方。刚搬来时，他们像看见万花筒一样眼花撩乱，然后呢，他们的心胸受到了损害，染上里斯本生活的一切弊病和一切污秽，使他们背离原先淳朴的生活方式，陷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臭水沟里。到最后大功告成时，那些有钱的经过里斯本化，变成了花花公子，那些穷人经过里斯本化，变成了流浪汉。这一下子，无论他们属哪一种，原先从家乡带来的仅有一丁点儿好的东西，也就荡然无存了。

阐明了这些前提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前

面所讲的那场种族之战，是在里斯本居民哪些阶层之间进行的。显然，这场战争的依据既然是新旧生活的因素之间的对抗，那么，每当这些因素相互碰撞的时候，斗争就一定爆发。旧的因素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传统，新的因素要以不择手段的大胆举动来夺取阵地。在贵族阶级中，在政界中，在官场中，在商界中，在实业界中，在老百姓中，只要两大对抗集团狭路相逢，冲突就不可避免，争斗就是必然之事。不是在社会阶梯上爬上去，就是掉下来，战争双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一方面，一批人对那个由于我找不到合适名词只能不大确切地称之为旧制度的事物加以坚决捍卫。就这些人们而言，他们所坚持的一套就是：无条件固守已成的事物、盲目尊重法律、对出身门第与获选为天之骄子的权利引以为荣、办事慢吞吞但要稳健、目光短浅但要可靠、对冒险敬而远之、政治上抱权威主义的理想、敬重慢慢取得的财富，而且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深信我国是一块父子相传的大肥肉，不能同后来居上的暴发户分享。这一大套主张，冒险家集团不择任何手段，不分任何战场全都加以否定。战斗的这一方本来就没有什么既得的利益需要保卫，而一旦获胜就可赢得一切，因此，他们的战士们打起仗来就同雇佣兵一样卖命，对一切都不

加理会，唯一关心的就是战争结束后的掠夺权。他们宣称，事物如果像一潭死水那样一成不变，就会使人变坏，唯有经过猛烈的社会革新，各国才能走向真正有价值的、胜利的明天。葡萄牙民族的这个熟透了的果实，它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正在进行的利益与主张之争就是这么一回事，而里斯本则历历在目地提供了葡萄牙民族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各式标本。

先谈贵族吧，真正的贵族，只有一打或一打半的家庭，王室就是从这些家庭中募得自己的家族成员的。这批贵族几乎不从外界取得任何财物，不夺取他人任何财物，只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如果富有，例如弗隆特拉家族或是帕尔梅拉家族，就对凡是带有嫁接或仓储的贵族气味的事物一概加以排斥。而如果贫穷，就幽闭在某个人所不知的角落，一辈子都设法躲避丢脸的类比和世俗的污染，教育子弟去当陆军军官，教育女儿去当慈善团体的修女，就同昔日一样。这是一个界限森严的阶级，从内部看来多少有点庸俗，但是仍然高高在上，睥睨一切，凭这股骄气来抵御对立面即百万富翁式的贵族、暴发贵族的狂暴围攻。尽管这家或那家由于缺衣少食而不得不举手投降，但就整个贵族阶级而言，它直到如今仍然能摆出某种宫廷的、体面的外表。有一个人人都知晓的故事，一位叫阿姆

斯脱朗的，在那位老佩纳尔瓦面前翻阅一本族系谱，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回答。

“侯爵大人，您能否告诉我，在这本书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夫人的祖先吗？”

“您夫人的祖先……唔，唔……是呀，她一定是有祖先的呀，您的夫人……。那么，您在第二册里面找找吧。”

“不过我听说这书只有一册！”

“就是嘛，就是嘛！”

另外还有一批长了舌苔的贵族，这些贵族死抱着高贵的血统不放。这血统即使由于通婚而不纯但也由于举止上坚守不渝而保持下来。这些贵族就是嫁给了店主儿子的贵族姑娘，这些店主们是一批没有祖国的狡狴之徒。他们拿到了表示曾为国王和政府效劳的爵位，在那些出钱接济他们的证券投机商的盘剥面前，可以装点一下自己的门面。这些愚笨的业主们看见大马路就恨不得挖地三尺，他们以为，在自己的姓氏前冠以“仔（子）爵”或“南（男）爵”头衔之日，手上的胼胝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些贵族是一批不三不四的愚人，爱虚荣，讲面子，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不光彩的目的，就是抹掉自己的出身，随便弄一个头衔来将自己不大妥当的历史一笔勾销。有一

位这样得到爵位的人，在王恩浩荡封他为子爵的次日，我去拜访了他，当时我就听到他对仆人说：

“子爵大人要吃午饭了，在子爵大人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子爵大人，就告诉他子爵大人不见客。”

“是的，吉马朗埃斯先生。”仆人回答说。

“什么吉马朗埃斯?! 起来，起来!”

雷斯特约的一位实习药剂师问：

“啊，老板，卡达瓦尔公爵也同咱们一样开过药店吗?”

银行家受封爵位的时候，谁都没有忘记他的那位太太写给成衣店的便条：“朋友，今天下午务必前来为我量身做一件公爵夫人新衣……”

这两种不同的贵族，彼此是相互憎恶的。正牌贵族之所以憎恶对方，是由于瞧不起对方，而对方之所以憎恶他们，是由于妒忌他们。正牌贵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在道义上将冒牌贵族一军的机会。所以他们一贯拒绝同冒牌贵族们一起共同举办慈善活动，一贯拒绝让冒牌贵族们参加他们内部的雅集，一贯拒绝让他们插手宫廷的官职，一贯拒绝同他们一道到外地度假和到娱乐场所……凡是一个世袭的公爵夫人能够对一个临时当上的男爵夫人的贵妇身份进行冷嘲热讽的

地方，冲突肯定是要发生的。这场戏就是无法模仿的。

一个新受封爵位的家庭几年前嫁出了一个女儿，新郎是我国的布匹大商贾之一的儿子，新婚祝福礼在新郎家对面的一位有爵位者的宫殿里举行。这个人的夫人对仪式是这样评述的：“从他们家到我们的小礼拜堂走过来一个仆役，边走边摊开一条地毯，让婚礼行列踏着过来，后面又跟着另一个仆役，在人们走过后马上把地毯卷起来。啊！真好看，这地毯一直保持如新，甚至还可以拿到店里去出售呢……”

杂牌军所起的社会作用是如此有害，以至于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向他们关起大门，尽管杂牌军时不时也替他们出点力气并且硬闯进没有任何人会给他们一张圈内人椅子的沙龙里去。

有时候，杂牌军举办的欢聚会使得正牌贵族的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女儿尤其如此。他们尽管等级很高，但有时也免不了眼红吃醋，打个寒噤。对出风头的聚会采访记者们在香槟酒喝得醉醺醺之余一五一十加以刻画描绘，而聚会的不明言的目的，又往往把它本来可能具有的一点点优雅风味也盖过了。聚会的最后一盏灯的灯光熄灭后，留下的只是一股隐隐约约的市井臭气和公共舞会臭气、某件新的奸诈行为的曝光和某门大操大办的婚事的宣告。

这一类投机分子和暴发户为了在高雅的沙龙中争得一席之地而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是一件十分复杂又十分严酷的事，进行得十分有耐心又十分巧妙。就单单拿这个斗争中进行的谈判来说，就可以写一整本书，从而证明，对于某些富人来说，斗争比对于某些穷人更加残酷。为了赢得这种日夜盼望但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的圈内人身份，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义卖啦、孤儿医院啦、圣诞树啦、修道院内的游行啦、慈善事业和全国认捐啦、划船比赛和射鸽比赛……——而且，每当有6个蓝色血液的贵族夫人走出一步，从事某件好事，马上就有另外600个脚后跟皴裂的夫人赶上来，慷慨解囊，不惜让自己丈夫开的银行破产倒闭。他们一心一意要能够从侯爵夫人或是公爵夫人那里弄到一张茶会的请柬，可以炫耀一番。从前，王后曾在贝伦召集一些最亲近的贵妇人，于是，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脸上沾满面包渣的男男女女托人走后门，要求参加进来——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走后门不是着眼于受王后接见的荣誉，而是要把这个荣誉当作一个撬锁器，好撬开某个仍然对他们无情地栓得严严实实的门。

如果将葡萄牙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这场游击战一五一十地从头到尾叙述一番，那就是一种极为令人厌

烦的大事记罗列。这场游击战，无论是在上层阶级当中打，或是在下层阶级当中打，其远因都总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则冲突，而其近因则总是我谈到贵族家庭时举出的那些妒意与利害关系在作怪。这个斗争已经是有目共睹，所以我就不一一细述了。如果有谁想看看这场斗争如何进行，例如在政坛上如何进行，他就不妨问一问萨·达·邦德拉时期的那些老议员，问他们对纳瓦罗先生的劲头和洛波·瓦什先生耍的耶稣会式的手腕有何看法。如果有谁想看看这场斗争在军队中是如何进行的，他就不妨请教一下杜瓦尔·特勒斯先生，问问他若泽·保利诺先生的军事素质如何。如果有谁想看看这场斗争在学术界是如何进行的，他就不妨请若泽·儒利奥先生说说他对洛伦索博士有什么看法。如果有谁想看看这场斗争在上层资本家当中是如何进行的，他就不妨同塞伊沙斯先生谈一谈布尔奈先生发迹的经过。总之，凡是有两个人相互对峙的地方，都突出了新与旧之间、昨天与明天之间的对抗，而经过这么多的折腾之后，得胜者是否就能确定未来葡萄牙的性质，就能保证葡萄牙社会独立地存在而不受周围的一波三折和悲观主义所左右，是说不准的。不过，这场战斗也许是有益处的，因为参战的士兵在血统上是先天软弱的，或者是由于教育之过而软弱的。他

们从未经过战斗的洗礼，现在他们上了刺刀，背着背包，向前冲，要冲过第一道斜坡，而如果他们有一半在没有冲过第一道斜坡的时候就垮下来，那么，顽强的精力就会得到更新。他们仿佛人人生下来都命中注定要当王子似的，这些毫无武装的人，一碰到最轻微的挫折都会失望幻灭，从急行军中开小差，而去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运气。本来气候条件就使得他们好逸恶劳，再加以历史传统又使他们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宿命论态度，而且葡萄牙自从若奥四世以来一直处于依赖外国、乞讨度日的境地，这又使得他们在体力上也懦弱无能。就这一点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自动机械人比我国更多的了。个人有什么创造性，都是同我们的惰性格格不入的，任何略为进取的意愿，都会使我们感到害怕。这就产生两个严重的恶果。第一，我们抱着盼望塞巴斯蒂昂国王回归的种族劣根性，一辈子都在等待着这个神秘的佑护者。仿佛在某个朝雾弥漫的早晨，这个佑护者就会出现，给我们摆桌开饭，替我们安排就业，给我们的居室布置好家具，替我们安排一门带来大笔家财的亲事。但这个佑护者却一直不来，于是，我们就坐待着而不去靠自己实实在在的、健康卫生的劳动来谋生。第二，我们经常能够忍受一个靠突然袭击的手法爬到了最高位置的大胆下等人物给

我们套上的枷锁。他一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就肆意鞭挞我们这一群卑微的群氓。这两个恶果贯串了我们全部贫弱的、对内对外的一切屈辱历史，而且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使我们朝着那可怕的一天靠近。到那时，我们的前途和家园都要彻底从属于随便哪个想把我们吞掉的强国。

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自暴自弃，无论是国家的或是个人的，都是由于愚昧懒惰，由于一团糟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公民自尊心的缺乏造成的。我们吃亏之处，不是在于资源彻底枯竭而陷于贫困，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吊儿郎当。这是由于力量用错了方向，由于偏爱与能力都运用不当。我们人口的大多数，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时就向诸位谈过的这类中间式的、坐待的、消极的人物组成的。强者蹂躏他们，把他们捆绑到自己的车上，他们在当代节奏紧张的生活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结果就是：在上面，这个国家成了10到12个同另外10到12个匪徒合伙的骗子手的禁脔，彼此交换着种种见不得人的丑事和舞弊行为，靠这个在船的后甲板上多盘踞上几个月。而在下面，则是散漫的群众，多病、肮脏、软弱无力、看破一切蔑视一切，像醉汉一样互相对骂，像狗一样挨鞭子，受到侮辱欺侮却无动于衷，最后倒在自己呕吐出的东西上面昏睡过

去，直到新的一鞭子打下来，又重新痛苦挣扎！

黑人在人种学上的低劣性，加上英国人只当作擦皮鞋者加以利用的开罗阿拉伯人的肮脏，就可以得出我国当代居民的共同类型。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本质，已经不是一件会思想的机器，而只是一件自动的劳动工具。是教育造成的吗？也许是的。但是，主要是消亡中的种族那种特殊的齟齬症。这一点，9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是那些替若奥六世推车的流氓们的子弟。对于这些流氓，彼得罗四世在英国《大会号》舰上，在一群称他为“葡萄牙狗”的英国醉汉的簇拥中，在“大不列颠统治永久”的乐曲声中，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你们别逼我拿棍棒来解放你们。”

在这个已经被病菌侵蚀到骨髓的民族垂死挣扎当中，偶然也有健康的时刻来临，廓清公众的昏迷。于是就可以看到大批人离乡背井，与其说是由于饥饿，不如说是由于厌倦！他们要求归化到外国去，他们不要那面已经不是任何荣誉的象征而成了耻辱的殒尸布的国旗。在城市里，那群一无所有的群氓，一时受良心的谴责而扪心自问，昙花一现地作出了过新生活的表示。但对这样的新生活他们已经没有信仰，没有幻想，没有诚意，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让欧洲把自己当作笑柄，我们成了欧洲的梅毒和茅坑。就是从这些短暂

的间歇中，统计数字就统计出了 38 万名流浪醉汉、2 万宗随地大小便的神经错乱病例、400 宗由于失恋与鞋子破了而自寻短见、打碎了自己头盖骨的事件以及 6000 宗卖淫案，卖淫的姑娘大多来自昔日的劳动阶级。

所以，今天的自救之道不应表现为“但愿我们能摆脱英国人！”这个呼声，而应表现为另一个呼声，即“但愿我们能摆脱我们自己！”

猫



葡萄牙在非洲的被掠夺

(1890年9月9日)

8月20日，在萨尔斯伯里爵士的目光下，在对我国连一点表面上的、空虚的面子也不给的情况下，由两个白痴签署了英葡条约。随着条约的签署，各大国终于实现了一个从本世纪之初就由它们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理想——以古老先生的人工伪造的金碧辉煌来摧毁黑人简单的原始性，以文明为名对非洲从一端到另一端进行耕犁。因为欧洲的饥民留在欧洲可能扰乱富人们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且欧洲的生产过剩，在地球的其余陆地上已经开始滞销。而非洲呢，是一块野兽出没的神秘隐藏之地，就在欧洲的大门口。四个世纪以来，除

了我们自己，再也没有别的大胆好奇者得其门而入。而当别的大陆已经被扩张的列强彻底殖民化而大兴土木之时，非洲大陆却单单做到了对这些列强的贪欲加以美化。过去在世界其它地方，都还有一些大陆可以在那里奠下雇佣文明的基石，可以利用那里的土地种出谷物来养活自私的欧洲，可以利用那里森林的木材来替欧洲造船，可以从那里的矿井开采出造币的黄金，可以在那里的港口建立城市，可以把那里的土著种族消灭并且施加高等人种的顽强而残酷的白人统治。所以当时非洲对现代航海民族的人侵是殒以闭门羹的，但是到了后来，科学改变了这些民族的判断依据，也就是说，打碎了本来笼罩着这片无边无际大地的传奇式的恐惧感，使这片大地作为最后一个粮仓和最后一个营地呈献到他们面前。拿破仑·波拿巴对埃及的远征，衍生出了后来对阿比西尼亚、西苏丹与南苏丹的探险，以及后来的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英国以彻底消灭卡夫雷与霍顿托特两个土著种族为代价而完成了对好望角的占领（1815年）。法国使数百万原先占有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丧生后对阿尔及利亚完成了征服（1830年），法国对塞内冈比亚进行探险，英国在几内亚湾多次采取殖民的企图（在那里，传教士赛克尔从1858年起就在喀麦隆的火山麓建立了维多利亚站），德国自

1851年起在汉堡的某些商站协助下在阿达马瓦^①省和贝努埃河^②沿岸进行了殖民的企图，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列强最早的一些瓜分非洲的企图（当然，我没有提到葡萄牙的占领，这个占领不但是年代久远和以地理发现为根据，而且使得欧洲能接踵而至夺取新猎物）。这些企图几乎全都限于沿海地区，即使进入内陆，也是零敲碎打，四面都是敌意的环境，四面都是敌意的居民。但我们呢，却早已在非洲全境生活和繁殖了，我们的黑奴贩子和腹地居民正在非洲内陆使葡萄牙语变成为从这边海岸到那边海岸的一种通用语言，不必害怕遭到杀害或陷入沼泽。

直到近40年期间，由于传教士和商人宣扬了非洲这片黑土地的内陆是如何富饶，那些受到人所共知的财政危机打击的欧洲商贾们，才想到要向非洲内陆派出科学人员并且有条不紊地推出了对非洲内陆正式进行生产性开发的大纲。这些探险队中，什么都有一点点：传教士走在前头，给病人治病，送给姑娘们一些玻璃珠项链。接踵而来的是来研究道路的工程师，是察看土壤的地质师，是采集植物标本的植物学家，是

① 阿达马瓦是苏丹的一个地区，在乍得之南。

② 贝努埃河是流经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一条河。

向土著们宣传一些新物品的必要性并且对未来市场进行研究的销售代理人。最后前来的是政治特使，他到来的时候，发现当地的酋长已经酩酊大醉，当地的妇女已经十分满意，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全都缠上了新的腰布，于是就设法让这些可怜虫们接受那个把他派来的国家的无条件监护权。

但是，正如对于非洲的沿海地区我们曾是最早的主人，他们要占据沿海就只好把我们撵走一样，那些后来又想深入内陆去的人们，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每走一步都同我们相遇。他们或者接受葡萄牙方面的热情款待和带路，或者跟随着我们腹地居民的马帮前进，在我国的国旗下穿越最为凶猛的土邦，通过操我国语言的传译去打消酋长们的疑虑。无论他们走得多么遥远，无论他们在指示盘上采取哪一条半径，所到之处总是遇见我国城堡的遗迹、我国教堂的遗迹、我国国人的村落、我国的占地标志——到处都是我国的风尚、我国的语言、我国的古老面貌和我国国人的冒险犯难精神！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些高傲的冒险家心目中，我国历史的欧洲痕迹像是向他们挥手告别，叫他们进去吧，吃吧，放心继续行程吧。但是，一等到最初的痛苦克服了，恐惧感消失了之后，我们在道义上的伟大性，这件唯一受到非洲野蛮人顶礼膜拜的神

物，就变成某种令人憎恶的狂热，变成使人又妒又恨的酵母，使他们气急败坏，使他们渐渐翻脸不认人，同我们作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个混帐而又走运的斯丹利^①，一开始时谈到我们就大加赞扬，但是后来又把我们看作是一个由黑奴贩子和放荡的野蛮人组成的民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喀麦隆^②、布拉扎^③、甚至利文斯通^④等人在享用我国殖民影响果实的时候对我们是多么亲切，但一等到他们靠我国海外当局的那种近乎卑躬屈膝的善意而弄到了有助于进行一场拆我们台的进军的有利条件，就马上翻脸，像狼狗一样咬我们了。尤其是对英国人而言，这些事是很刺激他们的虚荣心的，因为我们是使他们一直理亏心虚的活见证，是南方的另一个自从阿丰索五世以来一直使他们不得安宁的爱尔兰，因为我们经过四个世纪的受骗上当、误信坏人、遭人暗算之后，现在如此破落，都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

很久以来，他们的海盗就尾随我们的大帆船，攫取我们发现的土地，而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守卫这些土

① 斯丹利 (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

② 喀麦隆 (1844—189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

③ 布拉扎，法国的非洲探险家。

④ 利文斯通 (1813—1873)，苏格兰传教士与探险家。

地，他们就常常来侵犯。我们的炮弹把伊利莎白女王奉为正式收入项目的英国海盗行径赶出了海岸之外，但是，英国强盗却派人在海上埋伏等待我们，把我们从印度开来的大帆船击沉，并且公开炫耀这些卑鄙行径，得意洋洋，仿佛是在庆祝什么光彩的事似^①的。有

① “……在伟大的伊利莎白的官方保护下，海盗得到了加强，海盗行为得到了合法化。当葡萄牙巨人在1580年颓然垮台，在西班牙手中元气大伤、体无完肤的时候，我国商业与航海业中的狩猎与饲养就猛然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这样，来自印度的大帆船覆没了，同它们一起覆没的还有东方的财宝和到东方航行的知识，这些全都落到了费纳、福斯特、维东、德拉克、伯尔德、牛顿、昆伯兰、格伦威尔、弗利克、弗罗比歇、霍华德等等之流的手中，他们自1581年至1591年间，将葡萄牙的船队埋葬在汪洋大海之中。林绍顿说，单单在1589年一年当中，200多艘驶回葡萄牙或西班牙的船只中，只有十四五艘逃脱了汹涌的海浪或是敌人的武力……。这种对抗，虽然一方面对他们起了延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起了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作用。因为这些障碍，固然使英国人不能顾及印度，但他们得到了绰绰有余的补偿，那就是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的财富。这个好处是多么的实惠，利润是多么的有把握，所以即使由英国人自己来选择，有个英国作家（哈克路依特）也说过，他们还是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在印度兴办事业的好处，只要他们能保持另一个那就是能够对葡萄牙船只进行掠夺，掠夺得到的收益，超过了一切商业利润。

他们一直继续掠夺着我们，直到1595年。在这一年，荷兰参加了竞争，派出了约翰斯·德·莫伦纳尔的舰队到东方去，也许就是这件事使得伊利莎白女王下决心派出英国船只到中国去。同时，他们派遣了并且保持了一些十分狡猾的间谍。这些人又一次随同葡萄牙船只出发，以探听我国的虚实以及海洋的情况……”（卡洛斯·德·梅洛先生所著《英国人在南部非洲》，第8页）。

些因素同那些现在正为我们挖坟墓的因素相类似。由于这些因素，宗主国被削弱了，独立在1640年消亡了。英国人就发现我们的大片殖民帝国正在恭候他们光临，于是他们就登堂入室了，就同他们对那些直到现在仍未能逃脱他们报复的地区一样做法。无论在印度或是美洲，在大洋洲或是非洲，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全都在于窥探我们的足迹，把我们经营好的家园据为己有。当他们看见我们虚弱得不得了的时候，就假仁假义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正如一个本来不合格的继承人在估量一个百万富翁垂死喘息时的做法一样。所以，我们就以为他们在保护着我们，在保护着1640年光复的这件大蠢事。我们的做法就是第二次错失摆脱他人而自强的良机，永远落入他们的信天翁似的爪子里，接受折磨，每天都在他们面前割开自己的动脉，让他们喝饱喝足供他们作为营养的外国血液。当时也好，现在也好，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从来都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冷笑式的鄙视和拦路剪径的山匪对旅客的屠杀讹诈。这些可恶的英国流氓，总是抱着同我们保持亲切友好关系的愿望，把刀子对准我们的胸膛。他们总是为了作出一种老盟友的亲热表示而作出决定，要每年从我们这里夺走一块殖民地。他们满面笑容地恫嚇我们，他们边挖我们的墙脚，边摆出一副似

乎我们反而应该感恩不尽的神气。

对于非洲，我们已经不是主人，而是我们政治上的一片属土。这个非洲，我们曾从海路绕行过，发现过，穿透过，占领过，开化过。这个非洲，400年来都是我们的，但又成了现代欧洲的一个殖民美梦，到了要对这个非洲进行最终瓜分的时候，围着地图坐着的所有各海洋国家，都肆意按照自己的所谓开发能力的大小而分割出自己的一份统治权——无论是意大利或是法兰西，无论是比利时或是德意志——而它们几乎都是靠从我们身上挖去领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地！而葡萄牙呢，只是看在同那个保护它的强盗的3世纪友谊份上，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这些野兽的大嚼，同意拍卖自己的历史财产，把自己手上仅剩下的一点点东西奉献出来，献给一个奴役制度，而对于这个制度，甚至黑人也是愤然加以拒绝的！

猫



采访记者是报纸的驮畜

采访记者是什么人？是报纸的外勤帐房，是事件的接收器与传送器，唯一的使命就是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打听事件经过，并且把事件经过送到编辑部面前以供评判。

由于这个差事是低级的，而且采访记者从我们当中分出来所属的类别十分模糊和不全面，所以人们一般都假定，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的水平是不超过中等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都不能自诩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洞察力。因为咱们要在一点上达成共识：葡萄牙的采访记者同境外新闻界的采访记者并不是维妙维肖地一致的。葡萄牙的采访记者是从那些被学校所淘汰的不三不四者以及

那些不愿从事费力的普通职业的废物们当中来的。他不是个文学家，另一方面，他也未受过能使他对眼前发生的事件进行一针见血的评论的教育。他是个蹩脚的文人，缺乏说教者素质的笔杆子。新闻界谁都不觉得他的角色有多大的责任，因此，他在新闻界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享受到某些他所滥用的豁免权，并使他在职业上能以某些越轨的举动而自以为荣。他干得多但挣得少，这一事实使得报馆好像有负于他，不得不容忍他胡说八道，乱说乱动。一心管政治的主编，很少把采访记者写的东西浏览一遍。顶头上司们则各自管自己的专业，把自己本来应尽的职责转嫁到采访记者身上。于是，到头来办报的就是采访记者了，他成了收拾局面的主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可缺少的，报馆无法给他多少个英镑，于是他就要求在言论上放宽尺度作为补偿。所以，除了某些栏目之外，报上其余的部分都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语无伦次的话语、谎言、下流话和诽谤。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要做的事就是不问三七二十一非凑齐数目不可嘛。

例如在某一天，治安专栏显得十分单薄：只有7宗因酗酒而发生的拘捕事件和3宗持刀伤人事件！本来有责任提供火警消息的消防队没有露面。马路上没有出事。军队没有出来。社交消息的报导员没有送来有

关舞会和婚礼的消息。没有人被杀。没有已婚的妇女在同情夫通奸的时候被捉奸……。这太糟糕了！但最糟的是，订户是迫不及待的，他们要看到丑闻，要看到熟悉的姓名，要新鲜的刺激。每到这样的時候，都是由采访记者来打圆场。

例如，治安栏里面说：“某甲（全名、住址、身份、子女数及职业）因酗酒闹事于晚上7时在新帕尔马大街被拘捕。他被押往派出所时曾拒捕，等等，等等。”

我们要承认，要使一个并不在意的读者得到消遣，这样一条从刑警记录中摘引出来的简短新闻也就够了，大可以删去被捕者的姓名和住址，因为刊登了姓名和住址，对这件事件增添不了任何东西，反而会使一个家庭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对于采访记者来说，这样一条简短的治安消息是满足不了他抢新闻的狂热的。他要更富戏剧性的东西、更富典型性的东西。他认为，如果不从这个贫乏的街头事件叙述中弄出3栏充满夸张和捏造的大事件，他就会脸上无光。这一来，那个在闲暇时喝醉了酒的可怜工人就赫然上了头条新闻，标题是“狂怒的醉鬼”。采访记者查找了这个人的经历，就给他捏造出豪饮狂欢的习惯和酗酒的难移秉性，说什么他打老婆，说什么他不务正业，说什么他是个多次入狱者，然后就是拘捕的场面了：“我们的一

猫 □

些朋友告诉我们，某甲企图侵袭里斯本上层社会一位知名的贵妇，手中挥舞着一把弹簧刀。他是用这种刀的老手，于是第三派出所的第 198 号警员赶到现场，我们在这里可以透露一句，他干得十分得力。”

猫



人民的教育

(1890年9月24日)

几天前各报报导了两件对未成年女性施暴案件,并且补充说,这是本月以来本区当局得悉的同类案件的第六件。里斯本的报刊近来也描述并评论了一些同样性质的丑行——其中有一条消息说军械库大街的一个妇女拐带一些14岁的女孩到外地去进行可耻的卖淫活动。另一条消息说,有一个祖母把自己的孙女儿卖给了一个马车夫的老婆,这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在临时房屋中把女孩出售给一些淫虐狂的老头子去发泄其兽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葡萄牙这地方,50年前这类骇人听

闻的丑行是没有现在这样常见的。当时即使是一个坏人，还是保持我们这个民族的大丈夫傲气，纵欲荒淫也仍然局限于灯红酒绿的范围，很少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来。

现在这种恶性发展的狂热，要靠对尚未成熟的处女张口咬噬、靠对这些尚不知道性欲为何物的小女孩的天真烂漫加以侵犯（她们的美好童年本应被当作宇宙间最纯洁最神圣的事物之一而得到珍惜），使神经的疲劳得到缓解，这种狂热在从前对于人的诱惑是不如今天这样厉害的。

我们在性爱上竟然达到了这样邪恶的地步，究竟是由于多少个以及怎么样的暗中演变出来的恶因造成的呢？

是由于未老先衰，而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有遗传上的虚弱，也有学校与作坊中的不健康教育——这种未老先衰，使得我国城市的居民到30岁就成了残废人。由于缺乏健康的锻炼，缺乏卫生条件和文化教养，他们的体力就在环境恶化中耗尽，他们的神经系统受刺激而亢奋到了神经官能症的地步。生命行为的两极化被颠倒了，无论是内脏的机能或是性格的机能，无论是感觉或是感情，无论是智力行为或是意志行为。

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戴则生^①，他也许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是刚刚冒出来的，但作为个人来说，比起健全人、健康人的生理类型来说是绝对差了一大截的。不过，对于男人的衰老，还另外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因素，就是女人的早熟。

屈居在像我们旧城市那样的笼子式街区的人们，房子里没有阳光，一边是天井，一边是水沟，缺少水，空气污浊，没有任何清洁卫生设施，吃得很差，但床第之欢和劳动方面的要求却很高——于是就生出了幼苗。这些孩子刚刚离开摇篮，就似乎已经适宜于做手艺和干事情，而这在从前可以说是成年人所专有的事。不妨看看里斯本的顽童，他就是劳苦阶级子弟的典型；也不妨看看中学生，他就是我国中产阶级繁殖的标本。连最小的孩子，最天真烂漫的孩子，刚会说话，牙牙学语的孩子，有时嘴里也冒出一些集中了30多年的世故经验和狡狴的话语。

我看到他们（尤其是街上的孩子）冷淡的目光，我真的仿佛以为这是一些饱经沧桑，什么都见过，什么

① 戴则生是法国作家于斯芒（1848—1904）的小说《背道而驰》（1884年出版）中的主人公，一位公爵，是19世纪80年代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的典型。患贫血症、神经官能症等，与家人决裂，纵情享乐。结果弄坏了身体，隐居郊外。

都尝过，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觉得有什么新奇神秘之处的六十几岁老人的沉思和玩世不恭的目光。看着他们在马路上跑着，成群结队地闲逛，这些小小的靡菲斯特式人渣，对过路的卖菜妇女进行调戏，说出一些懂得了人事皮毛的小流氓才会说出的成年人的言语，或是到那些阴森森街区的店主门前，重复那些使某些店主十分讨厌的无耻陈词滥调。他们彼此的交谈中，既有猴子式的模仿，又有苦役犯似的粗言秽语。

他们在做出阴森森的丑脸当中开的玩笑，展示了他们那种喜剧式的、巧妙到挖苦地步的天性本能！他们的喜乐，并不表现在嘴上的健康笑容之中，因为他们的笑也是十分虚弱的。年仅12岁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就已经被痉挛的怒火所折磨着！而他们的怒气呢，是不经常的，是一阵一阵的，带有堕落者的偏执狂和食肉猛兽的蛮不讲理！

女孩子也是一样。她们还未开始成为儿童之前，大自然就使她们成了妇人。

她们或多或少几乎全都是一些吃奶的老妇人，没有自己的童年时代，没有天真烂漫的时代。规规矩矩，呆呆傻傻，但已经多疑而且会说人坏话，把听来的言语照抄，挖空心思去猜出她们所不懂的东西，以任性胡来代替感情激动，以歇斯底里狂热代替童年时代的

自由奔放，以对一个小丈夫的向往来代替对一个洋娃娃的向往，以同男人的交谈来代替在花园的砂路上同年纪相同的女孩子的纵情玩耍。她们还未开始成为儿童之前，大自然就使她们成了妇人。她们的一切，除了身高之外，全都符合未受良好教育、爱搔首弄姿、爱慕虚荣、轻浮、令人讨厌，在里斯本比比皆是的女人的模式。也就是女东家或是女烟草工人、木匠女儿或是资本家女儿……。她们交谈时，都是一样的俗里俗气得令人生厌地语无伦次、喋喋不休。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摆动腰肢，学“王太子剧院”那些女演员扮演公爵夫人的举止和那些唱“市长大人”的宫女情趣。都是一样焦急好奇地要同大人交往，从中汲取某些言词和某些意图中的毒汁——尤其是那么狂热地、那么渴望地要透过表面的言谈姿态……透过一个字眼、一个目光、一个细微的表情……去猜出某种猜疑人家向她们隐瞒着的、使她们心神不宁的尔虞我诈的含义——真是一些不自觉的心理变态的小姑娘！——所以，她们在年龄的增长上甚至一跳就跳过了几十岁，往往还未完全长齐牙齿之前就已经成了妇人。

无论她们是银行家的女儿或是工人的女儿，你真无法想象小小十二三岁就多么的烦扰人，手段是多么的狡狴、迷惑人，是多么的可恶。这些女孩有许多已

经懂得如何背着保姆和妈妈去勾引男人。在她们从父母先辈那里得来的病态血液中，蠕动着一些来历不明的蛆虫，在这样一种年龄危机中产生出最独特、最不可告人的乌七八糟的事情来。

她们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名门淑媛，中学里由于共同生活，都助长了这些反常性格的发展。穷人家的姑娘，年纪轻轻的几乎情窦未开就到作坊去或是成衣店去。在那里，工头们在打瞌睡，机器轰隆轰隆地响着。就在这同时，正在进行着一堂潜移默化的谈情说爱课，由一些经验丰富的女蜂王们向新进来的不懂事的年轻女孩子讲授。讲授的方式就是在耳边轻声细语，夹杂在笑声中，小小的接吻中、叹息中。这样的课，连一小块圣洁的、抖动着感情的尖翅也没有，因此，也就免不了流于淫秽。在我们这些南方国度里，美并没有坚固的骨骼卫护它，使它成为一种牢固可靠的东西。美只是由肌肉、由鲜艳的染料、由眼神的光芒、由透明柔软的皮肤构成的，因此，我们的女子很早就枯萎，一遇到第一次挫折、第一次害病，或是生下第一个孩子，就凋谢了。

对于她们来说，年青美貌被风沙侵蚀的时期，早在少年时代之初就开始了——这个时代也称为魔鬼之美时代，从人体解剖学角度来说，她们的性征还未显

现，但是从精神上说，她们的性征却已经大大发挥了，硬是拉着肉体去追求最初的一次春宵之乐。

这样，姑娘最深层的身心处于很不平衡的状态。

阶级机体的变质和社会环境的劣化，使她成为一个放浪形骸的荡妇，总是被坏榜样和引诱所吸引，一阵阵的狂热与饥渴，而同时，她终归是年纪轻轻，而且经父母遗传得来或是后天造成了体质上的虚弱，因而仍然保持儿童的胆怯与冷漠。在她身上，心灵像一把火炬一样燃着熊熊火焰，而肉体则像一片薄纱一样脆弱和柔软起伏。

在这样的時候，酿成火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再看看我前面所说的那些未老先衰的男人，他们没有自然的欲望，没有健康的身体，一直都有一个老是追求新奇刺激的坏习惯，又缺乏体力来恢复自己作为男人和繁殖者的角色。现在呢，又遇到这些浅绿色眼珠的、披发齐肩、嘴角带有哑谜似笑容的、双手虚弱无血色、胸乳细嫩、笑容不清不楚的奇怪迷人妖精，这些已经不天真烂漫了、匆匆忙忙要向着结婚年龄赶去的处女，会发生什么事也就可想而知了。

显然，军械库大街的那个无耻女人之所以不顾治安规章的严厉禁令，胆敢搜罗女孩到她的肉店去当作肉来出卖是有其原因的。假如这种细嫩的、粉白的、有

糖味的、有太阳光和奶瓶气味的肉没有销路，不会带来丰厚的油水，她就断不会这样干。

奥拉里亚斯的那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带着女孩子到爱神维纳斯的祭坛去，这是因为每天下午都有一个披着斗篷和头巾的老妇人带着圣殿鸨母伊藻拉或伊诺申西亚的字条约定同某个麻脸的姓卡斯特罗的男人或某个戴眼镜的姓皮门塔的男人幽会。假如没有这个老妇人带去字条，奥拉里亚斯的那个女人就会放弃这一套做法的。

现在有不少做母亲的让自己六七岁的女儿穿得花枝招展，到咖啡馆去卖彩票或是乞讨，装出一副使感情最冷漠的人也为之倒抽冷气的笑容。但是，如果她们不是贪心，不是一心想吸引里斯本那些好开玩笑的花花公子们拿5个托斯通的施舍来对这些走上邪路的羽毛未丰的小鸟投放诱饵，她们本来是不会让女儿到那儿去的。

这种现象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不合情理、超出了一般情欲生理发展的程序，因此，是无法归因于健康欲望的过分亢奋的，其原因只能是心智基础出了毛病，监狱也是纠正不了的。也许它是同其他的人类缺陷并驾齐驱地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种族在枯萎，失去

繁殖力，正如卡利古拉^①和提比略^②时代的罗马帝国那样去见鬼的那种“末日的开始”。改革者的一切努力，都必须退到远远的地方，而对这城市实行从头的改造，不是按照卖彩票的冯塞卡那样凭预感来对集体幸福进行研究的那种经验论，而是按照一个庞大的总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应该消除一切已经查明使葡萄牙家庭在体质上与精神上恶化的原因，并且以法律形式确立那些经过两个世纪业已为科学所明确的并且对促进这一幸福可能有所裨益的原则。

“这个计划是什么呀？”有些人会问。

这个计划就让专家们去论证，去起草，去提出，去讨论吧。依据有的是。诸位请看，将里斯本所赖以居住、呼吸、工作与受苦的整个体系架构来一番彻底的改造，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吗？从一切方面说来，这个架构难道不是一件最令人窒息、最为害不浅的东西吗？

在欧洲那些最先进的国家，人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一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设法使得

① 卡利古拉（公元12—41），罗马皇帝（公元37—41在位），据说是个狂人，实行暴虐统治，与元老院对立，被暗杀。

②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第二代罗马皇帝（公元17—37在位）是奥古斯都的养子。

富人至少暂时避免劳动者的报复。其办法是制定一些对劳工和利润加以规范的法典，而同时，学者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要使得那些备受贫困之苦、缺衣少食、往往铤而走险的老百姓能从体质的麻木不仁中觉醒过来。

咱们单单讲一下法国吧，近 20 年以来，巴黎、图尔、蒙彼利埃、里昂等地的学术界人士就至少探讨了 50 个有关城市改造的问题，从住房问题直到个人问题，使用的是实验科学确凿无疑提倡的方法。

我们无法对任何一个专门的片断一五一十地讲述其细节，所以在这里只能随便举出一些：

——学校与作坊中的负担过重和负担不当。

——对无论在学校中或是在工作间中的妇女及未成年人劳动加以规范——妇女与未成年人应开始劳动的最高年龄限额——每日的工时——对夜班工作的规范以及允许加夜班的要求条件及年龄限制。

——作坊、中学、商店及各大工厂中必须有卫生条件——其容量、散热、采光等等。

——住宅建筑中的卫生条件、街道宽度、窗户大小、房间采光面积及通风等。

——饮食卫生——对直接入口食品的清洁及价格进行严格的监督。

——传染病的预防，特别注意隐疾的预防，这些隐疾要由卫生警察进行极为仔细的监督。

——无偿散发预防感染的卫生规则。

——由市政当局斥资设立对一切人开放的免费公用厕所。

——创办公园、公共游乐场和廉价娱乐场所，供工人们在劳动了一周之后得到消遣。

——在海滨创立供患瘰癧病佝偻病的儿童治疗的医院。

——设立集体的“旅行奖学金”，以供城市公立学校的男女儿童在假期到法国的海滩和森林去度假。

——设立校办作坊，举办军训活动，设立体育馆、合唱学校、击剑学校、游泳学校及划艇学校，每年年终将分数记入学业总成绩之中，同其他课程成绩有同等效力。

——对儿童的健康、生活习惯及发展趋向逐步、无微不至地予以经常不断的关心，以纠正其先天遗传的缺陷，缓解其过分的顽皮暴戾，但对他们的顽皮不是加以扼杀，而是因势利导，引上有益的道路。

——产妇健康、儿童展览会，等等。

最后，对于这一系列对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还要补充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比什么都更为重要，那

就是应由卫生警察对婚姻加以干预。这一个主张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上，但是，如果要防止后代退化到目前已有目共睹的病态婚姻，这不失为一个办法。

既然我在买我需要的一匹马，买我要躺卧的长沙发之前，就先要调查一番，看看这匹马和这张长沙发有没有有什么破损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对我要娶的女人就不能这样做呢？或者，为什么这个妇女就不应打听一下我的健康和我的可靠程度呢？须知她如果嫁的是个残废人，她就会一辈子受苦受难。

也许原因在于，在当今之世，婚姻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是脱离轻松生活的一个隐避所，是让潜在的风湿病和患上的消化不良病逐渐发作的一个养老院。他们在这里可以再活一些时候，他们那些呱呱坠地就已经发育畸形的子女要为他们付出代价。这些子女们只好无时无刻不咒骂他们的父母，作为对自己先天遗传得来的虚弱的一种报复。

猫



里斯本人勇气的滑稽写照

——在最初爆发反对条约的暴动的那天夜里，有一个人同家人一起喝过茶之后，双眉紧皱，把衣领翻了起来，就准备出门到街垒那里去。他妻子吓得脸色苍白，从门栅那里问他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吗？我要同我的兄弟们聚集在一起：祖国正在危亡之秋，如果有必要，我会不惜牺牲生命。”

他妻子求他看在圣母份上上台阶来，别扰乱孩子们的安宁，这就使得那位勇士雄纠纠的勇猛气慨更是火上加油。但是，他到了街上，看到天上乌云密布，就说：

“你以为事情能够这样下去吗？一万个不行！听见吗？马上把雨伞给我递下来。”

这位勇士不愧为里斯本的老百姓。

猫



英葡冲突中的三国同盟
马尔丁斯·费朗与
马加朗埃斯·利马之行

(1890年10月22日)

属于参加三国同盟的国家的两支舰队驶入特茹河，使人们感觉到欧洲的那些君主制国家，对于那个在法国的暗影下正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酝酿着的共和国联盟，并不是听之任之的。当时，人们估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对于南欧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近、组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拉丁系联邦，是十分恐慌的。人们有一个希望，这样一个震撼那三个国家王朝体系的威胁，会促使三国的君主们去在英国面前给我们说好话，请英国在非洲问题上给我们留点面子，并且让布拉干萨家族在我国

的王位上再坐一段时间。两支舰队开进来，正值马尔丁斯·费朗先生到来，据说他在罗马那里靠教皇的主持公道，使得英葡问题得到了解决。教皇利奥十三世的这种调停，加上哈瓦斯通讯社^①对马加朗埃斯·利马先生^②之行大肆宣扬，使得那种说什么三国同盟已经下决心替我们出力的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头头是道。

所以，幸运女神本来又第二次驾着她的马车向我们驶过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机会，可以争回我们的荣誉和争议中的领土，而第一次是紧接英国最后通牒之后我们拒绝把问题提到柏林会议上去的那一次。不过，这第二次很快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正如第一次我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懂得从总文书的第十二条当中摘引其中的文书一样。这第二次，三国同盟的友好干预也落了空，即使是三国同盟曾经一度想帮我们，也因为这些政治家的过错而没有帮成。

我说是因为这些政治家的过错，现在我来举出证据。首先，这些老爷们不让共和派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大街上喊口号——我们知道这些口号其实是无伤大雅

① 哈瓦斯通讯社是哈瓦斯 1835 年创立的法国通讯社。1944 年改为现在的“法新社”。

② 马加良埃斯·利马 (1850—1928)，葡萄牙作家、记者，宣扬共和主义，曾主编《世纪报》。

的，但作为电报的电文却是极佳的，可以使国外的欧洲君主制王朝感到如临大敌——反而扬言，凡是有谁胆敢向某人或某事欢呼或高喊打倒，抓住了就要往“非洲号”船上送。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各个机关，否认金头发的马加朗埃斯作为雅各宾式大进军的先知的份量。这样，这位《世纪报》的主编到拉丁系国家的饭馆去拿假香槟酒祝酒以及在菜单上写上沙维埃尔·维·卡尔瓦略以及索利亚的名字，此行收到的效果，盟国的国王们对之也可以放心了。

共和派宣传的道义力量受到了这样的削弱，欧洲对于我们玩弄的可笑把戏采取了这样满不在乎的态度。这一来，我们驻各国的使节就对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当时似乎决心要在英国面前为我们仗义执言的做法，给予了致命的一击。

猫



对国家达官贵人们的批判
国家的尊严到了谁的手里
任命高职的办法

倒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无论就人本身而言或是就现行的政治体制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国的达官贵人们在惊人地堕落，以至于国家的高级职能落到了一批为人所不齿的白痴手中，而在这些幕间表演中，这些白痴们给人的感觉就不单是恶心而已。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几期中已经指出过的情况，读者就可以对我们的政客们的性格中那些最突出的缺陷有所了解，而且读者说不定还可以顺带看到，在我国那种如何像一个颐指气使的太太一样将亲信安插在负责的、受信任的职务上。我们已经

不止一次说明过，任命高职所依的标准并不是看人选的条件和能力是否合适，而只是看官职的俸禄收入是否对这个人选合适。这个恶劣的制度使得官员编制中塞满了大臣们和总长们的侄儿和兄弟。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不懂得学习，毫无脑筋，也毫无工作能力，只是一心一意要把人家给他们的职位当做收入丰厚而又不用做事的闲差肥缺。从前，政界只是利用这一帮尸位素餐之徒来装点各机关和海关的中下层职位，那倒也算了，但是官场的磨坊中一塞满了馱畜，就不得不玷污了某些高级职务的道义地位，使得某些机构的尊严和严肃性成为问题，这样才能够让其他人有饭吃。

名门望族或巨富之家的子弟，他们当中许多是不可救药的白痴，但却当上了大使馆秘书和一等领事，到花花世界的首都去上任，由国家出钱供他们在那里花天酒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要认识一下他们，就可以同意一个看法，就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值得得到他们所得到的钱，也没有几个人称得起他们所任的官职。博卡日^①先生如果想给里斯本演出一台典型的戏，

① 博卡日（1765—1805），葡萄牙诗人，生活放纵，多次因作品有反叛性及秽亵内容而被监禁，死于贫病。

他就应该把我国派驻全世界各国首都的外交人员都喊来，把驻各国首都的领事们都聚集在里斯本的大马路上，服装整齐，来一番检阅。这将会是一次古怪得令人难忘的盛会——由法里亚子爵担任大鼓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某些从学校中淘汰出来的花花公子们，一旦他们最后一镑的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而且里斯本再也不在席尔瓦和塔瓦雷斯的办公厅里听到他们的俚语，到时他们的归宿将会如何。卷着唇髭的浪荡公子，胸无点墨的附庸风雅者，靠四套姓氏才抽出来并且曾是自己那代大学生中的草包大学毕业学士，负债累累的运动员，生了痔疮的斗牛士。总之，在巴尔特雷斯基咖啡店与格雷朱奥、圣卡洛斯剧院订有固定座位和常去赌场的那一大批不长脑子的人们当中，最一塌糊涂、最差劲的就是葡萄牙外交当局搜罗其优秀助手的渊藪。巴黎和伦敦、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充塞着这些身穿燕尾服的豚鼠。他们连衣冠都穿不整齐，几乎总是引人发笑，但是，一切关系到维护我国国家尊严的难办事务，都是由他们在赌博与嫖妓之余经手承办的。那些同这一班子取乐老手相处的使节们和全权代表们，可以说是同这班散兵游勇彼此彼此，不相上下。除了那位几乎到了90岁高龄仍驻斯德哥尔摩的索托·马约尔先生仍保持着宫廷人物的传统，以及那

位由于过着过分青年式的生活而只好仍然在马德里对这种生活给自己造成的损害咬牙忍受着的卡扎尔·里贝罗先生之外，葡萄牙其余的驻外代表甚至不能吹嘘自己具有本行工作者的一些次要条件和最普通的素质。驻布鲁塞尔的是恩里凯·德·马塞多，他像一只猢猻，除了平躺着的姿势之外，对任何姿势都不感兴趣。对于任何头脑清醒的状态，除非是由于在饭店中躺在安乐椅上打着隔觉得胃肠不适而造成的清醒，其它时间都麻木不仁。但有人却想让这个庸才去接替巴尔若纳先生同萨尔斯伯里^①进行新的谈判。请看这是多么令人难堪！巴尔若纳先生在公共活动当中的缺点，恩里凯·德·马塞多先生几乎一应俱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缺点。由于这些缺点，为了我们自己好，应该让他离开这个职位十万八千里。我国派驻巴黎的是丹塔斯先生，这是个很好的人，但已经疲惫不堪，老态龙钟，而且还不止于此。驻柏林的是佩纳菲埃尔侯爵先生，对于他的脑部健康，人们已经开始感到担忧了。驻圣彼得堡的葡萄牙公使是圣米格尔伯爵先生，他如果摸着额头复述舍尼埃^②的那句名言，就

① 萨尔斯伯里（1830—1903），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

② 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因对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而被送上断头台。

是口是心非，而在这位阁下每年离职 6 个月的期间代他职务的是埃则基埃尔·普雷戈先生，在外交辞令上对他的界定是这样的：另一半是钟表上的圣米格尔伯爵先生。

我国驻海牙的是维森特·平德拉先生，他的靴子漂亮极了，但是他的一双眼睛比起他的鞋面的明亮程度却略逊一筹。我国驻瑞士的是阿尔弗雷多·安雷斯——他在那里安享度日。在维也纳是高贵的瓦伦萨斯伯爵，关于他的优良品质，我们认为只要提及这位阁下唯一的一点好处就够了，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哺乳动物。

请问，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哪会有一个政府能够拥有称职的外交情报与监控机构呢？我国驻各国的公使馆，花费成千上万，除了收容好吃懒做之徒，除了在行李中夹带私货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呢？自从英葡争端第一次吸引了欧洲的好奇心以来，好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当中，各国的一些报纸谈及这个争端时，或则表现了明显的为我国的权利仗义执言的意图，但对这个争端却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消息与细节、一些起反作用的论点、一些没有权威文件佐证的论述。另外或则在此事闹得正凶之际仍然不得不撇开此事不表态，因为没有人认认真真地向他们提供资讯

来源。遇到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我国各个公使馆审慎地出面，向欧美各国所有对我国表示同情的报馆散发来源正确可靠的地图和资讯，甚至采取妙在不言中的办法，使这些新闻工作者成为周到细微地为我国政府的殖民计划效力的工具。这件事情如果是由一个精明而经验丰富的代办以及一批热心国家利益的领事人员来办，本来是并不困难的。然而，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在这样一个对我国商业与政治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历任政府都没有下令引导世界的传媒舆论去认识葡萄牙对南部非洲的要求在历史上和在当代有何根据，居住在欧美各城市的葡萄牙人——巴塔利亚·雷依斯先生和马尔丁斯·费朗先生除外——也不肯屈尊，从自己尊贵的嘴唇里吐出几句话，正面地或是侧面地来对那些为我们辩护的人们有时候说得走了样的说法加以纠正。

原因是明摆着的，用不着一一摆开。一方面，在非洲问题上大臣们对于争议中的材料之多、之重要是最为无知的。他们对这个问题究竟知道多少，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连欣泽·里贝罗本人在8月20日的条约签署之后，也用一封电报来折磨巴尔若纳先生，大谈对这份不可思议的文件中那些最重要的条款该如何理解！另一方面，我国的那些驻外领事们和大使们已

经对无所事事的闲懒生活习以为常。他们又是从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玩世不恭、道德败坏的阶级中搜罗来的，那么，对于这些人又能期待他们从个人角度关心这件事情吗？如果请求马尔丁斯·丹塔斯先生走出家门不是作为大使，而是作为一个私人去向巴黎各政治报纸的编辑部陈述赞比亚争端的真正经过；又如果希望阿尔费雷多·安儒斯先生通过外交手段去处理洛伦索·马尔凯斯^①铁路问题，使得英美两国的全权代表不至于压瑞士的仲裁法院榨取我们 3600 康托去换取一条连 1000 康托都不值的铁路线；又如果以为瓦伦萨斯、佩纳菲埃尔、马蒂亚斯·德·卡尔瓦略能够影响三国同盟的国王们去对我国事业实行有利的干预，那么，这全是把我国的代表们想得太好了，以为他们会有政府并不要求他们非有不可的献身精神，以为他们会有爱国心。其实，他们久居国外，对本国的感情早已淡漠，而且加上国库空虚，对他们的接济已不足以振奋他们的爱国心了。葡萄牙驻各国公使馆的上层是一个饭槽，而不是个守望哨。在那里，那些政治残废人，那些附庸风雅的可怜虫，就在那些花花世界的首都里，远离他们自己所摒弃、所咒骂的祖国，挨着过日子。

① 洛伦索·马尔凯斯是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在殖民时期的旧名。

把这些甚至在装点门面方面也不能给我们争点面子的不三不四的怪物弄回国来，对那些傀儡式的随员、那些貽笑大方、不懂装懂、在国外败坏葡萄牙国格和风范、连卡萨诺瓦^①的《回忆录》也无从描写其万一的大使馆秘书们来一次大扫除，一劳永逸地铲除那些“大人物的公子”靠父亲的姓氏世袭擢升高官的现象，这是内阁为了王国之福应该痛下决心实行的新生活原则。

对驻国外的领事馆也应该同样进行清洗！到世界各地看看，要想找到在岗位上的葡萄牙领事好心好意地帮助去找他们的人真是难上难，其难度不亚于要为马尔萨尔·帕舍科先生作为议员的名誉作证。有个心灵手巧的人越过了重重关卡，终于当面找到了那位捉摸不定的官员，但得到的却是这样一句傲慢无礼的话：

“您是葡萄牙人，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么，国内那些污七八糟的地方怎么样啦？”

有一个白痴被派驻美洲任一等领事，他是一个专供男子阅读的生活失败者，我就亲耳听到他说出这么一句反葡萄牙的蔑视之语：

①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有名的风流浪子与冒险家，他的《回忆录》反映了当时的糜烂生活。

“我的理想就是住在巴黎，又有一艘空中飞船。每天上午，如果我愿意，就到里斯本来一趟，在王宫广场降落，然后，噤！再回巴黎，到富豪咖啡馆去吃中饭。”

这些宝贝们同本国是这样的关系，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为国家效劳而由国家给钱的国家雇员，而是恰恰相反，国家反倒是某个下级或管家，有义务把钱塞进这些人腰包里。我国的这些领事们经过千求百求，不得已才对自己所负责的那个地区某一贸易问题或某一发生的事件写报告回来呈交大臣。但只消将这些报告和公文浏览一遍就可以猜出，为什么我国签订的商务条约总是起了把我国农业和工业拖垮的作用，为什么每当某个葡萄牙人提到本国昔日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时候，全世界都对此加以冷笑。除了少数例外，葡萄牙驻外代表首要关心的事之一，就是下车伊始就设法脱胎换骨，修剪好自己的胡须并且用心挑选哪种衣着装扮能够尽量改变自己原有的形状。有些人尽管出国时已经有了文学家的名声，但回国的时候仍然在言谈中掺进一些外国字眼，用法语的喉音来发 rr 的音，南腔北调，人家请他们看看帕尔梅拉^① 就不耐烦地吹气。

① 帕尔梅拉 (1781—1850)，葡萄牙著名外交家，对建立自由主义政体起了巨大作用，多次任外务大臣。

一个所谓科斯塔·里奇男爵任我国驻伦敦财务代办处主任，他发了国家的财，还自夸 30 年未回过葡萄牙，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国语言。他对自己的故土是里斯本这一点十分不舒服，所以，他虽然毛发是褐色的，但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把自己的络腮胡子染成金黄色，而且家里不准讲葡萄牙语。这一来，他的儿女们对我国语言一字不识，还以为葡萄牙是一个穆斯林苏丹王国，以为那里的女人留胡子，以为骑士们在松林里拦劫马车。

猫



剧坛危机及其原因

(1890年11月2日)

随着圣安东新马戏场的落成，我国各剧院本来已因为帕尔马新马路马戏场的竞争而处于非常危急的状态就变得更为狼狈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剧院，无论如何用两米宽的大海报来给自己最拿手的喜剧或话剧作品作宣传，但公众显然对此仍是不感兴趣，仍然是跑到那两个马戏场去给猛兽们和柔软弯身的演员们喝彩鼓掌。这一来，许多剧院就在劫难逃，如果一年的收入抵销不了支出，就只好宣告破产。

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考察一下，公众对悲剧演员们的喜爱不如对丑角们的喜爱，

其众多的原因当中，究竟有没有哪个原因是公众确有道理的，尽管悲剧演员们的艺术自豪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依我看来，杂技演出受到喜爱，而其他剧种则不那么受到喜爱，主要原因有三：

——杂技演出收费较为低廉。

——杂技演出使人开心，老百姓总是喜欢笑，而不那么喜欢哭，总是喜欢能使人散心的东西，而不那么喜欢使人要聚精会神的东西。

——最后一个原因，参加杂技演出的外国演员，比起那些从事上演戏剧作品的葡萄牙人来更为进步，更为多样化，更有首创精神。

先看第一个原因。里斯本是很穷的。凡是干活的人都需要休息和消遣。而劳苦大众绝大多数挣的工资——除了圣卡洛斯剧院之外，演出商的钱柜是晴是雨，全都是要视这些工资的平均数而定——只是每天5至10个托斯通。所以，不难理解，要从这一点挣得的钱当中分出200个雷阿尔来买一张马戏团的门票，这已经是很大的忍痛牺牲了。而我们的话剧与小歌剧剧院，即使是最普通的，在楼下观众席看一晚表演也要花上400、500、700或800雷阿尔才买得到一个座位，那就更不用谈了。不错，剧场大厅的偏僻角落是有一

些较为便宜的座位的，但是光线太差，太寒酸，太丢人。到这样的座位去看戏，简直是自我作贱：在那里什么都看不见，演员讲的话听也听不清楚，场景看得朦朦胧胧。观众坐在那里很局促，很不舒服，空气很闷，前后左右都是这样的难友！例如不妨注意一下马莉娅女王剧院的顶楼座和廉价座，三一剧院的楼厅底座。这些座位用栏杆同豪富区隔开，只消对观众席扫视一下，马上就能看出这种做法把这些座位当作马厩、贼窝、下等人收容所，这种歧视使人十分难堪。因此，下层阶级的人们，虽然一向顾不上面子，但这种做法也使他们觉得太丢脸。事实就是，除了马戏班之外，里斯本没有什么剧场能是老百姓的好去处。谁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甚至本来老百姓最适宜去的剧场，即马莉娅女王剧场，也给他们吃闭门羹，取消了原先让他们半价入场的优惠待遇。关于兴建大众剧场的事，谈是谈了不少，说什么要有钢筋水泥大厅，有可吸烟的观众席，有宽广的舞台，有游乐园，有摸彩廊和展览厅，工人只消花一个托斯通，就可以快快活活地度过一晚，过得像国王一样惬意，观看任何芭蕾舞、滑稽小歌剧、嘈杂喜剧、场面宏伟壮观的历史剧……——这件事都不知讲了多少次了！——但直到如今，还没有谁采取过勇敢的行动来兴办这件既有利可图而又高

尚潇洒的事业！20年来，我们一直在又兴建又拆毁剧院。同样，20年来建筑师们和演出商们在通力合作，要造成我们民族的阴暗忧郁气氛，把观众赶进阴森森的演出厅去。这些地方油漆粉刷得一塌糊涂，照明极差，音响有回声，穿堂风呼呼地吹，简直像是一些水井。在里面停留下来，那怕是20分钟，也简直是受罪一场。你不妨告诉我一下，有哪一座剧院是有真正的美术家画的壁画和装饰。所有这些剧院，都是一些不像样的篷子，是一些破烂的鸟笼，只在化妆室里有一些阴暗的取光口，拱顶像灰色的云彩，壁纸是廉价低劣的。只有马莉娅女王剧院和圣卡洛斯剧院的演出厅在剥落的镶金表面之下还保存着某种建筑学上的和谐一致。除了这两座剧院之外，其余的剧院都是一塌糊涂，从远远的地方就能嗅到一股破落凋零和低级酒铺的气味！

第二点——一般地说观众宁可看喜剧表演，而不那喜欢严肃的表演，毫无疑问，对他们必须加以照顾的。不过，首先必须分别清楚，这是一批怎么样的观众，并且对他们的这种偏爱在理智上与心灵上的动机加以批判性的分析。例如，我自己就知道，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每天都是工作6到10个小时，关在封闭的空间里、办公室里、柜台后、写字桌旁，吃过晚饭后，夜幕降临时，他们所想要的是散散心，透透气。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马戏团的表演是最适合的了，因为马戏团的场面宏大，有它的正中表演场地，有它的金碧辉煌的布景，有它的灯光。人头涌动，坐的姿势可以完全自由随意，可以随便交谈，服装穿着也悉听尊便。杂剧、喜闹剧以及喜歌剧对他们也是合适的。他们是体育馆、马戏场、三一剧院的观众。他们所喜欢的剧种是那种展示动作同时又让人们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痛不痒的剧种。对于这样的一种观众，如果给他们提供高级的喜剧、典雅的文学、情意缠绵、催人泪下的话剧，那就不啻强迫他们这些经过一整天工作本来已经十分疲劳的脑筋再去思索一个晚上，这一种类型的观众的确是无法享受纯艺术的乐趣。他们对于词句的细致精巧之处，心理分析的微妙纤腻，某些讽刺及某些惊人之语的大胆，都是理解不了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又有某些虽则粗糙但却不可轻视的品质。

例如，他们心灵中有一种对于剧中情节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对于剧中人的对白是否对应得当，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批判能力，对于影射和讽喻有一种敏锐的、讥讽式的洞察力，一下子就知道究竟何所指。任何戏剧作品，如果能磨砺他们的这些锋芒，能使他们的这些能力分泌出汁液，就必然大获成功。这是最为合情

合理的，因为这样的作品既然能触发大批人的脑力机能，它凭事实本身就符合当代的需要。

一部令人喜闻乐见的剧本——假定是一部风俗剧吧——是怎么样的呢？它必定是将作为剧本对象的观众的普遍意见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固定下来。

因此，创作闹剧与喜剧的作家们，如果写一些具有纯粹民族韵味的喜剧与闹剧，那么，他们的作品（假如有这样的作品并且形成一家的话），就可以大受喝彩欢迎——这样的作品，在我国是次于历史剧之后唯一能从极为丰富的传统血脉中得到启发的文学。我知道，没有什么作品能比这更有气息的了，而在为数甚少的搞这种体裁的作家当中，有些人却宁可抄袭法国的“复杂情节”，而不愿从人民的喜剧传说中和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情节中吸取营养。而另一些则越出了讽刺的角色而转为色情，从开玩笑开始，由于处理极为拙劣而流于赤裸裸的、荒唐的淫秽，我国《杂剧》与《适宜》的作家们就是如此。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既然认定了老百姓有欢乐的必要，就是认为话剧在剧坛中的使命已经结束，就是认为那些凭想象力的演出，如魔术、芭蕾舞和讲排场的哑剧就已经失去了昔日有过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例如，仍然有观众对于那些（用克里斯托旺·德·萨的话来说）沸

腾着“巨大的激情”的话剧表演深深被其打动心弦。证明这一点的有王子剧院的义演，这些演出全场爆满，来了许多身穿衬衣头戴宽边帽的观众。他们这些人对阿尔瓦罗和阿梅莉亚·维埃拉都如醉如痴地欢呼喝彩，而那位通常扮演暴君与小人角色的演员科斯塔，在这座剧院中登场表演一些剧本时，有时就被观众愤怒地嘘斥。与此同时，还请大家考察一下星期天马莉娅女王剧院的大厅，尤其是每当上演衣装剧和有特殊场合的时候，人们总是兴致勃勃，总是由衷地激动。这种兴致和激动在外表上都有所节制，以符合这个剧院的观众的教育程度和身份。到王子剧院看戏和到马莉娅女王剧院看星期日朗诵剧的是些什么人呢？是固定不变的观众。在前一个剧院是一些阅读冒险小说的工人，他们参加一些吉他演奏会，参加一些剧社。他们在吉他上以法多曲的方式表现出他们所由来的下层在感情上的返祖现象，而且，在托林雅的群众大会上，他们是向马加良埃斯和阿里亚加喝彩鼓掌的。

在后一个剧院，则是富有的和小康的资产阶级、批发商、贩卖商、制造商、葡萄牙旧式的资本家。他们有自己的星期日，下午就用来消遣，同家人一起坐公司的马车游玩，晚上就观看某个可能有某种教育作用

的劝世剧。这两个剧院的观众当中，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看到同样的德性，相似的精神需要。他们都有同样深厚的风俗上与本能上的纯洁性，一方面在道德生活上十分严肃，同时心灵又是十分质朴无华。在两种人身上，葡萄牙人灵魂的脚步所踩着的浪漫荆棘，每时每刻都使他们陷于感情上的幻觉，而这两种人都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保持住一种几乎是儿童般的新鲜印象，所以他们在艺术上也就志同道合了。老板的观众席和工人的观众席也就趋于一致，都乐意让自己入迷于暴君恶有恶报的第四幕。

因此，对于有成排舞台脚灯的演出来说，也就有了两种可靠的观众，一种是来散心的，一种是动情的。这两种观众，艺术上的需要是固定的。有了他们，我们这座城市的话剧院和喜剧院就有了绰绰有余的观众，不愁不兴旺了。

……但是，所有的剧团都在抱怨说，他们的演出厅门可罗雀，说马戏场抢去了他们的观众。

这些人对乐于接受而又偏爱的娱乐，现在竟然舍之而去，这里总应该有一个静脉一样隐藏在皮下的原因，一个有机的、深层的原因。难道本来喜欢喜剧的观众，突然之间会成批地不肯到喜剧院去了吗？难道

本来喜欢情节激动的话剧观众，突然之间会成批不肯到喜剧剧院去了吗？会宁愿去看马、看小丑的吗？唔！我对民众是十分熟悉的，所以我不会觉得，民众仅仅会因为埃尔维拉·格拉从老马戏场转到新马戏场加了4头大象就贸然放弃了自己祖传的爱好的。不会的！原因并不在此。往下我要将原因一一加以详细说明。

1890年11月4日

前面我已经谈到过那些又贵位置又不好又不舒服的座位。现在转过来谈一下艺术家们的艺术状态。诸位如果同意的话，我就先谈一下剧本，把演员和批评家摆在最后压轴。尽人皆知，我国是没有什么戏剧文学的，每年登台上演的半打葡萄牙原著中，有特色的，足以保存下来作为艺术作品的，绝无仅有。总的来说，葡萄牙剧坛是靠译本过日子的，而翻译时的选择，不是看原著能给观众提供多少美的享受，而是要追求春宫式的轰动效应，要在钱财上打算盘，或者是因为某一剧本中有某个角色能让某个喜剧演员卖弄一番，就是这样一种法国剧目，通常是最能引起译者产生改编为剧本的愿望，简直可以说，凡是巴黎走红的剧本没有不改编为廉价版本搬到里斯本来碰碰运气的。这些剧本，正如一切原文作品一样，总是有一部分是典型

的、无法翻译的，而这一部分又恰恰是它的灵魂所在。由于其内在的本性，只能是它写作的对象即本国观众才能体会其奥妙，^①而对这个具体场合而言，就是法国观众，这一部分如果在译文中失真，就必然使该作品的旨趣和美妙之处大打折扣。此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的、共通的、是所有各个民族的观众都可能理解的。在这一部分起激动作用的，通常只是一些属次要地位的艺术成分，例如情节的机械性安排手法，某些增添点风趣的喜剧场面，等等，等等。以拉比什^②的那些喜剧为例。法国观众在这些喜剧中看到的，除了巧妙的错综情节以外，还有巴黎小资产阶级的一些细致而饶有风趣的讽刺式展示。而葡萄牙的观众呢，对于巴黎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并不了解，因而在这些剧本中只能欣赏到错综情节，而这正是拉比什的戏剧中那个一般化的部分。

那么，话剧作品的价值又如何呢？比拉比什更高

① “如果想深入到一部戏剧作品的深层泉源之中，首先就必须问一句，这部作品是为怎么样的观众写成的……。戏剧作家的目的，就在于使聚集在一个剧场中的两千人的注意力都不得不集中在一幅风俗画或激情画面上。但是，如果不是所有这些人全都认识的风俗，那又是什么风俗呢？”（保罗·布尔热 1852—1935，法国作家——译者注）。

② 拉比什（1815—1888），法国剧作家。

一些，到奥吉埃^①和小仲马^②又如何呢？不可译的部分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对于整体的批判性估量越来越不可缺少。而葡萄牙观众则因此而只会越来越难以对这一剧本，对它的难得之处，细致独特之处加以品味。不错，王子剧院上演《半上流社会》的时候，那些到该剧院去聆听露辛达·西蒙伊斯朗诵的“有学问的人们”这出剧是喜欢的，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为这位女演员的那种尖酸的俏皮风度所吸引（好色者），另一些人则是为某些对白在文学上的荒诞不经所吸引（文人们）。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要对这一奇怪的喜剧所包涵与概括的社会病态进行探讨。结论如下：里斯本各舞台向观众提供的译本全都缺乏合理的成功条件，因为这些译本中最关键的字句都打动不了我们本国人的道义感、信念、斗争和良知中激动着的好奇心。这是一种同任何强烈的本国生活潮流不相干的戏剧，只是通过故事吸引力来同我们沟通，例如某些对白的生动、某些情节的跌宕起伏，某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发挥，某个女演员的打扮，还有（天晓得是不是？）译本的那种洋泾滨式的葡萄牙

① 奥吉埃（1820—1889），法国剧作家。

② 小仲马（1824—1895），法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作品以《茶花女》最著名。

语。

最近几年来，法国戏剧文学把离婚法当作了好几部话剧和喜剧的题材。它成了好戏谑者和好分析者所少不了的论题，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设想成了这个著名问题在剧坛中的支柱。这个问题一方面固然威胁到家园和家庭的完整，但另一方面也是法国人轻松不羁的性格所必需的。但是，离婚并没有超出巴黎法律的领域，因此，那些把离婚当作根本题材的喜剧与话剧，在法国肯定是具有争议价值的，但到了我国，则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谈而已——然而，这并不妨碍译者们源源不断地直到今天仍向我们提供离婚的作品，由贝阿特莉丝和阿梅莉亚·达·西尔维拉扮演，由露辛达和佩帕扮演。使人惊讶的是，这件事为什么没有推动法律界的乌龟王八们在我国的法典中加上允许离婚这一条。

不过，对于我说的话的批判意义，请勿加以过分的夸大。我并无意否定经过翻译从国外引进我国的众多戏剧作品的价值，更何况我也知道，并没有什么原作同它们唱对台戏。我要指出的只是一点：文学作品的价值，一移植就降低了十分之九，而且考虑到剧坛是一处供不阅读而且少思考的大众娱乐场所，既然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艺术和哲理感召力，那么，付这笔费

用就不值得了，费这么多时间也不值得了。更有甚者：在这些剧中讲的语言是另一回事，要么是事先假定人家已经在看戏之前阅读过，要么是词句结构不三不四，同葡萄牙语背道而驰。一方面，我国剧坛的官方译者们，从来都是那么一些人，他们稳拿住了报纸的吹棒，所以很少在他们为了挣钱而干的活中加进多大的纯洁语言，而且文学教育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翻译只是挣钱吃饭，所以也不必这样做。另一方面，这些剧本中许多人物和本质天性要求他们这些从血统和性格上来说都属外邦的人们一分钟也不要失去原来的乡音，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讲法语，甚至在讲葡萄牙语时也不要忘记法语，尽管塞基埃尔或是热尔瓦西奥最后一刻到了巴黎去引诱他们来到里斯本占据这里的舞台。

在译者和作者之间，整理者应该有一把交椅，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也许缺乏创作才能，但是他仍然有作者一样强烈的欲望。他认为翻译只不过是区区的雕虫小技，但他自己又产生不出东西来，于是他就扑过去啃别人的东西了。

在这样的人心目中，所有的外国剧本都是毛病百出的。于是他就加以修改，这里砍掉一块，那里加上一块，直到一切在他看来都有了能像样的艺术面貌为

止。他把这件事叫做“整理”。这个动词用得真够狡猾的！终于，这出戏登台上演了，戏里面有漂亮的部分，整理者就说：这是我的。如果有糟糕的部分呢，整理者总是不会忘记解释说：这是别人的呀。

猫



第四卷

特茹河的清晨

(描绘)

(1891年3月30日)

轮船还未开到，我就从巴雷罗车站的平台含情脉脉地眺望我眼前展开的那一大片恬静的海景，那一片笼罩在清晨的、波涛起伏、虚无飘渺的景物。阳光没有射进来，吹着海风，昨夜下过一场雨，空中悬浮着朦朦胧胧的一片薄纱泪水。阵阵刺人的寒气

刺激着我。从岸边的那个高处，一览那辽阔的特茹河，我感到它像是满满的一杯水，因为它的河岸团团围成了紧密的一圈……。最近的一层，右边一条沙洲上有一些磨坊和白色的小屋、别墅的墙，还有一些伤心的橄榄树和桉树低垂着头向那从港口入口处进来的黎明的潮湿气息鞠躬致敬。左边是拔地挺立的、高高的红土屏障，它斜倚着，已经被涨水时的波浪所侵蚀，被河水冲刷出裂口，上面长着的青铜绿色的矮小松树丛像是它的头发。越是离开视线，远处房子就越是显得简陋——是一些刷了白灰的小方匣子，上面一些小黑点是它们的门窗、黑瓦顶、院子栏栅和牲口棚。再往远处，到了最远的深处，也就是特茹河平时将卡西利亚斯群山突现之处，成群房屋连成了小小的村落，有斜斜的道路，有亭台，有别墅，有手指般大的钟楼和工厂烟囱耸立直指群星，朝雾在舐舔着天穹，宛如香炉的烟雾缭绕。在后面，经过一夜雨打，仍然留着暗黑色痕迹的松树林在窸窣作响。一大片城墙似的云彩像舞台上的幕布挡住了阳光的爆发，幕布后面正在准备着一幕光辉灿烂有声有色的话剧。班轮发出了讯号，它的水轮打起一团泡沫，像是一个吸烟者吐的痰。就在这个时刻，一艘驳船驶过，尾部一个海神似的人把风帆绷得紧紧的，而其余船员则用叉子使劲将这艘沉

重的破船船舷推开。甲板上小锅底下的松木和扫帚状欧石楠木烧得劈劈啪啪响，发出一阵阵的香气，船上的那条狗闻到这股香味直摇尾巴。

我们绕过竖着一个个磨坊的尖岸，湾口开阔了，水汪汪的那一大片毛巾摊开了，水面平静如镜，船只一根根桅杆的倒影在水面上照射出来——又有一些时候，驳船吸引着我们的艺术家目光目送它，欣赏它的“暗影”，像是一本流着感觉的亮光之祈祷书。船尾，那个汉子的巨大身躯，随着把风帆撑起来的缆索的晃动而晃动着，展现了臂力的线条。他一连串时间长短相同、晃动幅度相同的动作，操作十分缓慢，好像是一句句押韵的诗句，以其美妙的节奏给大自然充塞了体力上的温柔。亮光慢慢地发生变化，空气中的色调在转换，朝雾逃散了，霎时十分灵巧地代替了这些色调。由于朝雾的逃散，这一片景色呈现出成千上百幅版图，一幅比一幅更加染上悲剧灵感的朦胧色彩。河岸渐渐远去，水域扩大着，它这种扩大的力量把河岸淘汰到了远处，水域由河扩大成海洋，它到了麦秸色的汪洋大海那里，成了无边无际水天一色。左方，河岸上的细小事物历历在目，尽收眼底。一群又一群的村落开始映入眼帘。阿伦铁拉、塞伊沙尔、金雅尔、卡西利亚斯、阿尔马达，都高高耸起，可以看见房屋、岬角、

像旗帜一样大小的海湾。以松树林和橄榄树林为背景的一些浅色空白点，中间可以看到一两个磨坊在转动着基督教十字架似的风车，风车的叶片宛如十字花的花瓣，迎着风吱吱呀呀地响着，像围着围嘴的孩子在田野上捕捉蚯蚓似的。但是右边的河岸却越离越远，隐藏起来，谦恭起来，陷入遗忘之中，我眼前展开的这片海景真是宏伟壮观！西方的最远处，一直雾气弥漫，是珍珠色的雾气，流动不已，是“有形的空气”。它从港口入口处那里产生，像是一幅不知是什么壮伟的升天图中的光环，笼罩着整座城市，笼罩着河口的群山，笼罩着市郊，为神话剧的结局作着准备，这个结局就是我们要回到能看见里斯本的地方。我来到了船尾，向留在后面的景物最后道别。我看见东方有一片像幕布似的云彩浓浓地往下压，压到紧贴地面的地方，往国土的内地逃跑。它饱含着雨水，像是上帝恩赐的一个皮囊。它到河里来盛水，然后搬到阿连特茹去洒在庄稼地和葡萄园上。7点半钟了，旭日金冠的最初几条尖刺在天空中燃烧着，给松树林的镶边和我头上逐渐南移的一条雾带都染上了金色——正如沿岸居民所说的，这是“富有表现力的时刻”——这是一个清晨的大合唱，它十分单调，人们听了，作梦就会飘飘然升到蔚蓝的天空上去，升到我的心灵所穿过的蓝天去。我

这个人呀，唉！我厌烦纸醉金迷，追求永恒的爱！

“……旭日金冠的最初几条尖刺在天空中燃烧着”。我们飞速地航行着，可以感觉到船底下深不可测的水充满了绿色的阴影和神秘的墓穴，镶有石珊瑚，有苔藓织成的花环，鱼儿们前来朝圣，围绕着那些沉没的船身，为那些死者做弥撒。首先是一种统一的颜色，是不透明的铅色，它慢慢地变为水银色，变为鱼肚的蓝色，没有皱纹，吮吸得光光平平的，像一个慵懒地躺在床上的人，寻找一个子宫式的中心，要让这个中心颤动，摆脱这种懒散状态。接着，亮光逐渐升起，开始奏起了蓝白两色的宪法交响乐，它将剩下的一些夜间幽灵从海上清扫出去。——晴朗的天气，晴朗的大海，周转着、围拢着、包围着。将一切都溶化着的亮光只有一个单和弦的企望，就是要将物体照亮，要将整片海景溶化到一片非物质的蓝色水域之中。是的，创造是单调多于变化。巴尔贝·多尔维依说得对——上帝就是维克多·雨果，但只是一方面。

水波不兴的水面阿，平静湖水的幻象错觉啊，液质的生命，表面上你是寂然不动，然而却是同岁月一样迅速地在奔驰——我的心灵就在这里，暂时摆脱种种动荡不安休闲一下，因为它看到了你这样反复无常地熟睡着，一任云彩吹跑，一任南方来的微风在舞女

们身上发出哼鸣声，它像个可憎的宗教裁判法官，像是在为覆舟发出悼亡的祷告。我的诸位特茹河仙女们啊，把阵雨的那些海绵似的魔怪扫除掉吧——海浪啊，在你们的碑石上刻上祝灵魂安息的悼词，让那些被暴风雨在一个狂怒的时刻吞没掉的兄弟们能够安息。如果大海的生命是有噪音的话，但愿这个声音用我的语言同我说话，让我在这个声音中辨认出祖先的痕迹，我正是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这种对冥间可怖的哀伤心情！

我们在高速航行着。在麦桔色的汪洋大海中，风在呼呼吹着。但是，波浪却像温水浴盆一样极其平静温柔，一片毛茸茸的地毯，一望无际，船轻快地在上面蹂踏着。一望无涯的海天令人心旷神怡，清晨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但也有一些细节可以补充。远处有些船只，斜侧着风帆，在阳光下呈现黄褐色，在一片浓浓的朝雾笼罩下，仿佛是有意摆在那里要使喜欢运用色彩的画家看见不禁心神荡漾。更往远处，薄薄的晨雾给里斯本以及那边岸上沉重的群山铺上一层天鹅绒，似乎是特茹河上一连串的平台，却不让里斯本的城区映入人们的眼帘。它夸张了大群房屋的规模，最后，使得视网膜得到一种感觉，仿佛没有什么东西是它所看不见的，仿佛人体上没有哪一个神经末梢是不能变成的所谓感觉器官的。这样，尽管汪洋大海浩瀚

无际，但是这个海景总是保持清晰的、式样甜美的标志。它是一个幻术的海湾，蒸发出阵阵黄金的尘埃，它所唯一缺少的，是那些替海神聂普杜恩推大蚌壳的美人鱼和半人半鱼海神。

……日上三竿，天空终于清除了那些短暂的水汽，在整片原野上，阳光显得像少年人一样温顺平和，像水汽一样不可捉摸，似在非在，像摆在珍珠上一样闪出白光。但远处的那一条薄雾上又泛出了粉红色，这种玲珑剔透的丁香蔷薇的粉红色，使人想到了勿忘草的颜色。远处的那条薄雾老是在旋滚，给港口入口处的群山和里斯本城蒙上一层尘雾，但是太阳光一来，就把这条薄雾带切割成一条条斑马式的交替色带，一条条的金黄色带。在这些玲珑剔透的色带后面，船只的风帆像是小孩子的乱涂乱抹，山岭的侧影显得虚无飘渺，宛如影中之影。的确，阳光普照的这个时刻，是超越的。这一片水域的确唱着一首蓝宝石似的悲歌，像空气一样碧蓝，像洗净的草木一样碧绿，又像丁香一样蛋白色。它是一首一波传一波的朦胧序曲，既朦胧又实在，只有偶尔被一只海鸥扑翼的嘹嘹声所划破。连一个浪也没有擦边而过，也没有一片泡沫向着这艘载着我们的轮船迎面而来——天边的海几乎是白色的，

在太阳光下的白色宛如洛恩格林^① 的盔甲……

这个美妙的大自然充满了神秘，又是快乐的理想泉源，它由千千万万无名的灵魂所组成，它经历了旅途的劳顿，眼圈还黑，感到自己在苏醒，但仍在睡梦中说道：你难道没有看见，变老是不公平的吗？你没有看见我生来就是要长翅膀的，我用不了翅膀就感到一阵失落吗？

① 洛恩格林是法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于1850年公演的同名三幕歌剧的主人公，是一个圣杯骑士。他与德国公主艾尔萨结婚的婚礼进行曲驰名全世界。

猫



有关食欲以及吃得好的 必要性的科学历史论证

(1891年11月10日)

拉维斯^①很久以前就在一篇向索尔邦神学院的学生们发表的演说中说过：“今天，科学同时向物质生活也向精神生活提供营养，它最终归结为金钱与哲学。”奇怪的是，我向诸位看官们发出有关食品的哀歌时，不禁想起了拉维斯的这一句话。对于现代烹饪术由于化学而遭到的种种挫折，我谈到的时候，如果不将那位思想家下过的结论借来用于人

① 拉维斯(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曾主编《法国史》(1900—1912)、《法国近代史》(1920—1922)，并与韩波合编《四世纪至当代通史》十二卷(1893—1900)。

类普通天才的这个极为有限的领域，那我就会如骨梗喉，不吐不快的。我要哭哭啼啼对诸位看官们说，在厨娘们还未学自然科学之前，咱们吃的饭菜本来是更好的！有了什么生理学，典型的美食今天可称为蛋白胨了，于是科学的烹调术以不消化为借口，从人们的膳食中排除了昔日的美味享受，在进餐中把味道这个因素否定掉了，把我们的食物降低为味同嚼蜡似的塞饱肚子的东西。我很清楚，蛋白胨是害胃痛病人专用的美味佳肴。这些人由于脏腑失调，不得不采用人工营养的方式。但是，如果有谁对本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欧洲烹饪的一般趋势进行一番研究，他就会不得不同意，我们如果还不对来自巴黎泛滥全世界餐桌的那些淡而无味的食品的一股洪流加以制止，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本国的菜肴就会荡然无存，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懂得吃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极为严重的！在我看来，烹饪丧失了民族特点甚至比公众生活中暴露的感情和思想之丧失民族特点更为严重，这是民族溃灭的第一个征兆。布里雅——萨瓦韩^①曾写过：“观其食即知其人”。他是要以一种

① 布里雅——萨瓦韩（1755—1826），法国律师、作家、制宪会议议员，大恐怖时期流亡美国。又是美食家，曾著有《美味生理学》。

幽默的奇谈怪论方式来表示，朝着理性思维和生活情趣前进的整个过程，是放在一个锅和一个烤架之间的，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必须以烹饪改革为其先导。一个民族在其民族性上的完整，主要表现在3件事情上，一是文学，一是历史，一是饮食。小说与诗歌表现这个民族的抒情与感情性格，历史表现这个民族的英雄性格，而本国菜肴则表现这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性格——而最后这一点，众所周知，是对前面两点起推动作用的。所以，如果看见有谁把所吃所喝的东西视为至关重要，如果看见有谁因为目光落到葡萄牙社会文化与道德的萎缩上因而立刻承认葡萄牙是吃得最少最差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人，可千万不能一下子就把他看成区区饕餮之徒。有什么原因呢？原因主要有二，且听我道来。第一，由于出国旅行安排不当，形成了崇洋媚外之风，结果乌七八糟的次货劣品取代了我国原先优秀的东西，烹饪术即其一例。第二，由于贫困，我国不得不出口大宗的农产品，而又不得不靠一些从所谓工业国的低劣廉价进口品来过活。

猫



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亦即把外国的事物照抄照搬用于本国生活，既不按照一定标准，也不小心过细，就硬行嫁接，甚至对马上产生的效果不如从前也置之不顾。这是长期受到公共与私人歪风所毒害的民族悲观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也暴露了这些民族本来唯一的力量源泉即其公民独立精神在滑坡。这是那些对自己的个性失去信心，像猴子似的仿效他人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他们仿效他人，并不是按照一个深谋远虑、厉精图治的计划，而只是外表上改头换面，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的政治腐败使我们产生了厌恶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表面上的文明。

例如法国文明，其实是很笨拙的，它善于把自己不用的、“巴黎生产”拿来赚钱，而外国草包们对之却诚惶诚恐地如数照收，然后又把这些东西拿到本国首都那些阿木林文人雅集当中去，让这些人看得目瞪口呆。时至今日，出国旅行已经成风，好歹都得出去转转。本来出国旅行是一种辅助的教育手段，但是，在我国它已经不是对他国文明的一种浏览，不是边观察边研究，不是有系统地运用于我国文明，而大都沦为在巴黎的花天酒地，在咖啡馆里同美女厮混，在剧院里沉醉于灯红酒绿，听从导游的指引雇出租马车游遍名胜古迹。总之，只不过是把本国的桑树博览会搬到了远处，花更多的钱，排场更阔气罢了。我在医学院时代的一位同学，是位年青的学者，他第一次留学归国的时候，我问他对巴黎有何观感，他说：

“唉呀，老弟，这座城市真没说的……跑得我腰都发酸了！”

历届政府一直助长国人的这股巴黎热和出国风，出钱资助公务人员、不三不四的画家和冷门青年科学家出国工作。这些出国学习考察之行，从未看见产生过任何有益的成果，却将那些真正的学者所申请不到的“工作奖学金”花费在花天酒地之中，而结果则是

派出一个笨汉，迎回来一个眼睛上套着圆玻璃的 Monsiú^①，一片山羊胡子，皮肤干瘪，表情呆傻，在这个人的心目中，葡萄牙终归不过是一片垃圾场。“巴黎啊，巴黎！”、“我在巴黎的时候啊……”，“有天晚上，在巴黎……”，“老兄啊，说真的，在巴黎啊……”。这些话时时刻刻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三句不离口，以此来衬托出一切带上本国印记的事物是多么的低劣。

毫无疑问，这些草包们大多数都缺乏从哲理上和物性上进行观察的能力以作为其偏爱取舍的根据——总的来说，他们从巴黎带回来的，只不过是林荫道的景色和它熙熙攘攘闹市的声音和宿营的嘈杂声——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们对一切不符合这股热劲的事物视如敝屣。

而所有这些事物当中，他们认为最愚蠢最异端的无疑就是葡萄牙烹饪术，而其实这是全世界最精致、最诱人、最美味的菜肴。这是我国曾经有过的唯一不具姓名而又能同印度、日耳曼等凝聚力与持久力坚强的民族史诗相比美的事物。

要对我国烹饪术的文明程度作出评估，只消指出

① 法语 Monsieur（先生）的变音

一点就够了。就拿生吃食物来说，波里内西亚的野蛮部落是茹毛饮血的，南美洲的某些部落也是吃生的，这是文明的最早一个阶段。它从饮食的角度显示了人类的文化发展程度，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我国已经处于红烧鱼肉时代。而在那个时候，粗野的英国人还停留在使人想起食人时代的带血吃肉阶段。而狡猾的法国人则停留在面团和肉末阶段，也就是说，吃饭是吃药丸似的，其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把味觉一笔勾销。

事实是我国有过一些优秀大师，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继承了砂锅和煎炸油焖的技巧，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地理上的新发现，对于我们的好处，不仅仅在于使那些宗主国里正在破产的流浪贵族们的好战精神和不良的倾向趋于退潮，而且我们除取得东方的香料之外，还取得了巴西的辣椒以及土耳其、印度、非洲边缘各摩尔人苏丹国等讲究饮食国家给食物增添甜味的艺术、烹饪作料和面包一起吃的食物、小吃和菜谱。这些东西很快就使我国在讲究美食的各国当中名列前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自夸有这样种类繁多的本国菜肴。

一份本国菜肴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对书上写出的

菜谱偏偏不照办的烹饪配置，它有它的独特之处，一看就分明与众不同，不可能以用料数量若干、时间多长、凉得快慢或热得快慢、加水快慢、加冰快慢、如何用筛子、如何用笊篱、如何用刀子、如何用勺子等言词来表达的。它是世代相传的，外国人是懂得烹制这菜肴的。这个菜肴传到我们这里来，经过了许多缓慢的过程，经过千百万人的反复试验，这些人先先后后都要设法把这一道菜以尽善尽美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这道菜肴结果总是一件十分美味又是十分为人所熟悉的东西。这一点使它有别于那些“复合”菜肴，也就是那些将种种食物和调味品用天平一一称过分量、完全科学配方、丝毫不凭直觉而仅凭杜撰的大杂烩。那些纸上谈兵的厨师们就是这样在菜谱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样的烹调指南的。本国菜肴，正如本国的歌谣一样，是集体天才的产物，不是由哪一个人发明出来的，而是大家发明的。一个人呱呱坠地，就哭着要吃这样的菜肴，当他远离祖国之时，他首先记起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祖国的菜肴。

好了，在法国人的菜肴当中，只不过有不怎么样的卡恩肠子和那发臭的普罗旺斯海鲜汤。意大利人只有他们的通心粉和某些难以下咽的放满香料的食品。

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只有他们那复杂而奇妙的“杂烩锅”。而葡萄牙呢，却没有哪一个省、哪一个区、哪一片土地在自己的特色当中没有某一特殊地方风味的、巧妙的、细致的食品。它简直是各种味道配合在一起的绝妙的交响乐。尽管有时候它会在横隔膜以下部位的消化道里作怪，使吃了的人不舒服。例如沿海地区，葡萄牙的炖鱼，烹调法各省都大不相同，鱼种不同烹调法也不同，甚至渔夫群不同，住的岸滩不同，烹调法也就不同……。有谁没有吃过特拉法里亚和布兰当港的船夫们用海鳗和鳗鲡做的炖鱼、阿维罗的加梅拉人做的美味之至的土制炖鱼，以及圣雅辛托沿海的渔民们用鲂鱼做的炖鱼？这里还没有提到阿尔科斯附近那位被人遗忘的老炖鱼好手安东尼奥·德·贝伦。他那一手油焖鱼手艺是如此的高明，以至于法国的批评家夏尔·伊里亚尔特有一次在那里同我一起用餐的时候，许下了诺言，回到巴黎后要给他寄来该学会会员证书。

塔曼约^①第一次到里斯本的时候，当时还是一副天真的样子，只是后来出了名，加上贪婪，失去了天

① 塔曼约（1850—1905），意大利歌唱家。

真。他第一次来时，每天晚上演出散场后就同拉法埃尔·波尔达洛一起去吃炖鱼。有一天凌晨，不知为什么，那辆出租马车找不到了，我们就只好徒步从贝伦码头走回施亚都这位男高音下榻的旅馆。走过金特拉广场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虽然大家都硬着头皮不露疲劳之色，但脸色的倦容和步履的蹒跚都说明了这一夜的劳顿。塔曼约白兰地酒喝多了些，而且他一向以自己像狙击兵的雄伟身材而自豪，这时就忽然理平一下自己的大衣，爬上一条长凳子，唱出了收场时先知对太阳的欢迎曲。他的声音已经不很稳固，但劲头还像阿波罗……这是我一生中最欣赏的一个艺术家的神圣启示！

我更不必提到波尔图的肠子，这是小饭馆里民间通俗化的王室佳肴。不必提到布拉加的油炸肉饼，不必提到里斯本的鳕鱼片，这是“穷人的肥鹅肝”，连萨拉·贝恩哈特剧团的男演员布列顿也为它唱出了沁人心脾的出色哀歌——也不会提到米兰德拉的时令石鸡，也不会提到瓦伦萨的时令小羊肉，也不会提到蕃茄鸡蛋奶酪汤，也不会提到阿连特茹的干肉腊肠加面包渣——最后，也不会提到拜拉达的用石头碾碎的带血兔肉饭，也不会提到我国北方老百姓的秘密诀窍之

一、给他们提供活力的极为简单的绿色汤。

请你们告诉我，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有谁吃到了这样的美味而不饱餐一顿，直吃到顶上喉咙。请你们告诉我，我给你们列举的菜肴当中，有哪一道不是迸发着民族性的灵感、光复之歌、蓝白二色旗——但是没有王冠！请你们告诉我，每当人们光顾这样一个小吃店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民族的幻象、家庭的温暖、促膝谈心的亲热？这些小吃店是地地道道的美味大合唱。在那里，人们的味觉分散成为一个个强烈的危机，一个比一个更为激动人。而每一个危机都是由某种作料引起的，它在一刹那之间，就在舌头的乳头尖上留下了它的个体印记，而同时又不打破整体的和谐。

而“复合”菜肴的美味，却全是靠规则配方配成的，是有文字的文化产品，它强迫人的意志产生某种舒适的味觉效果。反之，“本国”菜肴的美味，是肉体本身感到的美味，是凭本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此它不要求口腔的乳头尖事先接受任何的教育。“复合”菜肴的美味是学者专家们的美味，能欣赏的只有很少数的参加者，所以，“复合”菜肴是永远成不了民众的菜肴。

然而，“本国”菜肴的美味，由于符合祖先的综合

味觉，又经过世代相传和天长日久的演变，用不着什么事先的准备和检查就符合大多数人的胃口，所以，它就从茅屋进入了王宫，无论在何处，都受到啧啧称赞。

目前，我国的烹饪与美食艺术同所有别的东西一样，都由于公众的口味不一致以及那些不长脑子的革新家们的过错而处于衰败状态。在这些革新家心目中，本国的东西顶不上英法最劣等的心血来潮。本国的菜肴，除了外省个别少数饭馆还忠实保持着旧生活的饮食传统之外，已经全都从餐桌上消失了，或者被某些人的疏忽大意与恶意的鄙视给变了味。豆子烧猪头是道粗俗的菜肴，任何一个想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家庭都会认为在餐桌上端出这样一道菜是丢人现眼的。在各大饭店的菜单上，在各大酒楼的食谱上，在码头小饭馆以及僻静去处的平平常常的菜牌上，都再也不能看到这道地方菜，即使看到了，也尝不到它有什么正宗原味以及当年的可口诱人的香喷喷的劲儿。

有一次我在波尔图的一家旅馆里，由于是外来客，就十分自然一时冲动在餐厅里向侍者要一份肠子。侍者的回答是：这是加利西亚苦力们吃的菜。我住在那家旅馆期间，他们每顿给我端上来的都是法国菜，共6道，烦死人，装模作样令人反感。这样的法国菜，全

世界五大洲的所有圆桌餐，都是6个法郎一位的，清一色不变，满处是面食、蘑菇、黄油加唾沫的酱汁。上菜的次序也全都一样，服务也全都是一样的索然无味。侍者的脸也全都是一样的表情，镀银的餐具也全都是一副样子……。有一次，一位爱设宴请客的主妇让膳食总管给她拟定了一份洋泾浜式的法国宴会菜单。当有人向她提到国王若奥五世时代的一份食谱（这些食谱充满了葡萄牙的美味，香喷诱人。考古学家贝尔纳尔德斯·布朗科在那本关于奥迪维拉斯修女们的书中也把这些食谱抄录下来）的时候，这位夫人却手里摆弄着膳食总管呈给她的那张灰珍珠色的菜单卡片，发出了怜悯的微笑，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一批山沟野夫罢了。

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葡萄牙，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饭——吃葡萄牙饭了。诸位看官们一定会同意，在这件事情上来一次爱国大进军是值得的，这样才可以使我国能重新享用它原先的美食宝库。对一个民族来说，维护其本国菜肴就是维护其领土。武装入侵是从烹饪开始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从剧院回来的时候，常常发现厨娘成了市政警察。

猫



第五卷

当代文学的特征

今天，人们争取出名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精炼到短短的段落之中，无论说什么都使用一种前人所未用过的、半疯半清醒的、挖苦的、听了心烦意乱的语言，以癫痫式的音响、刺人的感触和奇谈怪论与邪恶权术式的眩晕旋转，深深刺入肌肤，入木三分。现代散文每一行都必须包含昔日五六十页的液汁：每个形象都必须

是整个一个世界，每一个评语都必须是整套滚热冒烟的人类心理学。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在纸上表现出这种眩晕旋转动作的可传达性，如果不愿在每本价为3法郎50生丁的书中写出生活片段，在万能的幻想中包罗一个五光十色的宇宙，充当一个像陀思妥也夫斯基或莎士比亚那样恶狠狠的揭露者，那么，他这样慢吞吞的，这样不懂得看待事物，这样缺乏像爱伦·坡·海涅及维叶埃·德·里斯勒——阿当^①这些人在其幻觉中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只有酗酒天才才会有的梦呓能力，他的话就谁也不会听。

同时由于这种文学要求十分苛刻，要文学家们绞尽脑汁。这种脑力上的紧张，并未能使创作带有阳刚之气，也未能够使公众长期稳定地接触一个流派。这种文学是时代在生理上的一种活生生的表现，它充满了当代的一切弊病和舌苔。它有苦闷的感情，而这正是生活的病，这样的生活处处是创痛，因而使得这种文学直接走向了悲观主义。它又有尖锐的分析，但却没有道义上的健康精神，这是一些意志薄弱人群的特点，而这又是看穿了自己内心不正常以及命运多蹇的结果。这种文学极端虚荣自负，对一切都加以夸大，老

① 维叶埃·德·里斯勒——阿当（1838—1889），法国作家。

是把成千上百部可笑的自传当作史诗题材。这种文学又很猥琐自私，让粗野的冲动和极端放荡的兽性发泄主宰一切。这种文学的风格是躁动不安的，形象是阴森森的，在画面着色和遣词造句的方式上是自大狂妄的——还有，它是孤僻的，是一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是醉心于技术词汇和华丽词藻的——总而言之，一个坑人社会的种种特点，一种由疯子、由患脊髓痨病的放荡者、由凶狠的划船苦役犯写作文学的种种特点，它都应有尽有。

然而，既然作家不可能不是他们出生社会的种种病态失调的集其大成者，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放大反映了我前面指出的种种失衡现象。如果除了那些可称之为职业性的弊病之外，还再加上由于需要金钱而产生的弊病的话，这种放大反映发展到最后就会变成成为一种畸形扭曲。因为对金钱的需要迫使他们去每小时生产，去粗野地生产，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惜牺牲掉本应通过种种兴奋而寻求的独特性。现代的文学夸张了又夸张，倒了人们的胃口，使得本应沿着光明大道飞向古典美境界的理想走上邪路，使人们的感觉误入歧途，生硬地发出灾难的音调，探幽猎奇，把稀奇古怪树为艺术的题材。与此同时，歪曲自己角色的教育与纯洁心智的使命，迎合人群的种种怪癖，为了

糊口而屈从流氓无赖的种种粗俗品味和越轨本能！这使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文学已经从社会的精神主持者宝座上退位下来，实行廉价的工业化。而那些从事这种文学事业的人，则已经沦为公众的文书和仆役，依公众的吩咐，每半年来一场文学革命，搞出一个古怪式样，就像理发店的新发式和成衣店的新时装一样。季节一过去，这个新花样也就寿终正寝了，继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新花样，依气候的变化无常而不同，依太阳升到多高而不同，也依气压的多变而不同。在这场手拉手的旋转游戏当中，文学家们已沦为区区给别人的病态闲闷提供消遣的人，沦为替人消愁解闷的插科打诨的制造商。这样的文学家，为了讨好一些无聊疯癫的人而信马奔驰几年之后，正在像莫泊桑那样迸发涌现。有些人很有才华，有些人有狂热，但抽不出时间来写出杰作。他们身陷于庸泥俗水之中，拼命赶写，不假思索地写，气冲冲地写，有什么写什么，在拒付票据堆中不停地写，总得凑够他一年 360 篇文章，总得弄到 700 镑去赎回典当的东西，去过饭馆和咖啡馆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生活！

猫



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 与特赛依拉·德·瓦斯 孔塞洛斯的移灵安葬

(1892年2月20日)

由于朋友们和所谓仰慕者们的纪念，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和特赛依拉·德·瓦斯孔塞洛斯二人的遗骸将从巴黎移灵回国分别安葬在里斯本和圣塔伦的两个简朴的墓地。这是个好主意，是要为祖国争回两个多少为国争了光的人。这也是个人道的主意，因为一个可怜虫即使变成了骷髅，身处异国他乡也总是觉得格格不入的！他们两人去世都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从法国运回来的是否真的是他们本人的骸骨，因为他们在那边下葬已经5年，墓地契约又没有续订，他们的遗骨就

有可能混到了乱葬坑当中去了。如果到了那里，又是腐烂，又是雨水，那就化解得差不多了。关于瓦斯孔塞洛斯，我另外找一个机会来谈谈。我现在要谈的是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我认为对他这样的诗人与幽默家的平凡一生作一番不加人工吹嘘的探讨是有趣的。我的评述也许不会使那些专门崇拜逝去神灵的人们高兴。他们总是把一个人死后列入圣品当作必行的仪式，我宁可不要人们的称赞，我深信我心中带上真话印记的肺腑之言，我毫不顾忌地说出来正义是在我一边的。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是圣塔伦一位财务文书菲利西奥·若泽·沙维斯和一位姓阿泽维多太太的儿子。他从母亲那里取了姓作为姓名的结尾，这是出于一种天真的虚荣心，因为母家的家族出过几个会写打油诗的人，因而为家族增过点光。他生下来就患佝偻病、淋巴结核。由于谁也没有关心用积极讲卫生、加强锻炼和注意饮食来克服他先天遗传的毛病，所以这个孩子的成长就困难重重。他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显示出这种妨碍他增强体力的糟糕的恶病质和这种扭曲的冷漠，使他很早就产生了孤僻的性格，童年时肌体就变得容易因过敏而出血。

到了少年时代，他父亲看到这个儿子很难取得学士头衔，因为他是个爱偷懒的学生，而且对他这种凄

凉的、牢骚满腹的品性又没办法，于是就下决心让他在中学停了学，加入到当地的吏员集团中去，请求将他的职位由他的继承人来顶替。于是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或者又叫吉列尔梅·沙维斯·德·阿泽维多（他在《回忆记事录》上最初发表的一些诗就是这样署名的），也就这样踏进了人生的旅程。他当上了财务文书，这样的职位直到今天在外省也是很不受人喜欢的，因为税务官吏在人们心目中，就差不多等于对劳苦百姓开刀的刽子手。由于他们这个人家在圣塔伦多少也算小康，加上吉列尔梅还算丰厚的薪俸收入，他在那里过得还算优裕，甚至还过了一阵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打扮得衣冠楚楚，但这样打扮反而使他那残疾人的躯壳显得更加难看。在当地他很令人讨厌，人们管他叫做“跛子魔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讨人厌是因为相貌丑极了，是因为他是跛子，是因为他尖酸刻薄，是因为他是个诗人，而且因为他又是个财务文书。他的形象没有青春气息，没有朝气，没有笑容，没有目光，没有筋肉，没有热情也没有傲骨，他是大自然扔到人间的许多可怕的怪物之一。本来大自然的造物天工是雄伟崇高、美妙绝伦的，但也有出于疲倦或出于嘲讽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他的脑袋是长形的、畸形的，前额高高的，太阳穴却深陷，脑袋仿佛是用绳

子系在老太婆的脖子上似的东摇西摆。眼窝是深陷的，眼睛是近视的，没有炯炯的目光。耳朵是没有血色的，两耳兜风，仿佛他的脑壳是个缸子。他那畸形的凸颌当中，满口的烂牙像猴子牙齿似的堆挤在一起。唇髭是竖立的，没有软软飞翘的边毛，也就是这一笔唇髭成了遮拦他一口烂牙的顶盖。他的身躯很瘦窄，没有胸肌，走起路来朝左边拐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左腿是瘸的，所以每拐一下，两肩的对称就歪扭一下。这条腿是他的一块心病，是他身上的一只鬼，它比右腿长得小，脚掌萎缩，向内扭曲，弯脚不方便。腿同骨盆是脱节的，而在这个部位，痠管和瘰疬、结不了疤的创口不断流出液化骨质的渣滓。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种族的不幸，命运有意作弄人，偏偏在这个种族变质退化的后代身上嫁接上了诗人的多情心灵！

脸色像死人一样阴沉，双手无时不是冰冷的，肤色总是苍白的，头发既不成圈也不成团——就像饿死在路边的老乞丐的头发那样——像吉列尔梅这样一个贪图享乐又热烈如火的人，长成这样一副模样，他的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摧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本来在那片只有读书不多的小职员和炮兵小军官的小地方，是以自己的智力水平高而自鸣得意的。现在咱们只消再

看看他不断遇到的伤心事，女人们对他瞧不起，健康人对他不客气的白眼，只消看看这些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位 25 岁的柏拉图式的打油诗者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的心灵中，除了抒情诉怨的哀伤之外，还开始沁出流言蜚语的毒汁。这是一个残疾人唯一能作出的报复，而这种报复一旦成了文学，就使他日后变成一个讽刺作家。

他对自己的残疾是无法心安自慰的，于是不声不响不抱怨，而是对一切可能扯到他那极为难堪的关于残疾的话题都一概加以回避。在那段时期，美丽的女人是多么的逗引得他心神荡漾！但他多少次想作求爱的表白而又不好意思，生怕遭到耻笑！他多少次碰了一鼻子的灰，有些女人原先得到了他的诗作，又使他昏头昏脑晕头转向入迷了一番，但猛然之间耍出了愚笨荡妇的杀手铜，给这个可怜虫一闷棍，破除他的幻觉，让他去同洗衣妇人厮混！

在靠近特茹河的里贝拉村里有一个女人，他在几乎两年期间一直坚持不懈地要占她的便宜。每天下午机关下班之后，他都同一个朋友一道来到太阳门，边抽烟边聊天，吉列尔梅总是在交谈中东拉西扯，让他的这位朋友分散注意力。经过两年的观察，他认定这位耐心的同伴是蒙在鼓里了，于是就从衣兜里掏出一

个可怕的望远镜，用颤抖的手将圆筒拉开，以历法占星学家的姿态将镜头对准，然后凝神眺望那个妇人，一直到这个妇人感到厌烦了，笑也不对他笑一下就离开了楼台。他有一本书，书名是《那位伊……》，书中描写的归于破灭的快乐，一定是指这次望远镜中的单相思，这真是地道的管筒恋爱，但那个女的却是同第三者结了婚。在那段时期，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全是诗作，而他的诗充满了无病呻吟的肤浅词句，风花雪月，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和苦闷的追求，也不向上帝询问冥冥中的奥秘，词汇十分贫乏，想象力很薄弱、很怯懦。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一些向所爱的女郎说出的庸俗的甜言密语，一些故作高调的对诗歌女神缪斯的呼唤，一些无病呻吟和没有哲理的怀疑论——总之，是一些华而不实、无愁说愁、绮丽萎靡的东西，就正如《画报》的“新诗人”专栏所刊登的那些情歌诗人们写的作品，这些都是任何一个葡萄牙人非得排出来才可以保持健康的押韵脓肿。

如果打开他这个时期的两本著作，即《幻觉》和《夜间的辐射》，去寻找一下诗所不可或缺的情感，那么，能找到的只有节奏而已，而且这些节奏也是很缺乏独特之处的。看不到有任何活生生的、闪闪发光的创造，也看不到任何人生隐蔽在深处的本能和任何代

表永恒的火花，也没有任何心灵的冲突在广阔而炽热的辩才火光中使痛苦幽灵化。官式的诗、那些用头脑而不是用心灵来写的无名诗、生硬的诗，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隐蔽奥秘，是所有那些坐在诗坛饱食终日的人们写的诗。他们爱着、信仰着、否定着或是呼唤着，完全按照语法造句课上教的那一套格式依样画葫芦。这对我来说，就等于完全否定了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价值。这样一个受人鄙视的人，怎么不会抱怨呢？瓜西摩多假如有爪子可以弹奏七弦琴，那么，他被鞭笞时弹奏出的就不会是哀曲，而是雷鸣。吉列尔梅的诗太文绉绉了，所以无法是真诚的，由于是弄虚作假的，使他丢人现眼。所以，我宁可相信，他并不会由于缺乏伟大的诗才而爆发出人生的伤感，他的哀歌只不过是靠耐心和从济贫院的哑吧们那里学来的一些雕虫小技。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也许不是个天才，但也属于略有独创性的鸣禽之列。马拉美^①说过：“在诗中对事物直呼其名，也就毁掉了一首诗的四分之三的快感，因为这种快感在于一点又一点地去猜测，从中得到乐趣。

①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追求用字的新奇和语言的音乐性，作品充满神秘主义色彩。

暗示——这是我们艺术的最高追求！”但是，甚至就这些小小的形式而言，这位可怜的小伙子也不是位于前列的。他的诗几乎全是直来直去的，是对提到的人或事一连串的责骂。他的诗缺乏云霞，缺乏波浪起伏的幽秘，而由于它不是一个渴望所发出的声音，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音节的音乐性本身就缺少了某些歌手们的那种撩人心弦的魅力，这些歌手唱的尽管是庸俗的题材，但仍能在听者的心灵中唤起对那个冥冥中游荡的狮身人首像的回忆。

父亲去世后，吉列尔梅清理了他所取得的少量遗产，毫不留恋地终止了吏员的生涯。他同外省所有的文人一样，都认为自己在本地怀才不遇，都认为自己天禀聪颖，只要到了广阔一点的天地就会在艺术上大显身手，于是他就将居住地点从圣塔伦搬到了里斯本。里斯本的咖啡馆使他能结交朋友，那些所谓“高雅”的报纸也找他担任纪事记者给它们撰稿。他当时已经是个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同人交往的时候冷冰冰的，寡言少语，讲话有困难，但是喜欢听别人讲话，而且总是注意在谈话对方离开之前说一句他自己制作的结束语。

在吉列尔梅看来，对于结束语的注意概括了一切，交谈者往往并不注意他的结束语。吉列尔梅则使话题

重新转回引起交谈的事件上，然后相机再重复提及这件事件，仿佛对一件费了这么多力气的事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从来都对一个题材入迷发狂，无论什么东西，哪怕是多么有艺术性，多么高超，在那些狂热的南方气氛中，也不能使他张开嘴巴说出哪怕是略为近似水流般的连声称赞。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之所以如此淡漠，关键原因是：他到达里斯本的时期，已经不是处于吸收外界事物的年龄了。他的少年时代已经在圣塔伦度过了。当时他在那里受人讨厌，耿耿于怀，女人们不理睬他，但他又在执行税政公务中锻炼出一手在小范围内鱼肉百姓的本领。除了这些，他是极为无知的。在他心目中，所谓图书只不过是奥利韦拉·马尔丁斯^①的几本书，加上几本词典以及左拉^②或弗耶^③的一本最新出版的小说而已。除了这一切，另外还有一件伤心事，那就是他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理解十分有限。假如我们现在把他放进一个由比较有水平的清淡家组成的雅集之中，谈论到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猜出他肯定一言不发。这是因为他对此一窍不通。不

① 奥利韦拉·马尔丁斯(1845—1894)，葡萄牙政论家、历史学家与政治家。

②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自然主义小说家。

③ 弗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与剧作家。

但如此，他正如所有残疾人一样胆小，他如果最后说一句总结性的话来结束这场闲谈，这也是因为爱面子，他内心的痛苦需要以嘲讽的形式向外宣泄呼号，他的虚荣心不能安于完全置身事外，坐冷板凳。

在这个时期，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在文学上的宣泄带有更为生动奇妙的外表。他从事散文写作，成了红极一时的纪事记者。到里斯本短短几个月，他就一跃成名，一时成了“老一代大师们”寄予希望的一个后起之秀。这些大师们希望能让一个不是专门拿笔来写社论或是文书记录的人来接他们的班。他的文章刊登在《幻灯》、《安东尼奥·马列亚》或是《光荣典册》上。这些讽刺性的报纸还得到了天才的拉法埃尔·波尔达洛提供一些熠熠闪光的漫画而增光不少。他的文章还刊登在《日报》、《元月一日报》上，刊登在头三年的《西方报》、《晨报》上。他在这两份报上写的“唧唧叫”和“一个缅甸人的来信”使他在咖啡馆中大受欢迎。这一个个的片段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像蝴蝶一样飞舞的，但是却缺少了南方人气质的一个缺点又是优点，亦即热情洋溢。他唯一的讥讽手法就是把话反过来说，形成反差，这部分是由于他一条腿瘸了而产生一种报复心理，部分是由于他老是阅读奥尔蒂冈的作品。“从国外来了一批漂亮而又廉

价的手绢上市出售，在一个棉布冠环的中央有内阁总理（丰特斯）的肖像，围着月桂枝。不出所料，这种政治上的表态引起了今天在政坛风云中你争我夺的人们议论纷纷。奇就奇怪在立场相反的人们，他们或则气愤，或则高兴，但是表达的方式却是一模一样。保守派们对这种手绢，从鼻孔里喷出了全部好感和全部吸进的鼻烟，而进步派则从鼻孔里哼出全部怒气和全部鼻鼾。政治家在葡萄牙的命运是多么的悲惨，同时代人给政治家保留着的评价表态又是多么的卑琐和滑稽！经过最可怕的斗争，最激烈的战斗之后，政治家只能在获得荣耀的同时又去找洗衣妇人鬼混。”

这段引文我是从《西方报》摘引的，吉列尔梅在《西方报》上撰稿，一直到他被任命为《新闻报》派驻巴黎记者时为止。

这是他厚厚的作品中的一部，阅读这些篇章，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气喘吁吁的、了不起的、彬彬有礼的长矛修理工；文笔是清楚的，没有什么旋律上的抑扬顿挫，词句流淌下来，不痛不痒，只显出对题材的认识；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定见，《西方纪事》的那3年，关于里斯本的生活只展示了四则轶事题材。看它一篇纪事也就对所有纪事都知道了：要么就是有关热或有关冷的文学交响乐的开端，要么就是

有关施亚都广场和哈瓦那之家咖啡馆的叙述，接着就是本周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闲扯，总是那一套……又是贝顿船长呀，又是圣卡洛斯剧院呀，又是谁去世了呀，又是三一教堂如何呀，猫在哪里呀，等等。至于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很少能够知道。他有耗子的本领，能逃避表态，闪身躲到一边，像小丑一样滑稽地一闪而躲开，造成幽默气氛，摆弄一些圣塔伦情歌歌手时代的那些软绵绵的形象——在风格上刮鳞，只接触一下文学皮肤上的毛病，不痛不痒。很少有哪一个题材能使他写出40行，这是阳痿的简略化，现在这种症状可以得到解释了：他的纪实报道在写到纸上之前是写在脑子里的，所以他当然不可能记住大段大段的文章。他的作品缺乏自然而然的笔调，但就其方法的力度而言，可以感觉到一种效果上的和谐，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出于与人为善的心情而读他的作品，读起来并没有兴趣，但也不厌烦，这一点也是应该提一笔的。

他的创作过程同拉马略多少有点类似，但是色彩不够丰富，讥讽的广度也差些。这种讥讽是那些胸口压闷难受，不咳嗽就大笑不出来的人们的那种暴躁讥讽。看官诸君想要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人的严肃郑重的文学批评吗？埃萨·德·盖罗斯的《巴济里奥表兄》，同奥利韦拉·马尔丁斯的《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

明》携手进入可怜的葡萄牙市场，使我们仿佛觉得是一头狮子闯进了林荫大道，使我们想象布鲁麦尔^①在瓦什罗^②的陪同下正在往一片沙漠去旅游。这两本书和这两位作家是我们要注意的，等等……向读者提个问题：您已经看过《一个旅行者的皮包》了吗？如果还未看过，就务请尽快看，因为要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作者C·洛波·德·阿维拉只有18岁^③这是所有各报一致肯定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各报的看法的。但有一件怪事是我很少遇到的：本来无论在戏剧或在文学方面，凡是牵涉到奇人奇才的时候，我几乎总是有我的一套，同本国报界完全唱反调，但这一次呢，我却同意大家对这本书作者的赞扬，我觉得这本书首先是一个十分光辉的启示。

《一个旅行者的皮包》使得凡是在18岁时写作的人都承担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至少到28岁时就已经写了一部“杰作”。

读了10篇到12篇纪实报道之后，就可以明白为

-
- ① 布鲁麦尔(1778—1840)，英国的花花公子，是日后成为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威尔士王子的好友；他的衣着品味对英国上流社会影响深远。
- ② 瓦什罗(1809—1897)，法国哲学家。
- ③ ……这位先生阁下当时一定已经十分老了，因为他生下来时算一百岁，生下来后的岁数是倒着数的。

什么这些纪实报道不能合编成一册的理由了。千篇一律，单调枯燥，令人不堪：翻来倒去都是同样的题材，连幽默的程式也是一模一样……圣卡洛斯剧院和它的明星，波依顿上尉，猫，记者没有看过这半个月出版的书，但又说了两句与之无关的话。这一切都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从不一针见血，总是不三不四，没有想象力，没有欢乐，艺术观十分模糊，哲理也只是香烟头的哲理。

吉列尔梅时代的文坛生活同今天大致上差不多，老是穷酸气的愤世嫉俗，老是眼高手低事不如意，老是那些便宜的夜宵，老是西班牙美女，老是报馆编辑部，老是马尔汀纽咖啡馆，老是文学社，老是哈瓦那之家，还有某些最吃香的喜剧女演员的化妆室。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当时吃共和饭，住在丝织商大街一座房子的第四楼，对着修道士路，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有那位鬼才勃发才气纵横的戎克罗，还有路易斯·德·安德拉德、马加良埃斯·利马、马尔萨尔·帕歇科，另外还有谁，我就知道了。

下午一点到凌晨3点，他几乎总是在街上沿路听人交谈，听出事情来充实自己的库存，就在这转来转去当中，在脑海里起草自己的稿子，而所依照的并不是事情经过的关系与演变对他的灵感的启发，而是看

某一交谈能触发他怎样的最后一句收场语，从这句收场语中取得多大的效果。以这句收场语为中心安排镶嵌配套的文章，使这句收场语看起来显得天衣无缝，作为一段的结尾，这就是他在大街上闲逛之时，在马尔汀纽咖啡馆和哈瓦那之家的大门口一声不响地冥思苦想之时的用心之处。在这些地方，他挨着墙边瘸腿在休息，嘴巴张开着，脸色阴沉，手杖在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围成的小圆圈里转来转去。他就这样好多个钟头呆若木鸡地留在那里，看着人群熙熙攘攘跑来跑去，朋友们谈天说地。他们崭新的领带吸引着人家注意他们那仿佛死人似的筋膜，还有女人们的目光，全都是怜悯的目光。偶然他也喝几杯白兰地酒。吉列尔梅慢慢地喝这些白兰地酒，高举杯子，朝着杯子伸出下唇，作出可怕的鬼脸。他就这样欣赏着如何一滴一滴地啜饮这白兰地，要让一滴一滴地洒在他的舌头上酒精化，就在那里的长凳上，几乎是蹲在杯子旁边，有如一只在啃着一个坚果的猴子。

他那种使人憎恶的残疾，老是使他好色多情的禀性一再遭受奚落失望。关于这一点，我难道还要一提再提吗？……他就是这样采取不介入的一贯愤世嫉俗的态度，这就像一条痿管，他心灵的全部破碎的感触都在这条痿管里化着脓！对于艺术家来说，本身长得

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职业要求，就如同对于妓女来说，本身长得迷人销魂一样，因此那些相貌不能为自己作品的主教大弥撒充当皮饰物的人，真是可怜！因为作为诸神的儿女，这些奥林波斯山的骄子们，怎么竟然在前额上不带上自己超脱人寰的出身的闪闪发光的印记呢？那些对世世代代起了不可抗拒的引人入迷作用的诗人和音乐家，请把他们的形象一一察看一番：莫扎特 20 岁的时候一表人才，翩翩少年，一头阳光似的灰金色头发，一双雌雄塞拉菲特^①的蓝眼睛，眼睛里奇妙的亮光中性别在飘忽着，仿佛是要说，天才是爱情的杂交体，是不繁衍的。理查德·瓦格纳是既邪又贞，宽大的前额因为失眠而苍白，嘴上带着阴阳人朱匹特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首像式的微笑，他那可怕的老虎似的瞳孔，又绿又蓝，记录着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拜伦爵士的《孩子哈罗德》，女人们看了都对他那敞开的领口上白玉一般的颈脖为之倾心不已。狄更斯长着一张出神入化的幽默嘴，他在纽约作了第一次讲演之后，美国女人们纷纷要求吻他的嘴。海因里希·海涅、特奥菲尔·戈齐埃^②、塞萨里奥·韦尔德……唱出抒情式

① 塞拉菲特是法国小说家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两性畸形，本文将这个名字写成阴阳两性，更强调阴阳两性人的含义。

② 戈齐埃（1811—1872），法国作家。

爱情的变容颂歌，匍匐在地以黄金般的韵律回忆在爱神阿芙罗狄蒂出生的那张泡沫纱罗床旁边曲曲折折的占有的经过，当一个衣冠楚楚、玩世不恭的布鲁麦尔，一身不可捉摸的调情风韵，能在任何事情的纤细浪尖上将概念加以造型化——要能这样做，就不能没有《亚瑟王^①纪》中的骑士们金黄色少年时代以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爱情之岛故事中那些战士们雄伟漂亮的形象。要歌唱激情光是懂得表现激情还是不够的，忍受这些激情，也是不足挂齿的，唯有能够引起他人产生激情才可以产生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而吉列尔梅呢，他长着一副哥特式画面的法利赛人样子，平庸，卑琐，而且还加上站都站不直，满口蛀牙，贫血，他是不可能吸引光辉照人的诗歌女神的。他的求爱欲望甚至被那些人尽可依的荡妇们所嘲笑，她们要他付出十倍的代价，粗鲁地逼他只作短暂迅速的接触，在他还感到饥渴之时就把他推到大街上跌跌撞撞。

这样，他作为男子汉的羞耻心就不断地流着血，因为他老是被逐出肉欲的盛宴之外，像一个老麻疯病人只好在禁欲当中消瘦憔悴下去。他腿上的溃疡，本来

① 亚瑟王传说中的6世纪前后英国国王，他的征战故事后来被写成《亚瑟王纪》

在文学上就一直是造成他自悲心境的原因，现在逐渐又成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最细小的不快和挫折的原因。

像吉列尔梅这样的人，由于长相古怪而伤心，在他的性格中，最能一针见血地表现出这种伤心的，就是他的作品中凡是涉及畸形时就采取恶狠狠的一字不提的态度。无论是他的散文或是诗，从来没有丝毫提及哪怕是变相提及这种不幸的。至于在私生活中，他千方百计小心谨慎，要尽手腕，采取幼稚的伪装，不让任何人怀疑到他有一条坏了的腿。

在客寓里，他上床睡前先把门锁上，不让朋友们一下子闯进来发现他的家具上放着旧纱布。他擦洗身子很慢，边洗边哼唱着，用哼唱的声音盖过拨动水的声音。他的药品放在箱子里，锁得紧紧的。如果有哪一天因为活动太多，股间的脓透过了纱布混有红血，连衬衣的下摆也弄脏了，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为了不使洗衣妇人产生怀疑，就把衬衣弄脏的部分撕成小条包成一小包，早上随身拿出去，趁没有人就随便扔在楼梯上。

《幻灯报》石印印刷厂的仆役是个瘸子，有一次，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也在那里，拉法埃尔·波尔达洛走了进去，当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位朋友也在场，就

向着车间高声询问跛子是否已经到了，他指是那个仆役。但此时他一转身，看见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脸色苍白，十分伤心，怀疑别人在背后是不是也这样称呼他。他这种愁眉苦脸的心情，好多天都没有打消。他之所以采取孤僻的态度，对人冷冰冰，极端自私，其秘密就在于这条跛腿上。这个患佝偻病的体型，这副泥浆水色的肤色，以及这种毫无潇洒风度的外表，这一切在他的意识中是有碍于他在诗坛上飞黄腾达的，使他在所有交际聚会上成为向隅而泣的叫化子。

他每碰到一个健康人就感到不自在：他人的健康在他看来就等于有意针对他的残疾指着和尚骂秃驴。他在大街上每看见一个气宇轩昂的小伙子就感到自己失去些什么——甚至结果就是他设法报复，让对方出丑。但是，这种自惭形秽、深恨天不作美的耿耿于怀的贱民心理，又有特殊的十分仁慈而易于动情的一面。他对同他形成反差对比的一切都暗中怀恨在心。但与此同时，他对于并不至于把他比得黯然无光的一切，例如对于可怜人和儿童却是心软体贴的。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对于施舍是崇拜的，但并不张扬，他暗中散发这种施舍，又以香烟或是橱窗展出的物品为借口往后退缩，凡是有小孩子经过他那近视的视线，他总是以陶醉在童年之中的态度停下来，好像是一件杰

作就此开始。^①

《新闻报》曾把他派往巴黎，担任电讯与文学记者。月薪 1000 法郎，另外还可以给里斯本和波尔图各报写稿拿稿费。那些以环境太浅窄为理由来为自己写不出力作的杂文作家们，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吉列尔梅却实现了。

生活在文艺名城之中，成为世界大脑的一个细胞，接触到从未见过的豪华，结识那些在里斯本的文人清谈中如此备受敬重、价值 7 个托斯通的文学头面人物，在优雅而引人入胜的文明的开胃酒中，用言谈来为心灵大摆筵席，这不是一个文人所能拒绝的。专门过夜生活的吉列尔梅，就比任何人都更不能拒绝了。他头也不回、无所留恋地就出发了（更何况他的许多朋友已经住在那边），下定决心要定居下来，要在人家给他

① 除了我前面说过的吉列尔梅在首都期间的作品之外，我还要举出他成册的作品有诗集《崇高的灵魂》、《乡下周游》（同格拉·戈克罗合著的戏剧评论）以及由若阿金·德·阿尔梅达在位于卡斯特罗·梅利奥尔家族公园小小的、今天已毁坏了的“娱乐剧院”里演出的散文体喜剧《罗萨利诺》。对于这些作品，我本来应该在这里进行一番评论，但是在公共图书馆里，在朋友们家里，我都未能找到任何一册。《新灵魂》是吉列尔梅最为炫耀的诗集，但是说句老实话，它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乡下周游》只不过是一个对话讽刺的尝试而已，与其说是幽默，不如说是尖酸，而且我认为是不受公众欢迎的。

《罗萨利诺》是一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喜剧剧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站得住的角色。

在圣日耳曼林荫道找到的正对着克吕尼剧场的一处亭子间里好好干一番，要在伟大文明的灵气呵护之下，在自己那个小小的安乐窝里写出一部颠扑不破、气势磅礴的成名之作，从而使自己跻身于后起之秀的前列。

尤其是在那座人山人海的大城市，谁都不注意别人身上的缺陷，要讲究声色犬马之乐，只要付得起钱就行。哪怕是最有名气的人，都可以幸运地混迹在人山人海的喧闹中而不被人认出，个人生活的这种隐私性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他写给《新闻报》的信件中就显示出巴黎有些东西对他的确是如鱼得水，不谋而合。他的文笔比起在里斯本时并不增添血色，但是他对事物的视觉更准确了，至于段落的轮廓，它更加臃肿了，而其讽刺性则逐渐丧失。

在某些题材上，里斯本时期不超过40行的限度被超过了，描写的文字流畅了。假如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当时年轻13岁，那么在这块讲究时髦雅致的麦加圣地影响下，他本来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淡雅散文家。但是他的40年不是白白活了的，开头就有了毛病，到了这把年纪，任何文学上的进步都只不过是先前缺陷的一个新花样而已。不但如此，这个作家由于他的讽刺方向不对头，由于他染上了泡咖啡馆的习惯，由于他在巴黎仍然像在里斯本一样单独夜行直至深夜，

所以他从来就不能全神贯注，使自己的稿子尽善尽美，仔细推敲，字斟句酌。这种水晶学似的写作，如果缺了无限琐碎的细节，任何一个散文作家却都不能自诩为文笔优美的。正如前面我说过的，他是靠惊人的记忆力在头脑中写作的，所以他可以在脑子里写通讯，打了腹稿才誊清到羊皮稿纸上。在班轮快要启碇之时，离封箱只有四五个钟头，吉列尔梅就坐在长凳上把怀表放在面前，以漂亮的书法一气呵成，文不改点，连一行也不划掉就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都倾注到稿纸上。等到他脱稿时邮政收件已截止，他只得驱车赶往奥尔良车站去投发他的手稿。这样他的文章只具有匆匆初稿的吸引力，就靠报道的事实具有新鲜感来吸引人，但在批评家面前，这就谈不上是一个作家的作品了，因为它太近于采访记者有闻必录的打字抄写了。话又说回来，其中也有写得不错的：有关奥芬巴赫^①的那封信几乎可以说是写得十分漂亮的。有关布朗基^②葬礼的信清晰有力地刻划出了当时的印象，但这是他的天鹅绝唱。计划中的杰作一直是一个执着的梦想，每个礼拜吉列尔梅都把时间耗在如何靠脑子的记忆（天晓

① 奥芬巴赫（1819—1880），原籍德国的法国大提琴家、作曲家。

②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以少数人的起义来专政和推翻资产阶级。

得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制造出他寄给《新闻报》的可怜的信。同时又因为花天酒地,肚子不消化,因而感到巴黎的女人,亦即巴黎的毒性生物碱污染着他的血液,使他无法摆脱那些缺乏先天遗传抵抗力的人们的恶病质,使他股间的瘰疬伤口一片血脓。在巴黎住了一些年头之后,原先从里斯本带来的、本来已经所余无几的体力,又开始由于独身男子过这种不自然的生活而从千条百条漏水管道中流掉了。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倒霉之处,就是喜淫好色,不注意卫生,在法国首都真正的肉是专供富人吃的,他吃的只是假冒的肉汤。至于对他起启发作用的书,他只看一两本小说。他在文学中一向重外表的华丽而轻内在的深度,他甚至还提出一个奇谈怪论,说作家应该是无知的,这才能保持其原封不动的个性而不掺杂外来的东西。他起床很晚,白天在咖啡馆里过,晚上就在有侍寝的女人的林荫道和小剧院里过。玩女人一直是他乐此不疲的陋习。他拜倒石榴裙下,有气无力地让人当作傻瓜来剥削,他那男子汉的自尊心常常受到屈辱,例如他不修边幅和那半截入土的残废身躯有一股令人作呕的野味,一夜就要掏出一二百个法郎。他的讽刺癖变成了某种感情上退化变质的标志,它排除了任何理智欲望的想法。

他几乎失去了美的本能，凡是女人只要是别人称赞过的，他都恨不得弄到手。如果有某个女人经过，又有人说：“这个女人真漂亮！”他就马上从惯常的昏昏入睡状态中猛然一跃而起，深陷的眼窝里重新亮出了火光。

“真是不错吗？你觉得她不错吗？……”接着，他就马上偷偷动身出发去争取享受一番，虽然只是帕拉图式的享受^①。他只是带着这个漂亮妇人一起故意在那些称赞过她漂亮的人们面前走过，好炫耀一番。这样的一些虚荣使他倾家荡产，不过他在花钱上还是像个道道地地的正经人一样精打细算的。对于熟人们，他力图将自己的残疾笼罩在神秘之中，这种敏感的耿耿于怀心理，一直带有疯狂恶狠的、几乎是神经错乱的羞耻感性质。他原先从里斯本带来了一批按照左脚畸形而特造的异形鞋，鞋穿坏了他就通过邮政再订做一些——但同时他在巴黎仍然买双脚对称的鞋，以健康的脚为准，好像是要说服别人相信，他的残疾是很轻微的，所以连鞋匠们也不在意。

1882年3月，看门的女人前来向他通报，有一些朋友来访问他，但发现他昏厥在书房里。看门的女人

① 指只在精神上互恋而无肉体接触的恋爱。

立刻朝着走廊呼救，来访的朋友们赶紧把他扶起来，他们在房间侧面的顶楼找药瓶，在一个架子上发现了包装未拆的瘸脚用的新鞋，同他在巴黎鞋店买的大不一样，还发现了大堆的《事件报》^①和《高卢人报》^②。这是他偷偷看的，报上一些消息他圈出了，这就暴露了他是为了职业而仔细研读过这些报纸的，但这个纪事记者表面上却自夸从不读别人的东西。

这次昏厥对于这位油枯灯草尽的享乐者来说是死期将至的第一个讯号。半年以来，这个可怜虫就已经开始了他入土归阴的容貌整装，无缘无故消瘦憔悴，筋肉萎缩，动作不灵，食欲不振，靠冰淇淋和生鸡蛋过日子。他老是抱怨胃不舒服、疲乏、眩晕、浑身作痛，但对于替他看病的一个葡萄牙好朋友却从不肯吐露为什么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隐秘原因。他被抬到床上的时候仍然没有苏醒，人家给他脱衣服的时候才发现他整个左侧股部都溃烂了，有些下陷部分已经坏死，长痂的新生肉上皮细胞顶盘都在流着脓血水。于是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前一阵他的恶病质为何

① 《事件报》，1848年由雨果创办的法国报纸，后来好几份报纸均取此名，其中包括有左拉主办的一份。

② 《高卢人报》1868年创刊的法国报纸，第二帝国时期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喉舌，1929年与《费加罗报》合并。

日甚一日，身心为何交疲，为何呼吸困难，为何体力不支，为何面如死灰，为何身上发出腐臭味。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身边围着几个朋友就大吃一惊，接着就大闹起来。他被发现了，他觉得问题之严重性，与其说来自这病症，不如说来自他畸形生活的这个可笑的秘密大白于众。这个秘密曾使他经常不断地弄虚作假，曾使他采取如此孤僻的态度，——于是这个从来不哭的人眼里流出大滴大滴的泪珠，双手作出哀恳的姿势环视四周人们愁容满面的脸：这么说他们知道了？这么说他们知道了？——他对别的一切都麻木了，他只觉得这些好朋友们知道了他的真相，他的一切都完了！

护士来了。这时候吉列尔梅拼命求生图存，不停地问他的病情严重不严重。他们坚持要他住进一所医院，他吓坏了，但是体温越来越高，伤口的颜色越来越显出坏疽。一天上午，利诺·德·阿松桑不客气地对他说，于是这个面对死亡威胁的可怜人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只好乖乖地让人家把他送到迪布阿医院。陪同前往的有利诺·德·阿松桑、埃杜瓦尔多·加里多以及拉法埃尔·波尔达洛。那是巴黎的一个四月份，这一天阴霾多云，一片惆怅的气氛。

医院里静穆冷寂，使病人心中又增添了几分阴森

不样的感觉。一股苯酚、高烧汗臭、腐臭汤水混合的气味使人恶心作呕。巨大的直线天花板走廊既无油漆也没有粉刷，只涂上沥青。左边是各病房的门，右边是各个化验室、外科工作室、药房、手术室、消毒室和藏衣室的门。吉列尔梅的房间是第一号，墙壁刷了石灰水，白色的病床活像个棺材，窗口对着方形花园，有一张摩洛哥山羊皮的沙发，床边铺着一小块旧地毯。在床的上方，一个铁环由从天花板吊下来的绳子系着，有人的胳膊那么高。这是一个凄惨的象征，这个垂挂在那里的铁环好像是表示，没有家室的人除此之外在死亡中就没有别的依靠了。吉列尔梅一进来就倒在单人沙发上气喘吁吁，在那里靠了一会儿，焦虑不安的目光扫视了这地方一片死白的环境。尤其是这里的静寂使他感到恐怖，那些内穿黑衣外披白褂蹑着脚走路的护士们使他感到满身大汗。他用加里多的手杖支着身子站了一会，向窗口走去，这个监狱似的院子、白色的墙壁，加上巴黎又高又细的树，仿佛是手淫的肺病者的轮迴转世。他看了觉得非常需要到露天的地方去，就油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在波尔达洛追问下，哀求他们把他带走，带到远远的地方去，到哪里去都行，因为如果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是活不到明天的。可惜他的要求是办不到的，于是就

低下头来说：我从这里是出不去了！3位同伴都伤心得气都喘不过来，也没有设法劝慰他，打消他这个不祥的预感。

1882年4月6日，亦即复活节前一周的圣周四，波尔达洛刚走进这家医院就被护士拦住了，护士告诉他，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正在垂危之中。由于这两个人在文艺上合伙的，不必预先通知，其余的好友也正在陆续前来……。利诺·德·阿松桑在吉列尔梅离职期间接管了《新闻报》驻巴黎记者的工作，他去了伦敦抢先20小时报道一艘载有巴西乘客的客轮在加泰罗尼亚海岸沉没的消息……。埃杜瓦尔多·加里多本来是吉列尔梅在咖啡馆和喜剧歌剧院里共度晚间的高高兴兴的伙伴，他每天都来两次打听自己这位朋友的病况……。于莉埃特是一个“吃夜宵的青年女朋友”，她的心灵之纯洁透明，宛如缪塞特的作品《波希米亚场景》中的类似人物。这个不幸的消息在普通的仰慕者和同乡当中传开了，他们纷纷前来向这位病危的纪事记者表示慰问。热尔曼·塞几天前曾说过，他已经感染化脓，可能拖几天、几个月、几年。他还不知道吉列尔梅的职业是搞文学的，当人家把这一点告诉他的时候，他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竟然为了这样一件蠢事而送命，不禁大为惊讶。的确，吉列尔梅·德

·阿泽维多就是因为这件蠢事而终于一命呜呼。腿股的溃疡，从卫生学的角度来看，本来也许根本不会致他于死命，但是由于疏忽大意却加重了。再加上吉列尔梅先天就体质虚弱，饭馆里的营养又差，他又纵欲耗神，彻夜不眠，使得溃疡都顾不上了，终于影响他整个机体。他进入迪布阿医院的时候，身体上的污秽多极了，不得不在厕所里用刮刀和钳子把污秽的东西弄掉。

朋友们进来了，他的确在奄奄一息，坏疽的腐臭味弥漫着房间，贴在衣服上，要不然就钻进鼻孔里永远忘不掉，人到哪里，腐臭味就跟到哪里。这种坏疽的气味充斥着空气，使人们的伤感化为恶心，使人们见他一面的愿望变成为但愿他尽早过去的愿望。他还认得人，但已经没有气力了，他徒劳地使劲向他们伸出两只死了的手指。他的瞳孔扩大了，皮肤覆盖着一层冰冻的胶质，脉搏微弱，喉咙干渴，喝多少水都不够，只能发出伤心的呻吟。这段挣扎约有一个小时，他的身体变凉了。办完所规定的有关这类情况的手续之后，拉法埃尔·波尔达洛给他做了一个临终石膏脸型。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复活节前的圣周四，按照法国风俗要等到本周六才可以将遗体下葬。

这次葬礼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伤心凄凉的事。下着

雨，死者的朋友又是这样的稀稀拉拉！到了坟场送葬的行列干脆挤到一起，显得人更少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在异国他乡散失掉来自本国故土的心灵中的热气。每个人都按照友谊的礼节给墓穴加上一铲子土，可以听到法里亚子爵带鼻音的一段话：

“我在巴黎 3 年来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①，他连一张名片也不留在领事馆！……”

^①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这个人的心地如何：马加良埃斯·利马在走红之前，曾经被列入进步党名单上被推荐为里斯本市政厅委员。当时他同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一起住在丝织商大街一座大楼的第四层，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吉列尔梅边浏览各报纸边对他说：我现在正在替你摸舆论的气候呢！我看报界对你并没有什么敌意，但也不支持你。只有一份报纸把你称作是优秀人物。的确，另有一份报纸把你称作笨蛋。你看该怎么办？

回去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去马加良埃斯·利马的房间（利马通常是躺在床上的），伸出手作铲刀状，指责利马说：我一直在替你摸舆论的气候呢。现在我可以肯定，你是得到容忍的。按照最近似的估计，在选举中你可以稳得……大约 20 张票。

次日吃午饭时，又是老一套：我现在正在替你摸舆论的气候呢。你，20 票。你是得人心的！

到了晚饭时又是：我刚刚摸了舆论的气候，等等，等等。我到连拱廊去过了，到摆设店大街去过了，到文学社去过了……舆论估计你可以得到……15 票。你正在得到进展，没问题！

次日又说：加油！加油！你知道今天人们给你打几票吗？大约9票多一点。你越来越出名了。

——9年前，葡萄牙在巴黎的留学生常常每天晚上在拉丁区的某家“下莱茵啤酒酒店”聚会。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很少去参加，但是一天晚上他手里拿着一份《呼召报》来到了，挥舞手足，径直朝我国那些学艺术的寄宿生聚集的那张桌子走去。这天晚上各报刊登了美术沙龙评委会向参展者颁奖的名单。那一批葡萄牙人还没有看到。吉列尔梅于是把最新得到的消息带给他们。在受到表扬的人名当中，读到了厄托尔的名字，他是潘梅克的版画学生，是“下莱茵啤酒酒店”这群葡萄牙人小圈子的常客之一，当读到他名字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不已。许多人对这个小伙子竟交上这样的好运不能相信，他们要把报纸拿过来看看。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把自己带来的那一期《招呼报》给他们看。的确，报上在版画的那一节中有对这位小伙子的表扬，他本人当然喜不自胜。大家全都围拢过来，连一些法国人也往这条长凳子这边来，于是这个幸运儿就忍痛掏腰包请大家喝了这啤酒酒店最好的酒，以庆祝艺术沙龙的奖赏。两年的钱就一下子花掉了！第二天，这小伙子跑到有关单位去证实得奖的事，但谁都没有告诉他。是搞错了吗？找了版画评委会的专家，同样是否认。于是就确定了葡萄牙人厄托尔并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原来是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用笔在得奖的版画作者名单最末处写上了厄托尔的名字，他不但模仿了印刷铅字的字体，而且还模仿了褪色的油墨，在煤气灯下把最精明的人也蒙骗过去。

猫



一年文学的荒芜与冷清

(1892年6月30日)

这一年再过几个月就要结束了。这一年的文学仍然冷冷清清地保持着其繁殖者的荒芜不育，只是想到以一些小型的作品来显示一下身手，这些作品大多是诗作，既缺乏灵感，文笔也拙劣。对这一事实，只要大家都同意一个看法就不会感到奇怪。这个看法就是：如果没有在文学中感到心灵震动的读者，如果没有为文学提供灵感的民族生活，就不会有什么文学。何况只消扫视一下多年来文坛培养出的几代新人，就可以发现在他们当中只有拉帮结派、争名夺利、彼此倾轧、唯利是图。他们在政治新闻事业的柜台上也是讨价还价、搞幕后交易、

走后门，把本来应该用于高尚文艺中切磋琢磨的本事全都花在这些不三不四的勾当上了。

既然创作才华走上了邪路，出钱的公众的好感也就远远离开了美学的园地，于是文艺就进入了枯水期。对此，低级的文人们就趁机加以利用，挂羊头卖狗肉，滥竽充数，文化市场随之产生了真空。对此，法国的出版界也趁机加以利用，让一些在巴黎本地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到我国来走红。

举个例子吧，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的（按照“颓废主义者”一词的拆字来理解，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十个牙科医生构成的）作奸犯科的诗人们，总之一切这样的人，他还抽空未被各大国承认为一个学派。在法国尽管有魏尔伦^①这个神秘主义诗人，但他们仍只不过是一批注定要在两杯葡萄酒当中呛死的怪癖人物。而所有这些人，却在我国的年幼无知的文坛上造成一种文学上的呼应，造成一种如此巨大的依样画葫芦的兴奋冲动。我们往往可以在报纸上或是在印刷得有异国情调的小册子里看到一些引人发笑的打油诗，上面

① 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后期成为象征派代表，作品流露世纪末的颓废情绪。

加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修饰词作为一层闪亮的珐琅质。乳臭未干的小子竟在这里自称为怀疑主义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看破一切的世纪末的神经官能症中”，令人生厌地喋喋不休。

“垮了的”一代将阳萎神经病奉为战旗与他们遥相呼应，其中表现突出的有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苏阿雷斯、埃乌热尼奥·德·卡斯特罗和若奥·德·卡斯特罗。这些人力图将《私房话》、《时刻》、《良心自省》、《蓝色》、《失乐园》、《死后的灵魂》等书捧成某个由成熟的作家——空想家们——组成的学派，他们的独立宣言直到现在仍然使得许多爱嘲弄的人们拿来开心取乐。

同这些人并列的还有另外一些毛头小伙子也在拼命干，他们也多少有点颓废主义，但是对于空想家们人为制造的声誉充满了蔑视的心情。他们就是阿尔贝尔托·德·奥利韦拉^①、安东尼奥·诺布雷^②、儒利奥·布兰当^③，他们企图同对立面分道扬镳，拿《梦想的

① 阿尔贝尔托·德·奥利韦拉(1873—1940)，葡萄牙作家，他的空想的美学思想影响了联合在波尔图的“雅集”中的颓废派。

② 安东尼奥·诺布雷(1867—1900)，葡萄牙作家，奥利韦拉之友。

③ 儒利奥·布兰当(1869—1947)，葡萄牙政论家与诗人，著有《安格拉依斯之书》。

圣经》、《日落》、《单独》和《安格拉依斯之书》这些书来树立某种以天真纯朴的民间感情为基础的抒情革新方式。这种民间感情是加雷特所提倡的，它表现的语言十分简单天真，就是民族歌谣集中看到的人可能使用的语言，但又经过同时代诗歌与散文所有种种精致的、饱含深意的加工。必须知道，对于这些互相妒忌的抒情诗人，谁也不拒绝给予他们以应得的种种好感。他们是在寻求理想的革新，尽管吓坏了常理。

首先，在他们对新事物的渴望中，有一个充塞着文学进化浆液的红血球。其次，如果将他们所有的诗歌当中那纯属隐身术表演的杂技成分分离出去，那么还是可以看到，剩下一点黄金可以给他们铸造一个香炉，而且还剩下一点树脂，可以烧起香来庆祝他们的功劳。

但是我却不愿去看一些人那样涂上色彩的自我表白，也不愿去看一些精力充沛、欢天喜地的幸运儿们那种奇装异服的化装舞会。他们纷纷来到书店的橱窗面前为未老先衰的人捧场，自己的神经本来好好的，却要摆出十分不和谐的潇洒样子。

就这种哗众取宠的蹩脚戏而言，我既讨厌托马斯

• 里贝罗^①先生的那种戴上假脑壳涂上假眼圈装成小孩子的90岁老头式的诗歌，也讨厌那些毛头小子式的幽默家们的诗歌。他们假装人老力倦的样子，将青年人的劲头掩盖在“老成之言”之中，明明是金黄色的唇髭，却偏偏放上一些白色的龙舌兰纤维细丝来装老，说起话来结巴龙钟，什么叫做什么都好像忘记了，原因只是他们这种偏执狂是来自巴黎！

关于颓废主义，我现在暂且只笼统地谈一下。它的那些在这片乡间土地上的神甫们和执事们的一篇篇应答祈祷，自会有人对此好好研究一番。什么是颓废主义呢？这是我们本世纪文学演变轨迹的抛物线上的下降线段。这条抛物线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上升线段代表浪漫时期，包括它的先驱们如福楼拜；平走线段或者说是高台包括自然主义者，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成熟时期，它只不过是学问家们的一个迂腐的尝试，正如玫瑰花生命只有15到20年——简直是“一个上午的时间”；最后就是下降线段，就是现在这个闹神经病的时期，是由远方的波德莱尔^②的影响所产生的，又

① 托马斯·里贝罗（1831—1901），葡萄牙诗人与政治家。

②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代表作为《恶之花》。

在里什班^①的《乞丐之歌》和于斯芒^②的《背道而驰》中得到喂育，并在马拉美、保罗·魏尔伦、让·莫雷阿^③、阿尔蒂尔·韩波^④等人身上发展到了极度。

① 里什班 (1849—1926)，法国作家。

② 于斯芒 (1848—1907)，法国作家。

③ 莫雷阿 (1856—1910)，希腊裔法国诗人，原名帕帕迪亚曼多普洛斯。

④ 阿尔蒂尔·韩波 (1854—1891)，法国诗人。

第六卷

猫

学术界对国王王后的态度

(1892年7月10日)

国王和王后陛下仍然患着偏要到各地出巡的偏执狂，看来没有什么能使他们片刻离开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就在去年，他们把波尔图和下贝拉省的经济挥霍了许多，从不放过亲自驾临的机会，劳苦大众从此就过起了苦日子。而现在呢，他们又大开出巡之戒，大显威风，各地方虽然负担沉重，



他们也置之不理，各地老百姓要给他们张灯结彩放烟火，所经之处留下一片饥荒。

我并不是反对统治者的职责当中有出巡视察这一项，我自己认为地上的神灵正如天上的神灵一样，离开自己驾着的云而生活是大有好处的，更何况上苍没有把他们造就成一批阿波罗，而是一批啤酒徒。征服城市的已经不是人，而是思想了，接管的行为，即使是柏拉图式的也只有在老百姓方面才成为起哄的题目。

假如各地的老百姓不是挨饿而是吃得饱饱的，假如历任政府不是玩弄政治而是为民族办事的，假如各学校 and 各个粮仓都满满的，假如农业是繁荣的，总之，假如全国处处都有令人对王室感恩拥戴或起码是抱好感的理由，那么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假如老百姓都有好日子过，那么，哪怕上面是烂透了，哪怕王室是昏庸的，哪怕政府官僚是贪婪腐败的，政坛的风气如何，国人是不会怎么在乎的。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在那些生气勃勃的国家，它们在世界上的历史命运其方向是否正确，也不是完全视其政坛风气而定的。但情况到了我国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丧失公民正义感和对在世界地图上担负使命的意识，已经有两个世纪之久了。民族意志只是体现为零零碎碎

的可笑的抗议，以语无伦次的话语来掩盖蠢蠢欲动的自私心理。对什么救世主们都是信不过的，他们今天自认为人心所归，明天就成为减价出售的次货……

在当前的一片瓦解沦丧当中，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抗力量来抵销风行一时的政治腐败的恶劣影响。这种政治腐败的影响无论是多么微小，它总是以树立一些同它放荡不羁相符的规矩，从而逐步从纳税人身上刮一笔，让那些会捞一把的帮派得利，以饥饿来拐骗提抗议的人们，并以特务活动和阴谋活动来整那些人数越来越少的不妥协者。正是为了保证这种肆无忌惮的地位，就订出了国王巡视的计划，这一来那些新贵们可以理所当然参加花天酒地和纵情作乐。这些人不知道钱的价值，无所事事，只是随便打发时间。一些孩子气的好奇成了借口，于是是什么工厂落成哪，放烟火哪，盲人收容所落成哪，炮兵试射哪，王后木乃伊出土哪，都有国王和王后陛下驾临。他们到外省各地住进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后面跟着一大群大臣和采访记者，让各市政当局囊空如洗，打乱各市与各地农村的日常活动，打扰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能够对谁都不喜欢的东西说一句“我们看了十分喜欢”，对人人都说“糟透了”的东西说一句“好得很”！有了科英布拉之行，花天酒地的需要似乎还染上了行贿受贿的行为。

例如当时本来已经预计考试期间正在结束，学生们会分散到各自的家里，但是科英布拉仍然留下一些学生，有关报纸的广告笼统地把他们称为科英布拉的学术界。这少数学生当中，只有少数人卷入了节日的筹备，报纸的报道就抓住这一点，大说什么“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要将这座城市装饰一新，以欢迎远道而来的国王和王后伉俪。”科英布拉虽然已经看不见几个穿学生服的人，但上次政府如何解决罢课的办法在人们心中却记忆犹新。办法就是下令要那些最勇敢的坚决分子参加考试，要么是留级一年，要么是顺利通过，于是他们也就别无选择了。

这样用施肥来安抚人心，以拉丁方式来平息一片“打倒”之声，并且消除人们在旧车站里作出鄙视手势的可能，征服者就能进入城市了。科英布拉市民是善良的，博士帽上的垂布是不咬人的。总之，靠外地客人为生的科英布拉对这次花天酒地的巡幸一定是心花怒放的。虽然是外来人，国王和王后陛下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葡萄牙的眼光短浅……挥金如土，只要国家骨头里还有髓就吸……那么明天呢？算了吧！巴黎的伯爵还有钱，而贪睡的老百姓刚刚转过身子到另一边呢。

猫



小场的斗牛： 我国斗牛表演的现状

(1892年9月17日)

自从小场里新的马戏场落成以来，斗牛热又在里斯本重新盛极一时。不分老少，这种在历史上总是引起举国欢腾的古老体育比赛都引起了一股狂热，一阵由我们民族的热烈性格涌出的猛烈血浪，又重新在斗牛士的心灵中拨动着葡萄牙自古以来雄强壮伟的冲动力。

有些装腔作势的小里小气的人，他们把气质上的消极恶病质误认为是人性的善良，企图宣扬斗牛是野蛮行为，把人们普遍对此的热情解释为本能的凶残，以小瘪三的浪漫的对应祷文来对牛的遭遇大表伤感。但对于这些迂

腐者的妇人之仁，所有的人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他们发出咒骂，要求对斗牛表演加以禁止并将宪法保障给予人的权利扩大施之于牛。但是对于他们的咒骂，人们只是从嘴中发出少有的欢叫声，葡萄牙全国 37 个斗牛场都爆满，人们如痴如狂地向牛和斗牛士欢呼。

公众已经作出了评判，这股潮流越来越浩浩荡荡，把最后的一道藩篱也冲得七零八落。葡萄牙人民可以不要学校、不要风土驯化公园、不要手工艺、不要圣人政府和便宜货，但他们下不了决心不要斗牛。对于他们的这种心愿必须顺其意而行，而且尽可能对这种唯一能使葡萄牙人民的心脏加速跳动的运动项目加以改进。

斗牛是最能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热血沸腾的一项娱乐活动，任何想拿别的东西来代替它或是削弱它的试图都必然遇到阵阵猛烈的嘘声。咱们现在就来看看葡萄牙斗牛运动的现状吧。它的现状无论就牛或是在斗牛士方面来说，都是很糟糕的。实在说，斗牛用的牛在我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近六七年雄猛의牛几乎同人一样已经迅速软化了。

我国的马戏团里还有个把牛是会发起冲击的，这是对我们波塔斯的一种特殊照顾，但只是学学样子，如果伤害了斗牛士，马上就向斗牛士道歉。从前的牛勇

猛不屈，是正宗的猛兽，不知道疲倦，熠熠闪光，迅如闪电，筋肉丰满，怒气冲冲地发出极为漂亮的冲击。但是这种牛的全部美丽之处，这种英俊雄牛昔日的风度，它的健美筋肉，它那双诗意对称的牛角，它那蹄子的美妙形态和它那脊骨的弹性，今天都正在退化，变成一副已被驯化的蠢笨丑态，变成为孺子牛式的平淡无奇的资产阶级风范。它像是拉犁的牛，一脑子保守思想，是康波利德学院教养出来的，优柔寡断，一动一喘气。人家用短扎枪扎它，它也站着不动乖乖等扎，用蹄尖抓挖斗牛场的地面，装出凶猛可怕的样子。它之所以退化，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应该是养牛人太愚蠢了，以一些污脏不纯的血液拿来混杂。他一点点地破坏了物竞天择的过程。他把牛带到人来人往的牧地去放牧，这就使得牛同人类混熟了，从而软化了牛的好斗性。

就斗牛士方面来说，除了一些年轻的之外，其余都是对斗牛事业既无经验又无禀赋的凑热闹者。他们刚学到了这门艺术的一点皮毛，就受到捧场而停留在几个单调的动作上面，再也不求上进。或者他们只懂得墨守昔日的次等技艺，在今天的斗牛场上又因现代人的盲目吹捧而不求上进。斗牛士队伍这种糟糕的情况，也是凶猛的雄牛退化变异的原因之一。蹩脚的斗

牛士通常总是胆小怯懦的，他们宁可要今天我们在所有斗牛场上看到的那些患贫血病的、像硬纸壳似的乖牛，而不要那些凶猛不驯的烈牛。葡萄牙的斗牛士本来已经人少质差，但他们还像演员们那样分道扬镳，各干各的。外省的斗牛场吸收的许多斗牛士，他们由于批评界缺少坚定严格的对比，很快就走上邪路，滥竽充数，背离了原汁原味的堂堂正正的规程，在斗牛场上以保林诺师尊的古怪斗牛术来砍掉拉斯库埃洛和拉加尔蒂儒的告诫。另一些斗牛士则缺乏勇气去打破社会上那种把职业斗牛士放在很卑贱的半流氓地位的偏见，就把斗牛艺术抛诸门外，一辈子宁可摆出逢场作戏的姿态，避免承担责任，宁可拿斗牛作为业余消遣，这就使他们既得不到荣誉也得不到实惠，社会地位也得不到提高。于是，我们在小场已经无法组成一支真正过硬的斗牛士队伍。而且说不定到了明天，正如在剧坛一样会看到民族艺术后继无人，无论是正牌的或是杂牌的后继人都找不到，各斗牛场会由于缺乏艺术家而关闭，同时也由于没有认真的养牛人而关闭。

猫



里斯本日甚一日的贫困

(1893年4月15日)

前几年，里斯本的贫困还可以说，只不过是某些没有劳动能力和禀赋的流浪汉的一门行业以及某些对孩子进行剥削来行乞的行业，但是现在却发展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像是一场社会灾难在化脓溃烂。这场危机由于单纯是在工业范围内，所以对外省的穷人损害并不大，但是原有的工薪阶层本来生活稳定无虞，舒舒服服，挣多少花多少，习惯了干一天过一天，这一下子就被危机卡住了脖子。他们家里有的就轻生寻短见或是病死，变成坟墓里的粪土，剩下的七零八落的人就只好上街求乞了。由于求乞者的手中不断拿到施舍，求乞逐渐成

为一种比上班打工舒服得多的生活方式，于是求乞者对于许多人来说，就不再是穷得一文不名时万不得已的最后办法，而变成了一门只消打破羞耻感就可以干下去的职业。同那些因为命运不好而受穷的乞丐一道，又来了一批以穷为生计的乞丐，同那些真正的穷人一道，又来了一批真正的地痞流氓，这是使乐善好施者最感到为难的，游手好闲者的敲诈使不幸者受到了连累。那些受难者的大合唱当中，有一组人的声音特别压倒了其他人，使我听了为之心碎，那就是一批老妇人。她们在寒风凛凛一月份的黑夜里，穿着暗色衣服，羞容满脸、面无血色地在高楼大厦的暗影中熙熙攘攘的幸运者身旁轻声乞讨。这些乞讨声也许只是些零七八碎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天主，天晓得是不是还加上对天主保佑已经不敢抱希望的走投无路的哀叹。这些弯曲着身子的人们，有些真正是昔日家庭纠纷的受害者，是她们那一代人一些不可告人的罪愆的心甘情愿的代罪者。她们在阴影中躲得最隐蔽，求乞时最害怕出言不逊，即使受到了拒绝！她们垂下目光，虽然饿得发抖顾不得面子，对拒绝给她们施舍的人还是祝福一句。夜幕像一顶巨大的风帽似的落下，笼罩着这座城市，城区显得扩大了，建筑物显得升高了，马路互相吻合起来形成纵横交错的森林，同暗影那种凄凉的

睡意很不协调。工人们下了班，天幕低垂到屋顶上，禁锢着人们对上苍的向往。贫民区一片死寂，一些匆匆来去的人影，煤气灯喷射出一些亮光，这些筋疲力尽的人们今天不知明天事。穷人吃夜宵的时候，富人还只是在吃晚饭呢。在这个时刻，酒店里正在吃炸鱼，豪华的咖啡馆里煤气灯正亮如白昼，单间的餐厅里正弥漫着白兰地酒的气味和雪茄烟的烟雾。在潮湿的夜间空气中，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窸窣声，可以感到狂热的颤动，可以看到靠永远修筑不完的铁路发财的美国人，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女裁缝、熠熠发光的橱窗、奔驰着的出租马车、40万个正在咀嚼的人。在一个城市的这种只顾自己肚子消化的怪异的自私自利当中，那些可怜的老太婆倚身在墙角，用自己受寒而哮喘着的肺喘出坏疽的气。那些可怜的老太婆从阴森森的街区下来，到人来人往的地方去乞讨。她们当中有一些是肥胖的，腰上围着绉巴巴的破披肩，脸部因心脏病而浮肿，眼珠死灰色，哀痛的嘴巴发出一丝声音，因缺乏空气而喘息。她们步履艰难，走走停停，脚上的拖鞋踩着泥水，渴望得到面包，又渴望能歇息一下，左右为难。她们是一些看破一切的人，她们伸手求乞，又怕被人认出，勉勉强强诉说自己的痛苦，过路人已经被别的乞丐的求乞弄得生厌了，就扬长而去！他们认

不出这个阴森可怜的妇人原来是自己旧日的老师，或者是一个死去同学的可怜的妈妈，昔日的一个女朋友或是亲戚。在这样大的一个城市，人们的不幸表现得多么离奇巧合！那个穿着黑衣的老太婆步履维艰，眼皮浮肿，嘴发呆，慌慌张张地伸出手，她原来是我10年前认识的一个十分快乐的人。她的丈夫当时开一家小香烟铺子，他们生活得不错，生了个儿子，钟爱得不得了，用天鹅绒包起来。这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不久前带着钱同两个女郎一起逃到了西班牙。为了还债老头子只好把店铺卖掉，不久就脑充血死去了。大约两夜前，我曾经想向这位求乞的老太太打听他儿子的下落。她看见我就垂下视线，像是窃贼被人撞破一样发着抖溜走了。但是这个女人的惶惑触动了我这个小说家的人生无常沧海桑田之感。我打听出了，原来那个做儿子的整天在咖啡馆的女招待当中，在阿罗约斯的掷环游戏场中鬼混，过着一种偷窃作恶的生涯，而供他过这样生活的正是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对流氓儿子越来越溺爱人迷，使他一犯再犯到了道德上不可救药的程度。

另一个是西班牙老太婆，她停留在“金狮”门口，向进去用晚餐的人哀求施舍，她的历史更为令人不堪。她本来有两个儿子，都是金银匠。有一次她患伤寒病

被送进医院治疗，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那是学期末的事。她一出院就发现自己的房子已被租出去了，儿子全都不见了，连一张睡觉的草垫子也没有。她向街坊邻里打听这两个流氓儿子的去处。原来他们事先已经预计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这次会没命，所以两个人就把家当分掉了，争吵了一场，把分得的钱物都花天酒地吃光了。老大去了波尔图，老二由于涉案同谋搞假钞票而关进利莫埃罗监狱。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里斯本到处是饿鬼。无论是谁，只要在夜间走过黄金大马路，就可以在救济总会的低地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消失在墙根。这是一个没有身躯的身影，随着人群的来来往往像暗影一样消失。看不见它伸出求怜的手，看不见它脸的尖端，看不见它嘴作出吸吮或发出低语能让人们猜出它是个活人。这个小小的鬼影穿着丧服似的破烂布片，似乎是在打瞌睡。它不是在求乞，但显然是一个女乞丐。有时候在匆匆来往熙熙攘攘的人群旋涡当中，有人忽然用手肘把她推离墙根。她动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叹息，但又一次重新回到原先一动不动的状态。这样一个像保险箱一样密封的胸膛，她的心脏只剩下昔日的回忆，但是天啊！从这个胸膛中发出苍白的叹息该是经过多么沉重的痛苦才会发出啊！这个可怜的女人并不乞讨，人人都匆匆走过她的身边而

不顾，她一夜又一夜来到众人的面前抛头露面，但这样的痛苦并没有得到报偿。她的头低垂在胸前，双手插在披肩里面，虚无飘渺，仅仅像是洒在墙上的一滩油漆，她的身影使人感到惊讶。偶尔有个心肠软的太太对那可怜老太婆冷冰冰的态度感到惊讶，手伸进提包里掏了一个乐善好施的铜币，于是那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就伸出一只颤抖的手，一只饱经磨难的老妇人的手。她瘦骨嶙峋，拳头好像掉了皮。她苍白无血色，皮肤衰老，但昔日皮肤是保养得很好的，在昔日，说不定她的手上还戴着熠熠发光的手镯呢……。这些人的命运还算走运的，虽然贫困不堪，但她们大概还能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上帝还让她们在大街上拖着自己的脚走路，起码不惹人讨厌，仍然可以露出面孔去哀求别人的怜悯。可是那些害病的、瘫痪不能说话的、痴呆的、肢体伤残的，像是大自然从健全人身上截下来的肢体拼凑起来的集合体，只能在自己可怕的牢房里像小孩一样伸手摸索那高声大笑的人类邪恶。……她们遭受到多么可厌的侮辱，而原先幻想在大街上求乞能得到救济，但到头来却要付出多痛苦的代价！她们的不幸还不止于在那破旧的家中缺乏亮光和食物，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展示自己的厄运，而且还在于人家对她们的慈善竟变成了使人恶心的东西，施舍者害怕碰

到她们的伤残身体不吉利，给的施舍也从她们怀里掉了下来。过路行人发的善心一百次当中有九十九次只是出于自私而已。

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细节就可以成为拒绝施舍的借口，比如说，施舍 5 个雷阿尔却要求那个穷人穿着长礼服和戴高礼帽。另一些人则对求乞者是否真的驼背和身上是否真的糜烂十分在乎，而且还有许多人猜想，凡是瞎子都是假装的，那些穷女人的孩子都是从拐卖儿童公司那里租借来的。幸运者们即使在行善时，他们的自私自利也是使人难堪的。在他们看来，唯有这些被排除在一切宴乐之外的不三不四者的苦难衬托出自己的快乐时，他们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心旷神怡的享受。

猫



那位“精英”在哪一点上
要把我说成是放荡作家

在我漫长的纪事作家生涯中，我曾对日常发生的种种事情加以评述。对于我在评述中写出的平淡无饰的文章，我现在回顾一下，我在这些有触而发的、临时书就的、平淡的作品中怎么也找不到有一个题材、一句话是可以使我无愧于有人给我安上的放荡作家头衔的。我要一次又一次地在平民的（这一点我承认）词汇中寻找一些为沙龙雕刻家所嗤之以鼻的形容词，或是一些鞭挞与挖苦之词。这些词无论如何决不表示有什么故意的粗野之处，而只是某些当场抓获的社会现象使我感到义愤而不吐不快的肺腑之言。所以如果有什么“不道

德”的话，并不是这些纪事文章那种健康而不加文饰的用语，而是腐烂透顶的社会暴露出来需要开刀动手术的那些脓疮。即使是嘻笑怒骂的文章中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话语，不成体统的事是不可能用大家闺秀式的语言来处理的。大家都知道，拿笔杆子的人，他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理解自己的角色。他不能满足于绞尽脑汁挤出一些天真烂漫的词句，让那些到三一剧院去作为轻佻的票友给“飘香”这场戏捧场的贵妇们消闲解闷。对于一位晚上给“飘香”这场戏捧场，而在同一天的白天却宣布我是个放荡作家的“精英”，又怎么能信得过呢？所以说是放荡，是因为我并没有按照那些肢体运动失去共济的涂鸦之徒的办法，给这些太太们捏造出一些来路不明的莺歌燕舞的良辰美景，并写成为哈叭狗式的、来自香闺中私通幽会的散文。在这些闺房中，她们在阅读贝洛的作品之余也读一些祈祷文册。所以说是放荡，是因为50年来一直雄踞我国文坛的那种痴呆的婉转文风，那种要么就用小孩子的风格来写，要么就将奔放的人性灵感掩盖在小挎包的叽哩咕噜语言之中，虽然甜言蜜语但仍然兽性虚伪的文风被彻底打掉了。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在皮下腐烂，装模作样的公式作风、表面敷衍的宗教，甚至满足不了哪怕是最天真无知的人们的幻想。在这样的一

个社会里并没有法国的插科打诨，演员戴上黑手套来使大家胡昏乱谰，那又怎么能要求本国的作家们戴上白手套呢？那位银行家的女儿们以及那位将军的小姨子们，这位前任大臣，这位党魁，这位一身肮脏的议员。总之，由这一群为了自己的污浊私利而把全国捆在他们势利圈上的伪君子组成的共济会各位要人显贵们，请他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东一套，西一套，一方面他们在自己宁静的房间里看一篇文章，碰到一个“刺耳的字眼”就摒弃这篇文章。而另一方面，有一出 3 小时内有 4 个男无赖和一个女人当着大庭广众展露自己性器官的喜剧，他们对这样的喜剧却大加欢迎。不，这种时有时无的道德观使我无法不作呕。假如值得降格的话，我就会向所有这些倨傲的洋娃娃们解释，这样理解的羞耻感是如何变成了最为可悲的女子慕男淫狂偏差。

貓



跋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写作的名著。葡萄牙1143年脱离邻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自此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其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的航海家不得不走出狭小的疆域，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因

此，葡萄牙的航海家征服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海洋，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而惊叹不已。如果说在曲折的历史中，葡萄牙人曾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真正征服的是大海，他们是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鬥中的胜利者。

葡萄牙人身上体现出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抵御痛苦的能力，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在《葡萄牙海》这首标题意味深长的诗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葡萄牙人的这些品质：

啊！葡萄牙海，你鹹涩的淚水
饱含着葡萄牙人的多少悲伤愁苦。
为征服你的万倾波涛
多少慈母把淚抛，
多少儿女徒劳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自12世纪到现在，诗歌一直繁荣不衰。葡萄牙的叙事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航海大发时期，远航至印度和日本的航海家创造

□ 康乃馨译丛

了大量作品。目前，许多葡萄牙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自 1994 年开始实施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迄今已出版了 20 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国读者对在欧洲享有声誉的葡萄牙文学有所认识。

现在，由于东方葡萄牙学会和积极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方葡萄牙学会总部设在澳门，但与葡萄牙国内的许多机构联系紧密，她的参与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别是资助翻译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图书馆暨图书学会对这套丛书的鼎力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为这套丛书撰写评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还有长期从事葡萄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中国专家和教授。

林宝娜 姚京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猫

作者=菲阿略·德·阿尔梅达著；刘正康译

页数= 2 2 8

S S 号= 1 2 4 0 0 9 9 9

出版日期= 1 9 9 9 . 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猫

第一卷	
1	诸位先生们，猫儿们就在这里
2	如何筹办一所装饰美术博物馆既给艺术教育充实内容又不增加国库支出
3	大提琴手塞尔吉奥到莫拉里亚区的一家咖啡馆拉琴去了
4	《为了事情办成而给的好处费》
5	路易斯国王的葬礼（自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
6	20天以来全国都只是高呼共和国万岁！
第二卷	
1	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的悲剧（摘录1890年3月至6月）
2	对中学考试的采访：中等教育的倒退以及葡萄牙青年的病态（1890年7月9日）
3	穷阔气：葡萄牙人人都想穷汉装阔佬
第三卷	
1	葡萄牙社会批判（1890年8月31日）
2	葡萄牙在非洲的被掠夺（1890年9月9日）
3	采访记者是报纸的驮畜
4	人民的教育（1890年9月24日）
5	里斯本人勇气的滑稽写照
6	英葡冲突中的三国同盟马尔丁斯·费朗与马加朗埃斯·利马之行（1890年10月22日）
7	对国家达官贵人们的批判国家的尊严到了谁的手里任命高职的办法
8	剧坛危机及其原因（1890年11月2日）
第四卷	
1	特茹河的清晨（1891年3月30日）
2	有关食欲以及吃得好的必要性的科学历史论证（1891年11月10日）
3	崇洋媚外
第五卷	
1	当代文学的特征
2	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与特赛依拉·德·瓦斯孔塞洛斯的移灵安葬（1892年2月20日）
3	一年文学的荒芜与冷清（1892年6月30日）
第六卷	
1	学界对国王王后的态度（1892年7月10日）
2	小场的斗牛：我国斗牛表演的现状（1892年9月17日）

- 3 里斯本日甚一日的贫困（1893年4月15日）
- 4 那位“精英”在哪一点上要把我说成是放荡作家